

前 言

敦煌是我国甘肃省最西端的县级市，在 1987 年改为市之前它仅仅是一个小县。可是这个边远小县的知名度却远远超出中州大郡，不但国内海外皆知，更令全国全世界钦仰。究其原因，诚然是因为它拥有以莫高窟为主的敦煌石窟艺术，及在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了数万件古代文书。但是，无论艺术还是文化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如果说乐僔在鸣沙山麓首开第一个佛窟是肇源于三危山顶佛光的启示，有些偶然，那么此后一千多年间敦煌石窟艺术的蓬勃发展却是古代敦煌社会、宗教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藏经洞文书历时千年而不毁是得益于西北气候干燥、水份稀少的自然地理条件，那么如此庞博的文献产生并封存于此处却是敦煌经济、文化繁荣发达所致，同样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因而，在“敦煌热”勃兴全球的今日，探讨敦煌艺术与文化产生发展的背景，即敦煌的历史就不是多余，而是必需的了。

本书略分 8 部分 54 小节，其中前面 7 部分介绍敦煌的历史与文化，主要依时代排序，对个别需要集中叙述的问题（如敦煌文书的流散），则稍稍打破时间界限，集中介绍。最后一部分简介敦煌学

和敦煌学史，分专题阐释。但愿本书能为有兴趣了解敦煌和敦煌学这一当今文化热点的读者提供一些常识与线索。

本书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新达先生、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资料中心孙晓林女士等学者的热情指点帮助，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诸位编辑也为本书付出了许多精力，在此特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稿完成于 1994 年。由于笔者学识浅薄，时间又较为仓促，文中定会存在不少疏误之处，恳请学者师长不吝赐教，笔者先此致谢！

引 言

1. “敦煌”一名的涵义与来源

史籍中关于敦煌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该传所引张骞的出使报告中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即是“敦煌”一名的首次出现，此后这一地名历代相传，沿用至今，但关于它的语源与原意，早在东汉时就无法确知了，学者们遂各抒己见，争论不已，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目前对“敦煌”一名的解释大体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从汉语之字面意义进行解释，认为“敦”意为“大”，“煌”意为“盛”。东汉应劭首倡此说，唐代的李吉甫又作了进一步发挥，后来的学者也乐于将它作为一个佐证，用以说明位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在古代中西交通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查考当时字书并无此意，陈、郑之间虽然有将“敦”解作“大”的方言，可其地与敦煌相距遥远，未必能同语同俗。况且如按这种说法，“敦煌”当是汉武帝建郡时的汉语命名，而事实上这一地名很可能在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以前就出现了，只是被后来的郡县所沿用而已。因而此说大约是敦煌成为

丝路重镇之后人们对它的一种理解，不一定就是它的原义。

另一类是从字音方面进行解释，认为“敦煌”是少数民族语的译音，或曰当地土著居民所呼土名的汉音写名。随着我国边疆史地研究工作的进展，现在人们对这一问题已有了更深理解，这种观点也获得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是对于它究竟源出于哪种少数民族语言，又存在着众多异说。其中较常见的说法有：源于吐火罗语，是族名“吐火罗”的简译，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一样，均为“吐火罗”一词的第一音节的汉语对音；源于其地所居戎狄语言，属突厥语族，词意为绵亘的大山，西汉因山而命名当地郡县以后，“敦煌”才由山名转变为地名；源于羌语，为“朵航”对音，意指“诵经地”、“诵经处”，等等。

2. 敦煌地区的地理与气候

我国黄河以西的地区自古称为“河西”，因它夹在祁连山与走廊北山之间，形成一条长约一千多公里，宽数公里至百余公里不等的狭长地带，犹如一条天然长廊，所以又被称为“河西走廊”。

敦煌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现在的敦煌市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东临安西县，南接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西与新疆诺羌县毗邻，北与新疆哈密市接壤。古时敦煌周边邻地的名称变化无定，其西部的广袤地区则总称西

域，西行者必须经敦煌才能入西域而更至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和北非，敦煌乃是古代使团商队东来西往的必经之地，是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交通枢纽。

敦煌地区内部的地理环境是南为三危山、鸣沙山，北为戈壁，中部则是党河下游冲积而成的一块平原，从古至今的敦煌人民便主要活动在这块平原上。

敦煌位居亚洲内陆，当地属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年降水量不到 50 毫米，远远低于蒸发量，但其他水源较为充沛，敦煌南倚祁连山，山上丰富的雪水为它带来了勃勃生机。祁连山高峰海拔达 4000 米以上，山上终年积雪，人称“冰源水库”，其冰川的大部分又都分布于北坡，春夏时节冰雪消融，雪水流入走廊，汇成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大水系，并缘河形成了几片绿洲。敦煌就位于疏勒河流域的绿洲上。这块绿洲面积较大，土地肥沃，宜耕宜牧，是沙漠、戈壁包围着的一方难得的“生命之洲”。

3. 敦煌地区的早期居民

敦煌地区至晚在上古时期就已有有了人类活动。考古工作者在河西走廊发现了几十处新石器遗址，敦煌正位于这些古文化分布区内。

我们现今所知道的敦煌地区最早的居民是约公元前 1600 多年以前的，相当于中原夏代的玉门市

火烧沟类型文化的主人。考古发掘表明火烧沟人和中原华夏族同时或稍后即已进入了早期的奴隶社会，他们的社会生活以牧羊业为主，兼营农业、手工业，与外界也已有了一定的交换关系。

继火烧沟人而起的是玉门市骊马类型文化的主人。1957年甘肃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骊马城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批夹沙的红褐色或灰色平底陶器，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已相当进步。

但总起来说，目前我们对战国以前敦煌历史的了解还不够充分，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作进一步补充。

战国至秦汉时期，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民族间相互角逐，迁徙频繁，先后在这里居住的有过着游牧生活的塞种胡人、乌孙人、月氏人和匈奴人等。

初时最为强大的是月氏人，早在战国时代他们就已是河西走廊的主体民族，到秦朝时更有可执弓攻战之士 10 余万，已成为我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之一。在河西，月氏先合并了瓜州之戎，后又将世居敦煌的塞种胡人赶到了帕米尔一带，大约在秦朝末年，月氏更对原来或为敦煌地区主人的乌孙发起了进攻，乌孙王难兜靡战死，部众亡走匈奴，难兜靡的幼子昆莫也被带到了匈奴，被冒顿（mòdú，墨毒）单于收养，月氏遂占领了包括敦煌在内的整个疏勒河流域。

但是，月氏控制这一地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

就被中国北方的另一个强大民族——匈奴击败而大举西迁。

匈奴是一个强悍的古老民族，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善骑射。当月氏强盛时，匈奴头曼单于曾将太子冒顿送交月氏为人质。秦汉之际，冒顿逃归，杀父自立，逐渐统一了匈奴各部，并发兵征服了月氏，至中原西汉文帝时，其子老上单于更杀掉了月氏王，迫使月氏部众远遁西去，留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少数月氏遗民只得寄身于南山的羌族，被称为小月氏，以后逐渐融合于当地其他民族之中。

当冒顿征战月氏时，他收留的乌孙王难兜靡的儿子昆莫也已长大，并为匈奴屡建战功，深受冒顿喜爱，于是冒顿便将大批乌孙部众交还昆莫，让他们继续生活于敦煌地区，直至公元前 174 年冒顿死后，昆莫才率领乌孙部众远徙至伊犁河流域，摆脱了匈奴的控制，河西之地终为匈奴所尽有，成为匈奴右贤王部下的休屠王、浑邪王的辖地。那时休屠王在东，辖今武威地，浑邪王在西，辖今张掖地，敦煌即处于他们的统治范围之内。

两汉时期的敦煌

汉代是敦煌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正是在汉代，发生了张骞凿空、征战匈奴、设立郡县、徙民实边、用兵西域、开拓丝路等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正是在汉代，河西走廊从地理的走廊发展成了历史的走廊，敦煌从荒僻的边地发展成了繁荣的重镇。可以说，两汉，特别是西汉王朝是敦煌地区的开拓者，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奠基于西汉，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起始于西汉。

1.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

西汉初年的汉匈关系曾经经历过几次反复。

早在刘邦建国不久，强大的匈奴就已成为西汉封建王朝的严重威胁，匈奴铁骑不断南下寇边，虏掠人畜、财物，破坏了西北地区的生产和居民生活，终于迫使汉朝动用武力，于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00 年）由刘邦亲率大军与匈奴激战于平城白登（今山西大同东南）。结果是汉军失利，陷入重围，断水断粮 7 日，几乎全军覆没，最后巧用陈平计策突围，高祖等才得生还。这次的失利表明，在社会经济凋敝，割据势力严重，国力虚弱的汉初，中原

王朝还无力抗击驽悍的匈奴。所以汉初统治者不得不与匈奴言和，采用和亲的政策以求苟安，将宗室女嫁给匈奴单于为阏氏（音 yān zhī，指王后），并赠送大量丝织物、酒类等，以维持和平局面。从高祖到武帝，西汉曾先后将 4 位公主远嫁匈奴单于。

但是，“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西汉的妥协并没能满足匈奴奴隶主贵族的贪欲，他们仍然不断侵扰汉朝边地，并恣意向各方扩张其势力范围，特别是月氏和乌孙相继西迁后，匈奴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对汉朝西北边地的直接威胁更大了。河西水草丰美，是一个良好的天然牧场，河西又位居要冲，匈奴据此，南可与羌人相勾结，西可控制西域，把持住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要道，割断汉朝和西域的联系，因而匈奴占有河西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在西域设置了僮仆（意为奴隶）都尉征敛赋税，大大加强了其军力、物力。到汉武帝登极时，匈奴环处于西汉王朝的西北方，已成为汉朝最严重的边患，而河西与西域正是其对西汉进击的一只强有力的右臂。

不过，汉武帝时的西汉已不再疲弱可欺。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之后，其中央集权已得到加强和巩固，“文景之治”的积极成果也使西汉经济发达、国力大增，士兵、军马及军械粮用都很充实，完全具备了反击匈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以壮盛之年在位执政，征讨匈奴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治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2. 张骞出使西域

为打败强大的匈奴，汉武帝首先进行了一番周密筹划。当时西汉已和匈奴进行过小规模争斗，俘虏了一些匈奴人。汉武帝从这些俘虏口中得知：匈奴单于打败月氏王以后，曾命人将月氏王的头骨做成酒器，因而大月氏西迁后仍然十分怨恨匈奴，新王一直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势单力薄，没有同盟者而不敢妄动。据此，汉武帝遂设想与大月氏联手，合击匈奴。

但是月氏居地与汉地相距遥远，要想到那儿去必须经过匈奴人占领的河西地区，当时汉朝人对河西和西域地区各方面情况的了解都有限，路途艰险莫测，出使任务十分艰巨，很难找到合适的使者，汉武帝只得在全国进行公开招募。

应募者中有一位郎官，非常机智果敢，强健刚毅，此人就是后来名播中外的张骞。汉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一说建元三年），中选者张骞率领 100 多人的使团，由奴隶出身的甘父作向导，从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南）出发西进。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张骞一行进入河西走廊后不久就被匈奴人俘获，匈奴单于不允许他们经过匈奴控制区出使月氏，将他们扣留了 10 年，并为张骞娶妻，后来还有了孩子。但是张骞始终不忘汉廷使命，至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终于逃离匈奴地区，到达大宛、康居，并最终抵达大月氏。

可是此时的大月氏已征服了大夏（在今阿富汗北部），由游牧生活开始向农耕、定居转变，当地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又很少受到外敌的侵扰。月氏人安于现状，不愿再与匈奴争斗，没有答应汉朝合击匈奴的要求。张骞在其附近考察了一年多，于元朔元年（公元前 128 年）踏上归途，在经过羌人居住区时又被匈奴虏获，直到一年多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 130 年），匈奴发生内乱，张骞才携妻带子，与甘父一同回到了汉朝。

张骞此行虽然没有完成联合大月氏的政治使命，但意义却远远超出其直接使命之外。早在张骞之前，我国史籍中就有过一些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但是作为官方使节，张骞却是中原王朝出使西域的第一人，因而司马迁将他这次出使称为“凿空”西域。张骞此行实地勘察了东西交通要道，开辟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书写了中西交通史上光辉的第一页，同时他还带回了有关西域等地的大量见闻和丰富知识，开扩了汉人的视野，改变了汉朝以前的地域观念。张骞还朝后，曾就此行向汉武帝呈交了一个翔实具体的报告，详细描述了所经各地的山川形势、地理位置、人口兵力、经济物产以及风俗习惯等，为汉朝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个报告后来被收入《汉书·西域传》，是我国有史以来有关敦煌河西及西域地区最早的确切记载。

张骞这次出使西域历时 13 载，去时 100 多人，

归来时却只有他和甘父²人，为表彰他们的功绩，汉武帝将他们分别封为太中大夫、奉使君。

3. 汉武帝时争夺河西敦煌的军事举措

与派出张骞同时，汉武帝也开始进行军事准备，以便随时与月氏联合，武力征讨匈奴。但张骞一去多年，杳无音信，而匈奴却频频侵犯汉境，汉武帝不得不作出了单独反击匈奴的决定。

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以河南之战、河西之战和漠北之战³大战役最重要战略意义，其中对丝绸之路的开通和敦煌河西地区的繁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河西之战。汉武帝组织这场大战役的目的就在于争夺河西走廊，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这场战争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春，是春，汉武帝派遣青年将领霍去病统率骑兵万余人从陇西出发向西迂回，汉朝军将翻越祁连山，横扫匈奴五属国，转战⁶日，越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东南），进击 1000 多里，杀掉了匈奴折兰王和卢侯王，活捉了浑邪王的王子，缴获了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使匈奴折损近万人。

第二阶段在同年夏季，霍去病与公孙敖率数万骑分两路出北地和陇西进击匈奴，尽管公孙敖军在进军途中迷失方向，使原作战方案落空，但霍去病一路仍然取得了重大胜利。霍去病率军大战 2000 里，渡过居延泽，直逼祁连山，斩、虏匈奴³万余

人，基本击溃了匈奴在河西的军事力量。

河西之战汉军两次歼敌共 4 万余人，使匈奴贵族受到沉重打击。但更重要的是汉军的胜利引起了匈奴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长期控制河西走廊的匈奴休屠王和浑邪王，因在河西之战中惨败，遭到了匈奴单于的猜忌和怨恨，单于准备将他们召回王廷处死。休屠王和浑邪王得知大祸临头，便决定归降汉朝，并派人同汉朝取得了联系。元狩三年（公元前 122 年）秋，汉武帝派霍去病领兵相迎，休屠王中途反悔，被浑邪王斩杀，霍去病也率兵杀掉了匈奴哗变士兵 8000 多人，护送浑邪王及其部众 4 万余人归降汉朝。汉武帝封浑邪王及其亲信数人为侯，并将投降的匈奴部众安置在原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 5 郡故塞之外，称为五属国。至此，河西之战大获全胜。

河西之战的胜利使得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走廊正式归入了汉朝版图，西汉王朝开始据此积极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并对这一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和建设。

4. 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及中西关系的发展

汉军打败匈奴之后，张骞便向汉武帝建议派使者出使乌孙，与乌孙联合，以巩固反击匈奴的战果。雄心勃勃的汉武帝很快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并拜他为中郎将，于元狩四年（公元前 123 年）再次

西行。

张骞此次出使与前次相比大不一样。首先，使团的组成远较前次庞大、壮观，它既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外交使团，又是一支规模宏大的商队。这个使团中除张骞外还有许多持节副使，可以沿途分赴各地，扩大交往范围，其他随员也成倍增加，共有随从 300 人，每人各备两匹马，又携带着成千上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及 1 万多头牛羊，可以与所到诸国进行物资交换。其次，使者们所面对的形势要比前次优越得多，此时通往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已处在西汉的统治之下，使者们不必再过多担心匈奴骑兵的袭击，可以跃马扬鞭，顺利前行了。因而这次张骞所率的使团很快就到达了乌孙。

只是乌孙王已经年老体衰，国内又纷争不安，对汉武帝劝他们东迁故地，共击匈奴的事一直定不下来。于是张骞便把副使们分别派往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地，自己则携同乌孙的答谢使者一同返还。元鼎二年（公元前 115 年）张骞回到长安，被汉武帝拜为大行令（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以后改为大鸿胪），第二年便去世了。

张骞死后一年多，他当初在乌孙派往大夏等地的使者都在对方使者的陪同下陆续回到了汉朝。从这时起，西北各国便开始和汉朝正式交通往来，中西交往更为频繁，使者相望于道，外国使者多者一起数百人，少者百余人，中国使者一年中也有五六

起或十余起。通过频繁的交往，中国的文化与物产，特别是丝绸源源不断地传向西方，西方的火浣布等也传入了中国。这些交往既加深了汉族和西域各族人民之间的了解，增进了友谊，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使位于丝路必经之地的敦煌变成了总汇东西的交通枢纽。此后，西汉王朝对敦煌地区实行进一步的开发经营，为敦煌以后的繁荣兴盛创造了条件。

可以说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对于敦煌的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因而敦煌人民从没有忘却张骞的功绩，今日莫高窟中还存有张骞出使西域的壁画。

5. 敦煌郡的设立

占有河西地区以后，为施行有效统治，西汉先是于元狩二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在敦煌地区设立“酒泉玉门都尉”，隶属于邻近的酒泉郡。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敦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故数年后又分武威、酒泉地更设张掖郡和敦煌郡，与先设的 2 郡合称“河西四郡”（也有研究者认为四郡的设立次第是先酒泉、张掖，后敦煌、武威）。

关于敦煌郡的确切设置年代，历来异说纷陈。最早的为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说，最晚的为后元元年（公元前 88 年）。出现众多歧说的原因在于《史记》与《汉书》的记载各不相同，即便是《史记》中的《匈奴列传》与《大宛列传》，《汉书》

中的《武帝纪》、《食货志》和《地理志》之间的记载也自相矛盾，而司马光《资治通鉴·汉纪》与《汉书》的载录又不完全一致。学者们每每援引的是《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秋……，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和《汉书·地理志》：“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开。”敦煌郡，武帝后元[元]年分酒泉置。”现在流行诸说所主张的敦煌建郡年代皆在上限元鼎六年和下限后元元年范围之内，尤以元鼎六年说更易为人接受。

敦煌郡的建立是敦煌史上的大事，是敦煌正式划归汉帝国版图的开始，是确立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关键的一步，而敦煌有确切纪年的历史也始于敦煌郡的建立。

西汉时敦煌郡管辖的范围东及渊泉（今安西县双塔堡一带），西到阳关（今敦煌市南湖乡），北至伊吾（今新疆哈密），南接西羌（今青海柴达木），实际上是疏勒河以西，阳关、玉门关以东，包括今敦煌市、玉门市西部、安西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部分地区，以及新疆哈密市、焉耆回族自治县、库尔勒县、若羌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 20 万平方公里（见图 1）。

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西汉时期的敦煌郡统辖 6 县，即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县，其具体情况大致是：

敦煌县，为郡治所在，其郡治位于今敦煌城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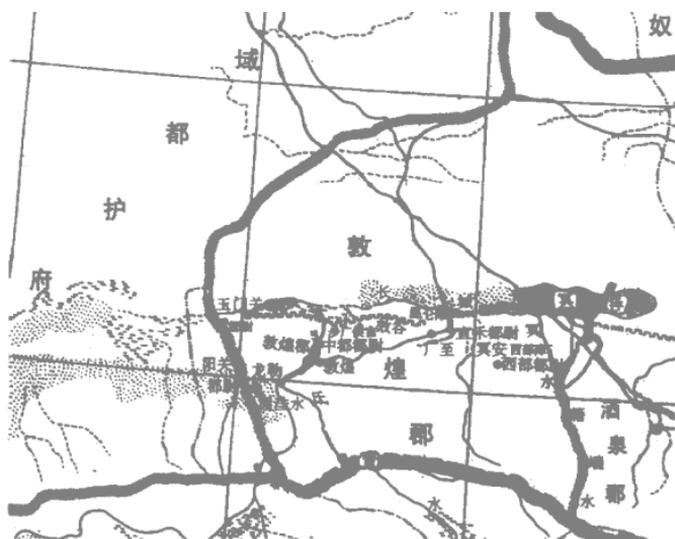


图 1 西汉敦煌郡简图

南，滨临党河西岸（现在的敦煌城在党河东面，是清代雍正三年，即 1725 年所建，非汉代之敦煌郡治），该县主要分布在党河东西两岸的绿洲之上。

冥安县，得名于冥水，冥水即今疏勒河。汉冥安县主要分布于冥水支流的下游绿洲，其四境为：东至冥水，南至大雪山，北至乱山子，西接广至县境。

效谷县，其县治的确切位置，目前尚有争议。其中一种说法认为，今敦煌市郭家堡乡墩湾村北的墩墩湾故城即是汉效谷县城。该县因元封六年（公元前 105 年）济南人崔不意在此教民力耕，“勤效

得谷”而得名。

渊泉县，因其地多泉水而得名，县治约在今安西县的东四道沟一带。汉渊泉县主要分布于冥泽以西诸泉之间的绿洲上。

广至县，位于今安西县南踏实乡西北的破城子就是汉广至县城。县区主要分布于榆林河（又名踏实河）下游绿洲，四境为：东接冥安县，西毗效谷县，北至汉塞墙，南抵大雪山。

龙勒县，因县南有龙勒山而得名，县治在今敦煌市南湖乡一带。该县主要分布于今南湖绿洲，包括今敦煌市西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北部。阳关、玉门关均在龙勒县境内。

西汉武帝时敦煌郡下属 6 县的位置大致如上。到王莽统治时期辖境沿仍未变而曾将郡名改为敦德，敦煌县亦改名敦德亭（吴初骧、余尧等学者据汉简考证出王莽曾在始建国元年改敦煌为文德，随后再改文德为敦德），又将广至县改名广桓县。

按照汉制规定，县下还有乡、亭、里的设置，百家为 1 里，10 里为 1 亭，10 亭为 1 乡。但敦煌地区地旷人稀，如敦煌县，人多时 2000 多户，少时则只有 1000 余户，所以 1 县至多只能置二三亭，尚不足设 1 乡，因而在出土的大批汉简中始终未发现有敦煌设乡的记载，只见到一些里名，如敦煌县的疆利里、大会里、南关里、寿陵里，龙勒县的万年里，效谷县的宜禾里，广至县的安庆里等。

据上述情况推测，西汉末敦煌县的更名为亭或

许也与县小人户少，只相当于一二亭有关。

6. 敦煌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

鉴于对匈奴贵族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潜在的威胁依然存在，西汉王朝除在行政上设立郡县外，还在敦煌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

首先，西汉于元封三四年间（公元前 108～前 107 年）在敦煌设立了玉门关和阳关作为通西域的门户。关于玉门关原来的位置，即汉武帝太初二年（公元前 103 年）以前玉门关是否由敦煌以东向西迁至小方盘城的问题，学术界曾进行过激烈争论，但一般都同意太初二年以后玉门关位于小方盘城一带的说法。小方盘城在今敦煌市西北 80 公里处，为西汉玉门都尉治所，其西 11 公里处的马圈湾附近则为玉门候官所在的城址。相传古代和阗（今新疆和田）的美玉就是经由这里传入内地的，所以人们将这一关口称为玉门关。阳关位于今敦煌市西南 70 公里处的南湖乡附近，当地的古董滩原为汉阳关都尉治所，古董滩以西沙漠中存留的大片建筑遗址约为古阳关遗址。阳关北距玉门关 70 公里，因位于玉门关之阳而得名。这两关分别是汉丝绸之路北道和南道的必经关口，也是界限夷夏，防止游牧民族入侵的战略要隘。

其次，西汉还在敦煌郡内修筑了众多城障烽燧，并相应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候望、通讯系统。元封三年（公元前 108 年），西汉将河南之战后已

加修到酒泉的长城又向西修筑到了敦煌郡的龙勒县，这样就将先此修建的，在籍端水（今名疏勒河）南岸东西排列的各个烽燧连接了起来。汉制在西北边防要地一般每隔 5 里左右建一个城堡和供施放烟火警报的烽台或烽墩，名为亭或燧，并派驻一定数量的屯戍士卒守护，由候长或燧长监管。隔若干亭、燧又修有较大的城堡，称为障，戍卒由候官统领，各候官则都隶属于都尉。那时敦煌郡内共设有 4 个都尉，即前面已经提到的玉门都尉、阳关都尉，及宜禾都尉和中部都尉。

西汉王朝对这些亭障烽燧的管理使用有一套严格的规定，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对此有详尽载录。按规定，戍卒们未经批准，一律不得擅离职守，每时每刻都必须认真巡察。遇有敌情时，白天用烽表或烽烟示警，夜晚则使用巨（炬）火或积薪。这些通讯设施在当时较为先进，通过它们可以用接力的形式迅速将敌情传至远方，甚至数千里外的首都长安。

敦煌郡建立后，汉朝还修筑了郡城外围的塞城、天田。塞城又称外城，是环卫郡城的重要屏障，塞城沿线也建有亭燧，称塞亭。天田，隋唐时又称土河，是军事防御体系中的侦察设施，为挖于山口等必经道口上的深沟道，平日用细沙散土填平，使人过留迹，戍卒每日检视足迹就可以知道过往兵马行人的情况。

敦煌郡设立的所有这些防御设施都具有积极意

义，它们共同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同时也为敦煌地区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条件。

7. 敦煌郡的建设与发展

自从匈奴浑邪王率部众降汉，迁居五属国以后，敦煌地区人口稀少，西汉政府遂积极采取措施加派戍卒，徙民实边以开发这一地区。

早在敦煌尚隶属于酒泉郡时就有部分移民被迁徙到了这里。敦煌立郡之后，西汉政府沿用秦和汉初在新设立的郡县屯田戍守、移民垦殖的办法，于建郡当年及其后多次徙民至此。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原居内地生活无着的农民，也有一些是带有家属的罪犯囚徒，他们的到来使敦煌地区的人口逐渐增多。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在西汉时人口最盛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敦煌郡已有 11200 户，38335 人，占西汉全国 103 个郡国总人口的 1/1500，这对繁荣发达的中原地区来说确实称不上人口稠密，人丁兴旺，但对建郡不久的敦煌而言却是极大的进步。经过这样大规模的移民，敦煌已从少数民族聚居区发展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地区，经济生活也从以游牧为主过渡为以农耕为主，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西汉时敦煌建立有严密的屯田组织，可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主要劳动力是戍卒和士兵，戍卒一面戍边一面生产，出征将士战时杀敌征战，平时种地耕田。军队自己解决吃粮问题，不仅减轻了

内地转运军粮的沉重负担，还对开发建设敦煌及河西地区做出了积极贡献。军屯中戍卒们耕种的全是政府的公田，所需粮食工具等由国家供给，垦田的收获也全部送交官仓。从事民屯的移民则由西汉政府贷给种子、耕牛及农具，在官府组织下统一生产，交租服役，所交约为收获的 40%~50%。西汉对屯田的管理十分严格，新开始屯垦的郡县一般都设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叫作农都尉或田官。

敦煌地区气候干燥，雨水稀少，农作物必须依赖引水灌溉方能生长。为有效地进行农业生产，西汉政府在水利建设方面曾做了大量努力，动用大批劳力利用疏勒河和党河两河河水开渠引流灌溉农田，并根据不同的地理条件，采取掘堰、筑堤、凿井等方式开辟水源和调节水量。汉武帝元鼎六年修建的马圈口堰就是敦煌最早的水利枢纽工程。

水利设施的完备为生产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随着屯守的戍卒和徙边移民的到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传到了敦煌，并被推广普及。耕作方式由原来比较落后的“纒田法”（即在已经锄过的土地上，不分行列地播撒种子，地力用尽后休耕一二年），改为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创造的“代田法”，这种代田法使畦垄相间，来年互调位置轮番耕作以调节地力，既使苗根扎得深，增强了农作物的抗风抗旱能力，又保持了土壤肥力，使耕地无须轮休，收到用力少而得谷多的效

果。代田法的推广又与牛耕、耒犁的使用分不开，汉武帝在徙民屯垦时皆配给耕牛、耒犁，促使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农具迅速传到边疆地区，对边地农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西汉政府多年的经营，敦煌很快就发展成了颇具实力的农业区和粮食基地。生产的粮食足以满足本地居民和戍卒的需要，甚至还有一定存余。太初三年（公元前 102 年），李广利再次西征大宛时，敦煌一地就集中安排了 6 万士兵、10 万头牛、3 万匹马，及驴、骡、驼等数以万计奔赴前线，充分显示了当时敦煌地区农业、畜牧业的兴旺。

农业、畜牧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进步，丝绸之路的畅通更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

历史上敦煌的盛衰，始终与丝路的顺畅与否及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状况密切相关。

西汉统治者曾多次用兵西域，与匈奴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并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迫使匈奴右地日逐王投降汉廷。西汉于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在轮台东北的乌垒城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中原王朝在西域建立起的第一个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它使整个西域，也包括今北疆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正式划入了汉王朝的版图。10 余年后，西汉又于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 48 年）在高昌壁（今吐鲁番东南）增置了戊己校尉。

西汉经营西域的这些举措使得敦煌逐渐从防御

匈奴的西部基地和远征西域的前哨阵地发展成了经营西域的根据地，为西汉争取和维护其对河西、西域地区的统治权作出了直接贡献，而西域的稳定和丝路的通达又反过来推动了敦煌的繁荣昌盛。自宣帝以后，匈奴力量衰弱，汉朝边患缓解，东西交通日益发达，河西敦煌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呈现出了太平繁华的景象，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了西汉末期。

8. 两汉之际河西敦煌地区的割据势力

西汉末年，中原地区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阶级内乱频仍，而河西地区相对于板荡中原来讲，却还称得上富庶安定，它偏居西隅，少受战火侵扰，同时又地当走廊，进可攻退可守。在这种形势下，河西敦煌便成了割据者的乐园。

首先割据河西的是儒士隗嚣，他本是天水人，曾经担任过州郡官吏。公元 23 年，当听到更始帝刘玄新立，王莽军队连连溃败的消息后，隗嚣的部下便公推他为“上将军”，于平襄（今甘肃秦州伏羌西北）聚众起事，趁王莽死后中原大乱之机，占据了金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 81 年设立，为“河西五郡”之一）、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并派人和更始帝取得了联系。更始帝承认了这个既成事实，封他为右将军、御史大夫。更始三年（公元 25 年）隗嚣得知刘秀在河北称帝，便图谋劫持更始帝东归，不料事情败露，只得逃归天

水，自称“西州上将军”，河西却易手他人。

继之而起的窦融远较隗嚣有远见。窦融祖辈是外戚，依仗亲属关系曾累世在河西为官，因而他对河西的情况十分了解。王莽垮台后窦融率部归降了更始帝，得任张掖属国都尉，窦融立即携家眷赶奔河西赴任。到河西后，他积极结交权贵，与酒泉太守梁统、金城太守庾（音 shè）钧、张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敦煌都尉辛彤等结伙。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月，河西正需要强有力的豪杰统领，五郡太守、都尉很快就推举窦融为“河西五郡大将军”，霸据河西。窦融擅长理政修边，对内实行习武修文，保境安民的政策，安抚百姓，发展生产，为政宽和；对外能有效地组织各郡共同抵御羌胡袭击，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使河西得以保持西汉以来的安定局面，周边郡国遭遇灾荒的百姓也纷纷投奔而来。

汉光武帝刘秀即位后，积极向西发展，与当时割占天水，冥顽不化的隗嚣发生了冲突。窦融审时度势，积极支持刘秀的统一事业，于建武五年（公元 29 年）派长史刘钧奉书献马，归顺东汉王朝。光武帝遂封他为凉州牧，统辖包括敦煌郡在内的 12 个郡国，98 个县，仍是河西地区的实际霸主。建武八年，刘秀亲征隗嚣，窦融率兵增援，攻下了许多城邑，被封为安丰侯。至隗嚣死，其子隗纯于建武十年降汉后，窦融在河西的势力已经非常强大，光武帝于是诏他奏事京师，不久又任他为冀州

牧，河西敦煌地区才真正处于东汉中央政权的直接掌握之中。

9. 东汉时敦煌地区的政治状况

东汉时敦煌仍然是全国的重要郡国之一，并始终是东汉政权继续抗击匈奴，经营西域，加强中西交通的基地。

两汉之际，始终没有归服汉王朝的北匈奴乘中原离乱又逐渐强大了起来，东汉初年恣意在西域地区攻城掠地，阻隔中西交通。西域各国人民迫切希望能与东汉恢复联系，并借助东汉之力驱逐匈奴。早在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西域诸国就曾遣使来朝，表示愿意内附，请求东汉重新设置都护府保护他们。但那时正值东汉政权建立不久，国内元气未复，还不具备反击匈奴和与西域密切关系的实力，因而光武帝未能应允他们的请求。

汉明帝（公元 57~75 年在位）时，北匈奴更加猖獗，已征服和控制了曾隶属于汉朝的西域大部分地区，甚至还驱使其西域属国多次进犯河西敦煌，严重破坏了边地汉民的生产与生活，直接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而此时的东汉经过几十年的恢复建设，国力已大为增强，遂以敦煌为根据地，展开了一系列反击斗争。其中最重要的一仗是永平十六年（公元 73 年）进行的。是年明帝令窦固等统率张掖、酒泉、敦煌等地的甲卒及羌胡骑兵万余人，两出酒泉、敦煌，大败北匈奴呼衍王，追击至

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打开了深入西域的大门，使自公元 16 年起断绝了近 50 年的丝路得以复通。

在这次战役中，我国历史上又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班超脱颖而出。他足智多谋，机警善辩，深得窦固赏识，被选为出使西域的使者。此后班超一直在西域活动了 30 多年，以自己的智慧和勇气艰苦努力，基本未借助强大武力，很快就恢复了与西域中断了的联系，并使西域 50 余国都陆续归顺了东汉。

在军事与外交胜利的基础上，东汉政府于永平十七年在龟兹重新设置了西域都护府和戊己校尉，屯驻高昌壁，又设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再次确立了中原王朝在西域的统治。但是，东汉在西域的统治不如西汉稳固，东汉时广大西域地区时而在东汉，时而又处在匈奴的控制之下，不能久通。公元 77~91 年东汉对北匈奴退让，放弃了西域，敦煌又经常遭受北匈奴骚扰。永元三年（公元 91 年）班超出任西域都护，大将军窦宪领兵击破北匈奴，西域又得畅通，敦煌在此后十几年中发展成了内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乃至中亚各国人民之间交通往来的联络点。永初元年（107 年）以后，东汉官吏庸劣，经常被北匈奴和一些西域小国攻杀，河西西域的政治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东汉被迫罢西域都护，作为都护副贰的护西域副校尉从元初七年（120 年）起常驻敦煌，丝路也再次中断。

东汉在西域统治的失利，反使敦煌在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从汉安帝 106~125

年在位)时起,东汉对西域实施的许多重要军事行动都是在敦煌太守的主持参与下进行的,同时从军出征或送亲人上前线也成了敦煌普通百姓生活中的常事。当时的敦煌太守似乎已逐渐代行起护西域副校尉西抚诸国、总护丝路南北道的职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东汉晚期西域似乎还处在敦煌郡的羁制之下。桓、灵二帝时节度西域的大权收归凉州,仍多要通过敦煌来行使,敦煌和西域始终保持着特殊关系。可以说自公元 2 世纪初护西域副校尉常驻敦煌以后,敦煌已成了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其地位得到了东汉朝廷和西域诸国的认可,西域许多小国的质子都曾留住敦煌。

10. 东汉时敦煌地区的经济与文化

东汉时的敦煌仍辖六县之地,与西汉时相较,辖境并无变化,只是将王莽时所改的郡县名称复原如旧,又将渊泉县更名拼泉县,在东汉末献帝(189~220 年在位)时还曾一度将敦煌隶属于新设的雍州。

东汉初期,敦煌的经济还称得上殷富,自明帝以后就逐渐衰落了。东汉前期河西敦煌地区继续实行招民实边,屯田戍守的政策。如永平十六年东汉政府曾通令各郡国地方官将部分罪犯遣送到朔方和敦煌屯田,并允许他们的家属跟随前往,为敦煌地区增加了部分劳动力。但是,东汉时期中国北方各边郡人口普遍减少,敦煌虽是其中减员最少的一

郡，与西汉相比，还是大不如前。早在东汉初年因与匈奴长期冲突，东汉就曾将部分居民徙入内地，随后与羌人连年争战，朝廷屡议放弃凉州，敦煌人户减少得更加迅速，远非少数移民所能弥补，至顺帝永和年间（136~141 年），敦煌郡内仅有 7048 户，29170 人。

与人口减少相应，敦煌的经济也无复往日的繁华。东汉末年中原大乱，中央政权自顾不暇，不再任命敦煌太守，当地大姓势力雄张，纷纷兼并土地，争夺徒附，致使贫富悬殊，农民生活无着。而纷乱中水利设施大量损毁，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破坏，粮食产量急剧下降，和帝永元年间（公元 89~105 年），敦煌与张掖、居延一样，因缺粮而需内地赈贷。此时敦煌经济中值得称道的是它的商业。东汉时西域地区虽三绝三通历经曲折，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却不绝如缕。从东汉中后期起，由敦煌出发进入西域的丝绸之路渐由原来的南、北两道，扩展成了南、中、新三道，而无论哪一道都必经敦煌，敦煌的地位就更加重要，商业也有了很大发展。早在班超任西域都护，即丝路第二次畅通时，敦煌就开始聚集了大批商人，逐步发展成了一个著名的商业城市，被史书盛赞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

东汉是敦煌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两汉之际中原动荡不安，而河西，特别是敦煌却相对富足稳定，这种局面吸引了大批中原士人前往避难，他们

带来了中原优秀的文化传统，使敦煌的文明程度迅速提高，很快赶上了内地的发展水平，甚至还涌现出一些硕儒大家，为全国和后世推崇。那时的敦煌文化名人首推张奂、张芝父子。张奂出生于儒林世家，不仅是有名的清官，更是著名的学者。他辍官后闭门讲学，授徒千人，对儒学在敦煌的普及作出了很大贡献。张芝是张奂的长子，好学善书，尤精草书。他习学名家崔瑗、杜操的草书，创制了今草和游丝草。其书体精劲绝伦，被后人称为“一笔飞白”，他本人更被尊为“草圣”。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对他的书迹赞赏不已。东汉时的学术多为家学传承，非世家大族不能为。张氏一门名人叠出，张芝弟弟张昶的书法也十分精妙。此外东汉末年敦煌还出了一位博士侯瑾。他自幼孤贫，苦学成才，曾作《矫世论》讥讽时弊，又著《汉皇德传》30篇，记汉光武帝至冲帝100多年间的史事。河西人民敬慕侯瑾的德才，尊他为“侯君”。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

魏晋南北朝是敦煌历史上最复杂多变的时期，政权更替频繁，先后经历了曹魏、西晋、前凉张氏、前秦苻氏、后凉吕氏、西凉李氏、北凉沮渠氏、北魏、西魏、北周等 10 个政权的统辖，其中西凉李暠还曾定都于此，使敦煌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都。这一时期敦煌的辖境也多次变化，历史上以“敦煌”命名的州郡、军镇等行政区划中，首推北魏时期敦煌军镇所辖的范围最大。这一时期敦煌的经济与文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令敦煌闻名遐迩的莫高窟就开创于前凉统治下的公元 366 年，这一年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起点。

1. 曹魏时期敦煌经济的复苏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曹魏控制着中国的北方，河西敦煌归曹魏统辖。

曹操当政时仍多沿东汉旧制，河西直至西域地区依然隶属于雍州。至曹丕代汉建魏，自立为魏文帝后，才又分置了凉州，敦煌郡重新划归凉州统领。关于当时的敦煌郡究竟辖多少县，比较通行的说法是曹魏时敦煌郡的地理面积并未增加，属县虽为 7 个，实际上仅是将汉时的广至县辖地一分为

二，增立宜禾县，该县故城位于今安西县西北。至于人口，河西敦煌本已因东汉政权镇压羌人起义的连年战争而人户萧条，至曹魏立国前后，各割据集团相互混战，更使当地人口急剧下降。曹魏初有金城郡时，该郡人口只剩下了东汉时的 $1/3$ ，估计与之同处河西的敦煌郡的情况也大率与此相仿。

人力的奇缺导致了生产的萎缩，曹魏初领河西时，敦煌满目疮痍。魏文帝执政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先是平定了各种反叛割据势力，为生产的恢复与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和平环境，继而又积极经营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加强统治，从而促进了敦煌商业的发展，并部分恢复了敦煌的战略地位。本世纪初以来在今新疆地区发现了大量与敦煌有关的魏晋文书，说明那时的敦煌确实与广大西域地区保有密切关系。

曹魏时期敦煌出现了两位很有名的太守。一位是魏明帝太和（227~232年）年间任职的仓慈，另一位是魏齐王曹芳统治时期（240~254年）在任的皇甫隆。仓慈在职期间着重解决了地方豪强对来进行贸易的西域杂胡的勒索问题，并建立了胡商交市和制订了有关商贾过境的各种规定，由敦煌地方政府为在敦煌进行交易活动的商人提供公平交易的保障，给想去都城洛阳做生意的胡商颁发过所（通行证），对将回归本国的商客还派兵沿途护送。仓慈推行的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敦煌地区商业的发展，使敦煌变成了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品贸

易中心和胡汉交往的都会。仓慈本人也因此赢得了商民的深深爱戴，他死后敦煌民众为他画像祭奠，西域商民也极其悲痛，聚集到西域戊己校尉的驻所，图形立祠哀悼他。

皇甫隆任敦煌太守期间，非常注意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改进灌溉方法，教农民适量用水，又大力推行先进的生产工具耒犁，使劳动力节约一半，而收获却能增加一半，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由此敦煌的农业生产不仅得到了恢复，还进而发展成了农耕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之一。

在这些清廉的地方官吏的努力下，敦煌的经济生活很快进入了正常发展的轨道，人口逐渐增加，社会环境基本安定，这种情况大约一直延续到曹魏末年。

2. 西晋时期进一步发展的敦煌经济与文化

西晋王朝对敦煌郡县又作了一番调整，将冥安、渊泉两县分别改名为宜安、深泉，将西汉时就已设立，原属酒泉郡的乾齐县改隶于敦煌郡，同时还另外增设了昌蒲县。这样，西晋前期敦煌郡的辖境大体包括了今敦煌市、安西县，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部和玉门市的西部地区，比两汉时增大了一些。但是到晋惠帝元康五年（295年），西晋将位于敦煌郡东境的宜禾、冥安、深泉、广至等县分出，另行设置了晋昌郡，使西晋后期的敦煌郡仅有

昌蒲、敦煌、龙勒、效谷 4 县，辖区仅及今敦煌市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北部，面积大减。

西晋政府领有河西敦煌后，继续沿用曹魏以来的各项政策，使这一地区得以延续魏时的繁荣。随着西晋经营西域活动的展开，敦煌的经济与文化更获得了新的发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人口的多少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尺度。随着大量流民纷纷回归故土，西晋时敦煌的人户已达六七千户，虽不及两汉，却远胜于曹魏。人口的增多促成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晋武帝咸宁元年（275 年）敦煌郡内已修筑了储存军粮的大型仓城——河仓城，表明当时的农业已有很大进步，可以大规模储粮了。

西晋时敦煌商业发展很快，那时在敦煌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原居住于中亚等地的粟特人，他们之中有行商，也有坐贾，行商们将敦煌视为中转站，经由这里更向河西东部甚至中原内地进行贸易。有关这些商人的活动现在已经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材料，据研究，写于西晋末年的“粟特文古信札”就记载了粟特商人在敦煌、酒泉、金城、洛阳等地的活动情况，并提到当时居住在敦煌的粟特自由民有百家之多，说明敦煌此时已逐渐恢复了商业都会的地位。

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是文化的进步。东汉末年以来中原文人大量涌入，西晋时的敦煌已拥有了相当厚实的文化基础，出现了许多世族文人。在传

统儒学方面最负盛名的是索靖、汜衷、张翹、索紉、索永等“敦煌五龙”，内中又尤以索靖更为后世推崇。索靖曾在晋朝任高官司空，著有《索子》、（晋诗）各 20 卷，他又善草书，撰写了论述草书形体结构的专著《草书状》，是中国书法史上著名的大书法家。

除儒学之外，晋时道教也开始在敦煌流行起来。道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很早，汉代就有一位名叫议（蚁）君的道士被贬斥到了敦煌，但其活动情形已难确考。西晋时有关敦煌道教的材料渐渐多了起来，本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就曾发现过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篆，而在敦煌地区规模宏大的魏晋墓葬群中，道教的内容就更加丰富，从中可以找到神仙崇拜、羽化飞升思想的影响。

在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西晋时的敦煌还接纳了外来文化——佛教文化。敦煌地当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印度与西域高僧东行传法的必经之地。佛教至晚在东汉明帝时就已传入内地，敦煌对佛教也当有所接触，但那时敦煌的居民主要是贫苦的农民和屯戍的士兵，不具备广泛传播佛教的文化基础。魏晋时敦煌的文化积淀已相当深厚，逗留，甚至定居敦煌的西域胡商日益增多，当地人民对佛教信仰的具体内容有了较多了解，这样曹魏末年敦煌地区便出现了最早的传教佛僧。据《高僧传》记载，3 世纪中叶，高僧竺高座就曾在敦煌活动，并收竺法护为徒，法护则主要活动于西晋。

竺法护本是月氏人，原名昙摩罗刹，“法护”是中土人对他的称呼。他曾游历西域、中原，通晓 36 国语言，一生致力于西行取经、译经，共译出佛教经典 100 余部，其中《修行道地经》和《不退转法轮经》等就是太康五年（284 年）以后在敦煌译出的，当时敦煌已有许多胡汉僧徒参与协助译经，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译经团体，法护就是这个团体的中心和领袖，被人们尊称为“敦煌菩萨”。

协助法护译经的主要弟子是法乘，他曾追随并师事法护，往来于敦煌与长安之间，后来因避难西来，在敦煌定居，并积极建立寺院，开设讲筵，教授僧徒，诲而不倦，为弘扬佛法忘身为道，最终圆寂于敦煌，也是敦煌佛教传播史上的关键人物之

竺法护，法乘等高僧的出现显示出西晋时佛教在敦煌已十分盛行。那时敦煌佛教的特点是专重译经、诲人知礼，虽尚处于初期阶段，却已为几十年后敦煌成为佛教圣地，创建莫高窟打下了基础。

3. 前凉张氏在河西敦煌的统治

西晋统一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永嘉之乱”以后，北中国很快进入了大分裂的十六国时期。十六国中的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都建立并发展于西北地区，河西敦煌也渐次成为了它们的辖地。

最先占有河西的是前凉张氏，其奠基者张轨是

一位很有见识的统治者。永宁元年（301年），晋惠帝任命张轨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张轨立即走马上任。那时的西晋已因战乱而国力衰弱，自身难保，根本无力过问边地的政事，所以张氏虽然奉晋室正朔多年，但在河西的统治实际上却是非常独立的，张轨此次上任也就是张氏在河西长达76年统治的开始。

4世纪初，鲜卑贵族曾在西北猖獗一时，人民受其骚扰，苦不堪言。张轨到任后立即调兵遣将，很快就将他们镇压下去，得到了河西人民的拥戴，为张氏政权以后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站稳脚跟后，张轨为张氏政权制订了一系列政策，开始经营河西。在政治上，张氏极力推行拥戴司马氏、维护晋室的政策，从而赢得了河西汉族人民的信任与支持，走廊内部得以长期保持安定局面，抗御住少数民族贵族的袭击，并博得关陇地区汉族人民的赞赏，邻地的百姓纷纷投奔凉州。

张氏政权改变拥戴晋室的方针始于张骏末年。345年岁末，张骏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假凉王，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因而有些研究者将这一年算作前凉割据政权的起始。次年五月张骏病死，世子张重华继位为假凉王。至349年，张重华自称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公开脱离了晋室的羁縻。到张祚掌权后更僭帝位，立皇后，封太子，改年号为“和平”。这对前凉的统治产生了消极影响。

张氏在政治上的另一个策略是联合河西大族，

借助他们的力量稳固统治。汉武帝以后几百年的发展使魏晋时的河西敦煌形成了一些名门望族，具有左右当地形势的实力。张轨出身于世族家庭，对这一点的认识自然十分深刻，他赴任之初就以敦煌人宋配、阴充、氾瑗等为股肱谋士，选用豪族子弟参与地方政权，以作为他在河西创立基业的保障。张轨的后继者们也一贯奉行此项策略，如张茂当政时就曾以望门显贵阴澹为敦煌太守。

张氏在军事和外交上总是根据具体形势随时调整对敌政策，且战且和。这种灵活多变政策的准确运用使得前凉统治区安定少难。在张氏统治的 70 多年中，敦煌一直没有遭受少数民族贵族的掠夺践踏，相反，张氏的势力范围还有所扩展，张氏版图最大时东起陇西、河南，西至高昌，领有今甘肃、青海、新疆 3 大省区的大部分地区，是除石勒所建后赵以外，中国北方辖地最大的政权。与此同时，张氏还以敦煌为基地经营西域。本世纪初，日本人桔瑞超曾盗掘出一件前凉西域长史李柏写给焉耆王的信稿，信稿写于 346 年前后，正是张重华统治时期，说明直至 4 世纪中叶，张氏政权都还有力地控制着今新疆中部吐鲁番以西的广大地区。这样敦煌等地便获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张氏初领敦煌时，敦煌郡原辖 6 县，即敦煌、昌蒲、龙勒、效谷、乌泽和凉兴，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敦煌市、安西县的西部，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北部，比西晋前期的辖境小多了。后来前凉更将

乌泽、凉兴 2 县分出，与晋昌郡的宜禾等 3 县合立为凉兴郡，这样敦煌郡内仅余 4 县，面积更小了。敦煌郡原属凉州，张骏在位时曾将敦煌、晋昌、高昌、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 3 郡 3 营合并，依境内的鸣沙山取名为“沙州”，这是历史上“沙州”一名在敦煌地区的首次出现，当时的州治就设在敦煌。但事隔不久，前凉又曾一度取消沙州，复称敦煌郡。

前凉在设置沙州的同时，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沙州刺史，杨宣留给后人的最主要的政绩是修筑阳开渠和北府渠。阳开渠位于州南，长 15 里；北府渠位于州东，长 45 里，石作工程非常大，是杨宣用家藏的万斛粟米买石修建的，这条长渠的修造质量很高，以至到几百年后的盛唐时还能使用。除杨宣外，张茂时的敦煌太守阴澹也修建过阴安渠，长 7 里。历任地方官注重水渠的营造和维修，表明当时敦煌的农业经济又有了新发展。

出身于儒学世家的张氏统治者很重视发展文化事业。张轨、张骏等都注意吸引文人学士迁居凉州，鼓励他们兴学授徒，传播学术。前凉末主张天锡还以文人自居，下属官吏争相仿效，拜师求学蔚然成风，遂使中原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大行于河西敦煌。

前凉张氏时期，敦煌等地的佛教信仰也盛行起来，各种佛教活动中又以禅业发展最快，4 世纪中叶就出现了苦行修禅的僧人，如单道开、竺昙猷等

高僧都曾在敦煌修习禅法。修禅讲究静坐苦修，摒除杂念，一心向佛，以求解脱。静坐需要建寺开窟，一心向佛需要巡礼观像。当时敦煌云集了相当数量的西域僧人，他们在带来修禅方法的同时，也传播了印度的石窟艺术，敦煌随之开始了各种开窟造像活动，其中对敦煌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莫高窟的开凿，它不仅使敦煌在中国家喻户晓，在世界声名卓著，同时也使得敦煌史与其他地区的地方史有了很大区别，而具有更多的宗教、文化与艺术色彩。

4. 莫高窟的创建

目前所见记载莫高窟首创情况的文字资料主要有 3 件：

武周圣历元年（698 年）五月十四日立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简称《李义碑》；敦煌藏经洞中所存古代遗书《莫高窟记》（今编 P.3720 号）；莫高窟第 156 窟前室北壁左上方的墨书题记《莫高窟记》。3 件材料中以《李义碑》的时代最早，有关莫高窟初期历史的几个问题多以它为据。

莫高窟的开创者是沙门乐僔，当是一位禅僧。他创建莫高窟似乎有点偶然，据说有一次他杖锡穿行在三危山、鸣沙山间，猛抬头望见三危山顶的万道霞光中有无数金佛涌现，圣妙无比。乐僔大受感动，认定三危山是佛门圣地，自己与佛法有缘，幻见的金佛就是真正的神佛，神佛在启示自己于此弘

法。乐僔于是发愿，在鸣沙山麓开凿了第一洞石窟，揭开了敦煌石窟艺术史的第一页。关于乐僔开窟的时间，敦煌遗书《沙州地志》（P.2691 背）记为 353 年，不过更可信的似乎还是 366 年的说法，《李义碑》等记为“建元二年”。建元是前秦苻坚的年号，实际上 366 年时统治敦煌的仍然是前凉张氏，不可能用前秦年号，“建元二年”应是前秦占领敦煌之后，当地人追述往事时的说法。

关于莫高窟所处的确切地理位置，有两点需要说明。

其一，莫高窟系开凿在鸣沙山东端的崖壁上，有的书上却说是建于三危山，那实际上是就鸣沙山所属山脉总称而言的笼统说法。三危山一名有广狭之分，广义的三危山是指横跨安西、敦煌两县中部的山脉，全长 200 多公里，它被几道山沟断切为若干段，每段又各有具体名称，其中鸣沙山是指今党河水库向东 40 公里至大泉河一段的山体，正是莫高窟的所在，而自大泉河向东 42 公里至东水沟一段的山体乃是狭义的三危山，它西与鸣沙山相对，主峰距莫高窟依托的崖壁约 5 公里左右。

其二，莫高窟距离敦煌县城的里程过去常称为 25 里，那是指走直捷便道而言，实际上历代道路常有变动，距离里数的变化也就相当大。现在人们从敦煌市去莫高窟多乘汽车走公路，出城后先向东，再折南至窟，路线呈矩尺形，里程也较捷路增加了一倍，所以现在人们常说莫高窟距市区的距离

是 25 公里。

有关莫高窟一名的涵义和由来也颇令人费解。有人直解作“漠高”的简写，认为是指沙漠高处；也有人认为与佛教专名词“妙高”有关，因唐代敦煌妙、莫同音，妙高也就借写为莫高。妙高是梵文苏迷卢的意译，本指须弥山（古印度神话传说中认为须弥山是人们所住世界的中心，佛教兴起后沿用此说）。

5. 前秦苻氏经营敦煌西域的重大举措

376 年，氏族建立的前秦动用 13 万兵力攻打前凉，张天锡企图联合西域进行抵抗，但没能成功，河西敦煌很快就被前秦占领了。为加强统治，秦主苻坚将以张天锡为首的前凉豪族望姓 7000 余户强行迁徙到长安、关中一带，使他们失去了复兴的基础。前凉旧臣也被层层分化，一些比较驯服而又有才干、威望的前凉故吏被授予了前秦官职，如原敦煌太守张然就被委任为尚书郎。与此同时，苻坚还选派了大量前秦官吏担任河西的州县长官，被任命为敦煌太守的是羌族贵族姚静。这样，苻坚很快建立起了在河西走廊的统治秩序。在前秦统治的 10 年里，敦煌地区基本是安定的，社会生产、文化事业都在前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苻坚是一位好大喜功的封建君主，占有河西敦煌以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地域更加广阔西域。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敦煌再次受到统治者的重

视。苻秦首先充实了敦煌的人户，于建元末年将江汉、中原地区的百姓 17000 多户迁徙到这里，使敦煌人口在短期内迅速增多，极有利于敦煌郡地的充分开发，这次移民规模极大，在敦煌历史上非常有名。充实敦煌的同时，苻坚又派遣凉州刺史梁熙出使西域，进行实地勘察与外交上的准备。梁熙一路宣扬前秦威德，并用大量繒彩结好各国，很快招致了许多小国遣使朝秦。他们带来的西域珍宝异物令前秦统治者大开眼界，刺激了他们的贪欲，有关高僧鸠摩罗什的神异传说更使得笃信佛教的苻坚大为仰慕，急切地想迎请罗什来朝。而此时西域诸国也热切希望与强大的前秦帝国建立友好关系，鄯善王、车师前部王都奏请永置西域都护，表示愿为出关王师作向导。这样，苻坚便命令大将吕光出征西域。

吕光字世明，略阳（今甘肃清水西南）地区氏族，他智勇兼备，深得苻坚宠信。建元十八年（382 年），吕光统领着前秦精兵 7 万余人，内中有铁骑 5000 余人，浩浩荡荡地出征了。吕光西征的主要对象是焉耆和龟兹。这两国地当丝绸之路的中道和新道，恃险不服，使二道受阻，它们又控制和影响着许多西域小国，在西域地区举足轻重，能否战胜它们是西征成败的关键。吕光大军西渡流沙，远涉戈壁，勇猛善战，很快就平定了这两个西域大国，并令其他国家纷纷归附，取得了巨大胜利。

吕光西征是继东汉之后中原王朝为经营西域，

打通丝绸之路所进行的军事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这次行动的胜利本是前秦在西域建立行政统治的最好时机。但是，苻秦的目的没能达到。苻坚穷兵黩武，在政局不稳的情况下盲目东征西讨，特别是为伐晋所进行的全国性征发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苻秦王朝摇摇欲坠，383年淝水之战的惨败更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庞大的前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了。吕光西征的成果非但没能为前秦所用，反倒为后凉的建立，及从前秦手中夺取河西敦煌提供了契机。

6. 后凉吕氏对河西敦煌的统治

385年，吕光班师东返，他延请到了高僧鸠摩罗什，罗致了大量的珍宝、名马，还招来了西域的商队。但走到凉州时，却得到了苻秦败亡的消息。吕光于是决定就地割据，所统率的前秦军队和西征得来的战利品都成为他称霸河西的基础。吕光首先驱逐了前秦的凉州刺史，占据姑臧，于386年自称凉州牧、酒泉公，389年自称三河王，并置官建号，至396年进一步自称天王，改元龙飞，建国号大凉，历史上称其为后凉。

后凉统治河西18年，这期间，敦煌历史的总的特点是战乱不息，民不聊生。

后凉的4位统治者都十分好战，特别是吕光曾用武力统一了河西，将后凉版图扩展至今西宁地区。但这种军事统治很不稳固，到吕光末年时就已

出现了北凉、南凉与后凉分离独立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后凉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无能乏术，提不出适时的政策和有效的统治措施。

399 年吕光病死，三子争位，互相残杀，加速了后凉的灭亡。神鼎元年（401 年）新兴的后秦发动了对后凉的进攻，迫使吕隆投降，后秦任他为凉州刺史、建康公，令他留居姑臧，以利用吕氏势力抗御河西群雄，这样吕隆又在姑臧维持了两年，但内忧外患迫使他在神鼎三年主动请求赴长安居住，后凉彻底灭亡，而敦煌在此前数年已易手他人。

7. 北凉的短期过渡与西凉李氏时期的敦煌

后凉统治末期的 397 年，张掖卢水胡人沮渠蒙逊因伯父被吕光杀害怒而反叛，他推举后凉的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改元神玺，建立了北凉，占据了河西走廊的西段。当时的晋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孟敏先后投靠了段业，段业除继续留用孟敏，并授他沙州刺史的虚衔外，还于 398 年任命敦煌望族李暠为效谷县令。

李暠据说是西汉将军李广的后代，从李广始李家定居河西，世代为官，在当地声望很高。李暠本人也很有才干，擅长理政用人，深得吏民爱戴，敦煌太守孟敏故世以后，敦煌地区的豪族大姓立即推举他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而段业派来接替孟敏职位的新太守却被驱逐回去了。段业无奈，只得重

新任用李暠，使他得以在敦煌名正言顺地积蓄力量。

此时北凉内部段业和沮渠蒙逊的矛盾已经尖锐起来。沮渠蒙逊的先祖曾任匈奴左沮渠，后世便以官为姓。拥段业立国后，沮渠蒙逊被任命为张掖太守，后又封为临池侯，他工于心计，擅长弄权，终于设计杀掉了段业，于 401 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张掖公，改年号为永安，北凉转为沮渠氏所有。

在北凉最高统治层忙于争斗的过程中，河西地区一片混乱，李暠的羽翼却丰满起来，敦煌世族公推他为护羌校尉、领秦凉二州牧、凉公，于 400 年正式脱离北凉，改元庚子，建制于敦煌，史称西凉。有史以来，敦煌第一次成为一个国都。

李暠是在敦煌地方势力的支持下建国的，所以对当地士人特别重视，西凉政权的大小官职基本都为他们所把持。敦煌又是西凉政权的发源地和建国初期的国都，在地方建设上也很受重视。仅举敦煌城及其辅助设施的建设为例，西凉在敦煌城南门外修筑了靖恭堂、谦德堂、嘉纳堂，并仿照中原的“明堂”，于其内图赞人物，在城外还修补了敦煌旧塞、土河，又在南边的子（紫）亭山上筑城，以抵御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这些措施为敦煌和平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也极大改善了敦煌的城市建设。

西凉立国之初仅领有玉门以西地区，以敦煌为国都完全可以实施有效统治。但庚子二年（401

年)以后,因北凉大乱,原属北凉的酒泉、凉宁二郡投降了李暠,西凉的国土向东扩展到了张掖弱水附近,国都的位置就显得太靠西了,难于管理东部领地和继续向东发展。405年,李暠决定迁都酒泉,任宋繇为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李让一同镇守敦煌,继续保卫、经理这一地区。但就在这次迁都时,李暠将前秦时从江汉、中州移入,和后凉时自武威、张掖以东西奔而来的大部分移民又东迁到了新都所在的酒泉,这次强行迁徙的移民超过了23000户,对敦煌的影响不小。

西凉可以真正统辖的区域最大时北起西海郡,南达祁连山,东迄酒泉郡,西抵高昌郡,只相当于今天甘肃省的酒泉、玉门、安西、敦煌数县市及新疆东部的一小块,狭长如带,又与沙碛相连,除敦煌地区以外,百姓稀少,土地瘠薄,自然条件确实不是很好。当时在西凉附近并存的却是两个强国:北凉雄踞于河西中部,南凉称霸于走廊东南,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严重威胁着西凉。在这种形势下西凉政权能够存在20年,并在西北各割据政权中拥有较大影响,始终保持先进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执国的李氏是汉人,颇具号召力,另一方面也与李暠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有关。

首先,李暠十分重视汉族人民尊奉晋室的心理,于建初元年(405年)先后两次派人赴建康,向东晋朝廷奉表称臣,从而赢得了河西及周边汉人的支持。

在处理与附近邻国的关系上，李暠采用远交近攻的策略，交好南凉，对强大的北凉则仿效前凉张氏应付强邻的办法，和战相济，为境内的发展赢得了稳定的外部环境。

在内政方面，李暠也能施行积极有效的措施，重用贤才，曾按照汉魏选拔官吏的方法，实行察举制。大量的清官良吏保障了李暠治国方略的贯彻，西凉的各级官员都能注意发展辖区内的农业生产，鼓励百姓耕植，使后凉留下的千疮百孔的局面很快得以改观。

李暠出身于文化水平很高的汉人家庭，这样的文化素养决定了他当政后非常重视发展文教事业。早在立国之初，他就积极在敦煌创办学校，这是敦煌地区兴办官学的最早记录，对整个敦煌地区文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李暠还极其尊重儒士，为他们招徒授学、著书立说创造条件，造就了许多著名学者。

在李暠统治的近 20 年中，西凉，特别是敦煌地区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深受周边国家敬重。

建初十三年李暠去世，临死前他还谆谆告诫子孙要为政宽简，重视敦煌。李歆继位之初尚能恪守父训，将敦煌西凉的繁荣又延续了一段时间，在与北凉的战争中还曾取胜。但是不久李歆就骄傲起来，不听劝诫，大建宫室，使国力匮乏，又盲目地要与北凉争斗，终于在嘉兴四年（420 年）中计败

北，自己也送了性命。

李歆败亡后，其弟酒泉太守李翻弃城西逃，到了其父起家的地方敦煌，敦煌便成了西凉政权的最后一个据点。但沮渠蒙逊很快就把握住了酒泉的局面，并进而发兵西攻敦煌。李翻与其弟敦煌太守李恂（洵）等只得撤出敦煌，逃往北山，北凉遂派索元绪出任敦煌太守。索元绪到任后暴戾专杀，大失民心，敦煌民众十分怀念西凉李氏，望族大姓书信札密招李恂。李恂乃于九月率数十骑人马返回敦煌，逼走索元绪，自立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元永建。不久沮渠蒙逊又派军将攻打敦煌，李恂闭门不战，西凉李暠时建筑的敦煌城垣十分坚固，北凉士兵只能望城兴叹。到 421 年二月，沮渠蒙逊不得不亲自统率两万兵丁前来攻城，令兵士从三面筑堤堵水灌城。此时西凉的武卫将军张弘、敦煌长史宋承义等打开城门投降北凉，李恂战败自杀，李歆子重耳南奔刘宋，李翻子李宝被押送到姑臧，西凉最终灭亡。

8. 北凉沮渠氏时期的敦煌儒学与佛教

沮渠蒙逊攻破敦煌城后，怨恨当地人民的拒守不服，大肆屠城残杀百姓，这是敦煌历史上极为惨烈的一幕，经此毁灭性残害，敦煌人口锐减。

433 年四月，沮渠蒙逊死，其子原敦煌太守沮渠牧犍继位，改元永和。沮渠牧犍的才能远远不如他的父亲，又荒于政事，当政不久就引起了境内官

民的不满。

此时拓跋氏建立的北魏逐渐强大起来，439年北魏攻入姑臧，牧犍投降，沮渠无讳等向西投靠敦煌太守沮渠唐儿，敦煌又变成了北凉在河西走廊的最后一个据点。440年沮渠无讳率兵反攻魏军，夺回了酒泉，但在反攻张掖时却遭失败，后又缺粮，只得投降北魏。不久，沮渠唐儿率万人叛魏，虽被无讳发兵平息，但仍然影响了北魏统治者对沮渠氏的信任。441年沮渠无讳只得率军又向西撤回敦煌，北魏遣将追击，迫使无讳于次年率领北凉遗民万余家弃敦煌而再向西逃，投靠已在鄯善站稳脚跟的沮渠安周，以后在西域又有所发展，直到460年才被柔然彻底消灭。但是他们此次携民西奔却使敦煌人户再减，所余人口已不及前凉、前秦时的1/10，社会经济更趋衰落。

沮渠氏统领的北凉占据敦煌20年，没有造成经济繁荣的局面，但在此期间敦煌儒学与佛教的发展却十分引人注目。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据有敦煌的最后一个割据王朝，前此的几个王国，特别是前凉和西凉已为敦煌文化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北凉时已造就了如刘昞、索敞、索袭、索紞、索綽、张穆、张斌、张湛、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成为河西儒学的领袖。可以说，在河西地区的文人学士中，敦煌学者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也最大。河西地区具有

典型性、代表性和重大影响的文人多出自敦煌。当时敦煌学者的许多著作都传出了走廊，其水平并不亚于中原北方甚至东晋南朝的著述，正是他们为保存中原学术，和日后魏周乃至隋唐文化的大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敦煌学者中最负盛名的是刘昉，刘昉号玄处先生，是西晋名儒郭瑀的弟子，自己又有学生数百，著有《敦煌实录》、《略记》、《凉书》、《方言》等书。刘昉在西凉时已闻名遐迩，进入北凉后统治者仍然对他比较重视。

北凉时期，敦煌的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十六国时期社会动荡，黎民不安，贫穷百姓不得不于无奈中寄情神佛。而政权更迭的反复无常也使统治者惶惶不安，需要乞求冥冥中的神灵保护其政权长久，特别是少数民族统治者更需要以“戎神”为精神支柱。因而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许多小王国都视佛教为护国法宝，定为国教，加以倡导，僧人也被尊为国师，具有很高地位，甚至可以参与朝政。

北凉沮渠氏佞佛尤甚，在他们的提倡下，本已具有相当基础的敦煌佛教更加炽盛。这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北凉时在敦煌译经的僧人中有一位著名的大翻译家昙无讖。他本是中印度人，后由罽宾经龟兹、鄯善来到了敦煌，在此停留数年，熟悉了汉语。昙无讖共译佛经 11 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36 卷《大般涅槃经》。这部经宣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对当时佛教的广泛流布非常有利，因而

刚刚译出就被大量抄录复制，有力推动了敦煌与河西佛教的蓬勃发展。北凉佛教又重禅业，盛行静坐参禅，现已在敦煌地区发现的 3 座北凉时期的小型石塔就是供当时僧人苦修观像用的。至于与禅业相关的莫高窟的开凿自然更受到了僧俗信徒们的特别重视，终凉之世修造不已。

9. 北朝统辖时期的敦煌

北凉灭西凉时，曾将俘获的李暠孙李宝押送到了姑臧，但不久李宝就寻机逃回晋昌，并再西奔伊吾，在那里长住下来，以后前去投奔他的西凉遗族有 2000 多家。当北凉沮渠无讳撤出敦煌后，李宝就率领着这批人迁回了故土，着手重建敦煌。李宝一面安集百姓，修缮城府，一面派弟弟怀达赴平城入朝北魏，请求内附。太武帝拓跋焘遂拜李宝为沙州牧、敦煌公，又任怀达为散骑常侍、敦煌太守，让他们留居敦煌，直到 444 年北魏才将李宝召往平城，将敦煌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北魏接管敦煌后，很快就在这里设立了军镇，统领酒泉军、张掖军、晋昌戍、乐涇戍等，管辖范围似乎已及西汉时的酒泉郡，因而历史上以敦煌为名的州郡、军镇等行政区划中，要数北魏时敦煌镇的辖地最大。这次设镇对敦煌的影响很大，势力范围的增大尚在其次，最主要的是将河西走廊西端的政治中心又从酒泉移回了敦煌。

北魏重视敦煌的原因在于它所处的重要战略地

位。北魏平定建都张掖的北凉，标志着中国北方的统一。这个新兴王朝又将敦煌视为经营西域、向西进取的据点，以后成周公万度归两度经由这里西破鄯善、焉耆、龟兹，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打通了断绝多年的丝绸之路，敦煌的政治地位更加突出，自 405 年西凉李暠迁都酒泉后，敦煌无力制御西域的形势至此有了极大改观。

但是当时在北魏的西北地区存在着一股强大的游牧民族势力柔然，他们不断向西域、河西扩张。太武帝（423~452 年在位）统治晚期，北魏在西部地区强于柔然的优势已经动摇，文成帝（452~466 年在位）初遂调任熟悉柔然事务，并以骁烈闻名的尉眷镇守敦煌。献文帝（466~471 年在位）时柔然更加强盛，控制了敦煌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北魏在西域的兵力渐被柔然消灭，敦煌也多次受柔然骚扰。如孝文帝延兴二年（472 年）柔然发 3 万骑兵包围了敦煌，接替尉眷任敦煌镇将的尉多侯率镇兵英勇奋战，才将柔然骑兵击退。不久柔然军队又来偷袭，尉多侯只得再次苦战。至延兴三年、四年时，柔然仍旧不断围困敦煌，虽都被镇将尉多侯、乐洛生打败，但北魏朝廷属官中已有人提出了放弃敦煌，退守凉州的主张。赞同的人非常多，仅韩秀等人反对，指出如果放弃敦煌，北魏王朝的统治将受到威胁。孝文帝支持他们的意见，并采取实际措施，加强敦煌镇的守备，设置都大将，将敦煌镇升级，敦煌终得保全。最早见于文献的敦

煌镇都大将是文成帝婿，长乐王秦州刺史穆亮，他在任期间政尚宽简，振恤贫乏，很受百姓的爱戴，对加强敦煌实力起了很大作用。

在北魏向敦煌派驻镇都大将的同时，5世纪80年代，柔然的劲敌高车逐渐强大了起来，与北魏呼应，夹击柔然，柔然衰微，进入6世纪以后，敦煌终于安定了下来。

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年），北魏罢敦煌镇置瓜州，敦煌变成了瓜州属郡，仅领有敦煌、平康、东乡、效谷、龙勒（正光年间更名为寿昌）、阳关等6县（一说还应当加上鸣沙，共7县），面积大为缩小，仅及今敦煌一市之地。待至北魏末西魏初时，效谷、寿昌两县又改立为郡，敦煌至多只辖有5县，相当于今敦煌市区及其附近地区，范围更小了。

大约与取消军镇同时或稍后，北魏在敦煌的统治开始不稳，只得改派大员前来镇守，这样明元帝的四世孙元荣便从洛阳而来，出任瓜州刺史。在他的治理下，敦煌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并有所发展。

北魏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爆发了六镇起义，派往镇压各地起义的高欢、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也发生分裂，造成东、西魏和以后北齐、北周政权的分立。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长安，次年被控制长安的宇文泰酖杀，宇文泰另立文帝，史称西魏，敦煌转为西魏所有。

西魏初期，东阳王元荣以宗室王身份留任瓜州

刺史，继续掌领敦煌。纷乱多变的政治局面令元荣更加佞佛，在敦煌地区大兴佛事，施写了几百部佛经，并掀起了继北凉之后莫高窟第二个建窟热潮。

宇文泰死后，557年其子宇文觉（北周孝闵帝）“受禅”，废魏自立，建立北周，敦煌又转辖于北周。

北周对敦煌地区的建置又做了两次变动。先是废阳关县，复效谷、寿昌 2 郡为县，并入敦煌郡。后又于建德二年（573 年）将敦煌、鸣沙、平康、效谷、东乡、龙勒（原寿昌郡）合并为鸣沙县，使北周后期的敦煌郡仅辖有鸣沙一县，辖境基本与北魏中后期的敦煌郡相当，仅及于今敦煌市地。

敦煌是宇文王朝的西部重镇。约在并立鸣沙县之前，北周便派建平公于义出任瓜州刺史，于义虔诚信佛，也是莫高窟兴建史上的重要人物，现在研究者们推测莫高窟第 428 窟就是他开凿的。

北周武帝建德三年（574 年）宇文邕曾在全国范围内灭佛，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法难之一，瓜州大乘寺的几座塔也毁于这一事件中。但因偏居西隅和地方执政者信佛等原因，敦煌的佛窟兴建活动却并未受到多大影响，莫高窟和西千佛洞中至今还保留着许多有精美壁画、塑像的北周洞窟。

10.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

莫高窟艺术由建筑艺术、雕塑艺术和壁画艺术 3 大部分组成，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既

有各自的鲜明特色，又有紧密的内在联系。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主要是指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莫高窟艺术，个别隋初营建的洞窟虽然也可以包括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数量很少。

据文献记载，继乐傅首创之后的第二个开窟者是禅僧法良，大约在前秦占有敦煌时期他从东边游方而来，在乐傅窟旁又开凿了一个新窟。只可惜这两个洞窟现在都已经无迹可寻了。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十六国晚期的北凉，共存 3 窟，至北魏、西魏和北周，留存的洞窟才渐渐多了起来，加上最早的北凉窟，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共有 30 多个，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

这一时期的石窟建筑主要承袭了西域、印度的石窟建筑形式，并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建筑布局方式，从而形成三种不同形制。

第一种是禅窟，主室呈方形或长方形，正壁开一大龕，内塑佛像，两侧壁凿出小禅室，供僧侣坐禅修行。这种洞窟的主要用途是修禅观像，因而在盛行禅业的十六国与北朝很常见。莫高窟现存最早的洞窟第 268 窟，和保存了隋以前唯一一条纪年题记的西魏 285 窟都属这种形制。

第二种是中心塔柱窟，或称塔庙，平面呈长方形，前部有人字披屋顶，窟室后部中央凿出通连窟顶与地面的中心塔柱，柱身四面开龕造像，正面为 1 个单层大龕，其余 3 面为双层小龕。在中心塔柱与窟室侧壁和后壁之间自然形成了一条环形通道，

可供信徒绕塔右旋，礼拜供养。这是莫高窟早期洞窟的主要形制，北魏时期的第 248、251、254、257 等窟都属此类。

第三种是覆斗顶窟，也叫殿堂窟，平面多呈正方形，正壁开凿大龕，顶部藻井状如覆斗。与其他两种窟形相比，这种殿堂窟的平面布局更接近于中国普通佛寺建筑中的大殿，体现出了更多的传统建筑特征，因而很受当地人民喜爱，隋唐以后开窟大多采用这种形制，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这类洞窟也为数不少，北凉的第 272 窟，西魏的第 249 窟和北周的第 296 窟即为典型代表窟。

塑像是洞窟的主体，在窟内占有显著位置。莫高窟所在的鸣沙山崖体，在地质上属于第四纪玉门系砾岩层，由砂和小石粒胶结而成，质地疏松，不适宜雕凿制石像。古代敦煌的艺术家们因地制宜，创作了大量的敷彩泥塑。我国中原内地因潮湿多雨，极难长久保存泥塑，所以现存的早期泥塑像很少。而敦煌地区因气候干燥，莫高窟彩塑才得以历时千年而不毁，成为异常难得、珍贵的古代艺术品。

敦煌彩塑的制作过程，大体可分为制骨架、上塑泥、敷颜色 3 个阶段。

骨架的制作十分巧妙。做小型塑像时，先按人物的大体结构将木头削制成木胎；做大型塑像时，则要根据塑像造型需要，选用不同形状的圆木搭制，并于上泥前再用芡芡草或芦苇捆扎出细部，以

达到既省泥又减轻骨架承负重量的效果。

塑像用的泥分粗泥、细泥两种，一般都加有麦秸、麻刀、棉花等纤维，有很强的韧性。粗泥是用来塑作人物大样的，具体塑像时要分层敷泥，每一层都不能太厚，并要待水份适量挥发后才敷下一层。这样做出的泥塑风干后收缩小，基本不开裂变形，可长久保存。细泥的用途是塑造人物表层和五官、衣饰等，需柔软细薄。敷泥过程中还要反复用塑刀按压收紧，以便使泥塑表层细腻坚实，既美观又容易描线敷彩。

最后一道工序敷彩在制作过程中也很重要，它可以使彩塑更趋完美，并与四周陪衬的壁画和谐统一。莫高窟早期彩塑所用的颜色主要是土红、石绿、石青、白、黑等几种，简朴而又沉着，与壁画的色彩十分协调。

莫高窟早期雕塑艺术的发展脉络比较清晰。北凉尚处莫高窟艺术的初期，塑像仅为单身，多以佛装或菩萨装的弥勒为主尊，这大约与当时流行禅业，而佛经中称禅修遇到疑难时弥勒可决疑解惑有关。第 275 窟就是典型的弥勒窟，窟内供奉的主尊和壁龛中的塑像都是弥勒菩萨。进入北魏以后雕塑艺术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成铺的组像，一般是中间一尊佛像，两侧各一尊胁侍菩萨，类似于封建王朝的“左辅右弼”之制。北周时期成铺的塑像更增为五身，在北魏一佛二菩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二弟子，分别为佛的十大弟子中“头陀（苦行）第一”

的迦叶和“多闻第一”的阿难。迦叶被塑成老年胡僧的形象，高鼻深目，双眉紧蹙，充分展现了他饱经风霜的经历和世故老成的性格。阿难则呈现出汉族贵族子弟的形象，年青俊秀，聪颖洒脱，似乎还没有完全断绝尘缘，与迦叶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两尊弟子像的个性特征非常突出，令人一望可知，表明那时的雕塑水平已很高了。

壁画原本是为了衬托塑像而设的，但这种艺术形式内涵丰富，表现力强，所以从某种角度讲，壁画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组成部分。

敦煌壁画的制作也有一定的程序，首先要修饰壁面，将已掺入碎麦秸和麻刀的泥均匀地涂抹在壁面上，然后再在补好的壁面上涂一层薄如蛋壳的石灰，并打磨光滑，这样整饬过的壁面光滑洁净，才可作画。

莫高窟的早期壁画一般都有统一的整体布局：窟顶画装饰性图案和平棋藻井；四壁上部画天宫伎乐；中部，即人们平视最佳的部位画佛像和主题性故事画；下部画供养人（出钱造窟做功德的人）像和金刚力士像，形成严整的佛国世界。

莫高窟早期壁画的内容主要是说法图、故事画、民族传统题材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几种。其中故事画是最重要的一类，现存约 30 幅，包含了近 20 种故事内容，分别为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和因缘故事。

佛传故事画描绘的是释迦牟尼一生的主要事

迹，一般选取下生、入胎、住胎、出胎、出家、成道、转法轮、入灭等八相作为主要情节加以宣介。这一题材在早期莫高窟壁画中非常多，几乎每个洞窟中都有。其中北周第 290 窟中的佛传图最负盛名，它长达 25 米，用连环画的形式，分约 80 个画面详尽描绘了佛祖释迦牟尼从诞生到出家之间的主要活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幅佛传连环故事画。

本生故事宣传的是释迦牟尼前生所做的教化众生、普行六度的各种善事。佛经中称释迦牟尼在降生为悉达多太子之前的 500 年中曾有过无数善行，正是那些累世修行才使他终证佛果。这些故事情节曲折，内容生动，所宣扬的悲天悯人、忍辱牺牲的精神正符合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动乱中挣扎的贫民百姓的企望，因而大受欢迎。在早期洞窟中反复出现，现存的就有月光王施头、萨埵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映摩迦忠君孝亲、须大拏布施济众、九色鹿拯救溺人、毗楞竭梨王身钉千钉以求佛偈等 10 余种。有些故事虽多次出现，但情节刻划与表现技巧上又有区别。

因缘故事宣传的是各种度化事迹，早期洞窟中共存有六七种。其中须摩提女请佛故事讲述释迦牟尼如何以法力降服六千外道，突出了佛教惟我独尊的地位。微妙比丘尼现身说法故事画于北周第 296 窟，是我国惟一的一幅反映这一题材的石窟壁画。故事渲染了微妙因前生刺死他人之子，今生所承受

的种种罪报，曲折反映了当时下层妇女的凄惨生活。五百强盗成佛故事见于西魏第 285 窟和北周第 296 窟，称五百强盗战败被俘后全被处以挖眼的酷刑，并被流放到山林中，他们的痛哭声惊动了佛祖，佛祖使用神力使他们盲目复明，并向他们宣讲佛法，五百强盗感激涕零，全体出家为僧。这个故事画描绘得十分生动、惨烈，令人触目惊心，也是当时河西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统治者进行残酷镇压等社会现实的间接写照。沙弥守戒自杀故事画于北魏第 257 窟和西魏第 285 窟，故事讲述一位小沙弥在乞食时遇到了一位爱慕他的美丽少女，沙弥为了恪守戒条，宁愿用牺牲自己性命的方式拒绝少女的爱情。艺术家们树立这个严守戒律的正面形象，其目的大约是要批评和规劝当时大量存在的庸滥破戒的僧尼，维护佛教圣僧在世俗人心目中的地位。

除故事画外，民族传统题材绘画在早期的莫高窟壁画艺术中也很突出。这些画描绘的是中国的神话与神仙，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雷公、闪电、飞廉、雨师等都是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它们的进入洞窟甚至成为佛教神祇，表明从一开始敦煌石窟艺术就接受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北凉及北魏前期，莫高窟艺术中来自西域佛教艺术的影响较多，人物形象多是面相丰圆，神情温婉，身躯肥壮，比例适度。衣冠服饰上也明显地保留着西域、印度和波斯风习，一般都是头戴宝冠，

上身半裸，下穿长裙，跣脚肃立。绘画技法上则先用土红色涂地，造成厚重浓丽的艺术效果，然后再采用凹凸法绘画：以朱色层层叠染，以白粉勾画鼻梁、眉骨等隆起突出部分。这种手法主要传自西域，特别是龟兹地区，艺术史家们习惯将之称为“西域式风格”。用这种技法创作的艺术品浑厚简朴，稚拙凝重，立体感很强，呈现出以静为基调的艺术境界，与中原魏晋艺术迥然不同。

不过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在以西域式为主的艺术风格中也已经显露出了许多汉民族传统文化影响的迹象。西域龟兹壁画中常见的那些丰乳细腰大臀的裸体菩萨和舞女形象在莫高窟中已消声敛迹，儒家思想根深蒂固，衣冠文明深入人心的敦煌淘汰了这些与他们固有的审美观大相径庭的造型，对可以部分接受的形象也进行了中国化的改造，使之更符合中国民众的审美情趣。同样，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艺人们也并非完全照搬西域模式，而是参用了中国的线描造形、以形写神等优良传统，使最初的敦煌艺术中就已渗入了许多中原文化的精髓。

北魏孝文帝元宏当政后，大力推进鲜卑族的封建化过程。迁都洛阳、聘用南朝儒士、推广使用汉语、穿着汉族服装、改良鲜卑旧习等一系列汉化政策，对北方的文化构成和艺术风格的转变都发生了巨大影响。敦煌偏处西陲，受影响而变易的时间略晚于内地，但至迟在东阳王元荣出任瓜州刺史后就接受了大量新讯息，艺术风貌有了很大改观，于北

魏末期便开始出现了“中原式风格”，面貌清瘦、眉目疏朗、身体扁平、脖颈颇长的秀骨清像蔚然成风，大冠高履、褒衣博带的汉式衣冠随处可见。技法上也用中原传统绘画的染色法替代了西域的凹凸画法，并且不再尽用土红涂地，出现了爽朗明快的画面和生机盎然的运动感。这些正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理想在艺术上的体现。南朝的士大夫追求通脱俊秀、潇洒飘逸，以清瘦为美，在这种社会风尚熏染下，敦煌艺术也开始以俊逸洒脱为特征。

但此时西域式风格也并未绝迹，至西魏时仍与中原风格并存于石窟中。如西魏第 285 窟西壁体现的就是西域风格，其余三壁则呈现了中原风格，顶部更出现了两种风格交互影响的现象，代表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迁延至北周，敦煌石窟艺术更加成熟，西域式风格与中原式风格进一步融合，形成了一种更具魅力的艺术表现手法。造型上中原式秀骨清像与西域式丰圆脸型互相结合产生了“面短而艳”的新形象；晕染上，中原式染色法与西域式凹凸（明暗）法互相结合产生了可充分展示立体效果的新晕染法；人物精神情态上，淳朴庄静与潇洒飘逸相结合，产生了温婉娴雅，富有生命力的新风貌。这时的莫高窟艺术已更贴近现实，也更加民族化，已为隋唐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隋与唐前期的敦煌

隋朝有国仅仅 38 年，但在中国历史上却是一个较为重要的朝代。对敦煌而言，隋朝在西北地区所做的努力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隋朝是敦煌走向全盛的起点站。

唐祚 300 年，为研究方便，人们常将它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4 个阶段，同时又称初盛唐为唐前期，中晚唐为唐后期。相应地，敦煌地区的唐代历史也可区分为 4 个阶段，只是与整个唐朝的分期时限不尽相合。根据敦煌地区特殊的政治历史情况，研究者们多以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至武则天长安四年（704 年）为敦煌地区之初唐；唐中宗神龙元年（705 年）至德宗建中二年（781 年）为盛唐；吐蕃占领时期，即 781~848 年为中唐；张氏归义军政权时期，即 848~914 年为晚唐。而实际上，当张氏政权在 914 年前后被曹氏政权取代时，中原地区已经进入了五代时期。

1. 隋朝对吐谷浑和西突厥的反击

581 年，杨坚篡夺北周政权，建立了隋朝，历史上称他为隋文帝。取得敦煌等地之后，隋文帝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障这些州郡不受少数民

族贵族侵扰。

隋初西北地区边患严重，有两股势力同时威胁着隋王朝的统治。其一是西突厥贵族，他们既占据着漠北，不断南下扰边，又控制着西域，把持着丝路贸易。其二是居住在青海一带的吐谷浑，他们经常与西突厥勾结，南北夹峙丝路，又时常同党项连兵，频繁侵扰隋朝的西部地区，致使河陇地区长期不得安定。

杨坚建国之初内忧外患相继，他虽然重视河西西域，但客观上却不可能在这方面有太大的作为。杨广即位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炀帝便将降服吐谷浑、西突厥，交通西域，发展丝路贸易定为他的治国方策之一。大业初年，炀帝委派裴矩赴张掖主持与诸胡交市，隋朝对西域的经营活动便正式开始了。

裴矩是河东望族裴氏的后代，学识渊博，多才多计，在隋初平定岭南叛乱和抵御突厥侵扰等活动中崭露头角，赴任张掖以后他的才干更得到了充分发挥。他首先利用与胡商接近的便利条件，积极探询西域各国的山川形势、风俗人情，撰写了《西域图记》3卷，奏献朝廷，使中央统治者对西域的情况有了比较真实全面的了解，为以后治理西域提供了重要凭据。现在这本书的序言还在，序中裴矩认真分析了西域的形势，提出了“以夷制夷”经营西域的办法，很有见地，也很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一经提出就博得隋炀帝的赏识，并逐步得以实

施。

大业三年（607年），裴矩讽令居住在今哈密、巴里坤一带的铁勒攻打吐谷浑，大获全胜，隋军又乘机出战，斩、虏数千人，迫使伏允可汗南奔雪山。但隋军东返后形势出现了反复，炀帝便于大业五年三月率大队人马亲征吐谷浑。炀帝一路陈兵讲武，演习军事，做了很多准备工作，至五月下旬便组织了覆袁川（今青海俄博河）战役。隋军以几十万兵力从四面合围吐谷浑，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迫降吐谷浑部众 10 万余人。吐谷浑惨败，伏允在别人冒名顶替掩护下才勉强逃出包围圈，远遁入党项属地，一直到大业末年都无力再为边患。隋朝一举获得了征战吐谷浑的彻底胜利。

为巩固这一战果，隋炀帝于西巡途中就在吐谷浑旧地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 4 郡，并发配罪犯为戍卒镇守，将今青海的大部分地区置于中原王朝郡县制度的直接管理之下，四郡中的且末、鄯善更远在今南疆东部。

在西巡过程中，隋炀帝还进行了大量外交活动，其中最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就是著名的 27 国交易会。六月中旬，炀帝一行到达燕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等 27 国酋长前来朝谒，炀帝遂两次大宴各国宾客，并大备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戏，颁赐众人，又令武威、张掖士女盛装展观，充分显示了中原王朝的繁盛。两次盛会使得西域诸国在大为震服的同时，也被中

原的文化艺术和经济盛况深深吸引，更加迫切地希望与中原王朝交好，这对消除西部边患，促进中西正常交往都具有积极作用。

击灭吐谷浑之后，隋王朝又集中全力对付西突厥。隋炀帝采用裴矩的计策，利用西突厥内部矛盾使其部领射匮首先内附隋朝，转而攻打处罗可汗，迫使处罗也于大业七年朝拜炀帝。至此西突厥完全内附，西域宴靖，丝路畅通。但可惜的是，隋朝取得的这一系列胜利也如同前秦时吕光西征一样，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大业七年以后，隋炀帝接连发兵攻打高丽，民怨沸腾，国力虚弱，再也无暇西顾了，射匮乘机叛隋独立，统一了西域，后来又成为唐朝的一大边患。

2. 隋朝统治时期的敦煌

杨坚建隋以后，鉴于前朝州县林立，管理混乱的状况，于开皇初年对全国的行政区划进行了一次大改革，罢天下诸郡，将以往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这样敦煌郡便于开皇二年（582年）一度改郡为县，仍隶属于瓜州，并为瓜州治所。但到隋炀帝大业三年时，隋王朝又将天下各州改称为郡，敦煌郡也随之复立，下领敦煌、常乐、玉门³县，管辖着今敦煌市、安西县、玉门县和玉门市共⁴县市之地，范围之大仅次于北魏前期的敦煌镇。郡内人口也相应增多，据隋志载录有 7779 户，比北朝时期增加了许多。

隋朝战胜吐谷浑和西突厥，为敦煌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外部环境，丝绸之路的畅通无阻也使敦煌作为交通枢纽的地位更加突出。裴矩在上面提到过的《西域图记·序》中曾详尽地描述了当时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等地的几条道路的情况。依照裴矩的描述，当时从敦煌出发，直抵西海（地中海）的通道共有 3 条：

北道（又叫新北道）：出敦煌至伊吾（今新疆哈密），经蒲类海（今巴里坤湖），沿天山北麓而至中亚、西海；

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经焉耆、龟兹等地，沿天山南麓而至葱岭、西海；

南道：出敦煌至鄯善（今新疆若羌），经于阗等地，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而至帕米尔高原，再至西海。

这 3 条道路分别以伊吾、高昌、鄯善为门户，但都必须取道敦煌，然后分途，因而敦煌是丝路各支线的总凑之地。它在丝路贸易中所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这个中转站内部商业活动的繁盛便可想而知了。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经济文化的进步，隋代的敦煌佛教也得到了长足发展。隋朝的两代君主都异常崇信佛教。杨坚曾在尼姑庵中生活多年，登上帝位后便尊佛教为国教，隋炀帝杨广也是有名的佞佛帝王，是“优游于大乘”的“总持菩萨”，他们

父子二人的弘法活动对敦煌佛教影响很大。如仁寿元年（601年）隋文帝诏令天下各州建舍利塔，边陲地区也不得例外，敦煌便在中央派来的中使的督令下建立了讲堂，并在崇教寺（莫高窟）修建了舍利塔，安放从首都送来的释迦舍利（相传为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结成的珠状物）。敦煌壁画对隋帝的崇佛盛况也有所反映。隋时僧人地位很高，能够参与国家的许多重大活动，隋文帝曾亲自率领王公大臣往就县延法师受八戒，莫高窟唐代第323窟南壁就绘有隋文帝恭迎县延法师入宫讲经祈雨的壁画，说明隋文帝敬僧的故事在唐代的敦煌仍然十分流行。

在帝王的倡导下，隋代全国都掀起了崇佛浪潮，敦煌这块久已著名的佛教圣地上的开窟造像活动自然也空前兴盛。短短30多年中，仅在莫高窟一处，就修造了七八十个洞窟，是年平均修窟数最多的朝代。

3. 隋末唐初敦煌地区的割据势力

隋炀帝远征高丽失败后，国内战乱再起，各地豪右纷纷称王割据，敦煌偏处西隅，虽没有遭受大规模战火，但也并非太平无事，在隋末及唐朝立国初期曾几度易主。

617年，隋武威鹰扬府司马李轨举兵自立，称河西大凉王，在部下曹珍、安修仁等的策谋下很快就攻陷了张掖、敦煌、西平、枹罕等地，控制了整

个河西走廊，于第二年，也就是李渊建唐的当年僭称帝号，改元安乐。面对这一局面，刚刚平定了中原的唐高祖李渊想通过招抚的方式收复河西，便遣使赴凉州宣诏，封李轨为凉王、凉州总督，并称他为“从弟轨”，以示恩宠。但李轨没能认清形势，在犹豫不决中采纳了曹珍的反对意见。唐高祖大怒，责令当时住在长安的安修仁的哥哥安兴贵再去招抚，如招抚不成，准他相机行事。可李轨仍然不自量力，又失掉了这次机会。安氏兄弟原是久居河西的粟特商人，在当地很有势力，武德二年（619年）他们设计引胡众起兵，包围了姑臧城，李轨战败投降，被解往长安处斩。自聚众起兵至兵败被杀，李轨割据河西占有敦煌仅仅3年，而他之后的几个割据势力的存在时间就更短了。

唐朝斩杀李轨，取得敦煌郡之后，依全国改郡为州的通例，将敦煌郡更名为瓜州，任命贺拔行威为瓜州刺史，执掌原敦煌郡地。当时唐朝刚刚创立基业，政局不稳，各地刺史叛乱事件屡屡发生。武德三年，贺拔行威也执骠骑将军达奚皐反唐，唐朝因国事多难，只能暂时听任他存在，这样敦煌成了贺拔行威反叛唐朝的据点，直到两年后的武德五年（622年）五月，瓜州土豪王干方将他斩首。

敦煌再次归唐后，唐朝将瓜州分为瓜州和西沙州两州，新的瓜州治所设在晋昌县，统晋昌、常乐两县，西沙州的治所则设在敦煌县，领敦煌、寿昌两县，范围大大缩小了，仅仅相当于现敦煌市地。

新的行政区划确立不久，武德六年（623年）六月，西沙州人张护、李通又发动叛乱，拥立州别驾窦伏明为城主，并进逼瓜州，被瓜州长史赵孝伦击退后，九月，窦伏明便以城降唐，这次叛乱历时仅3个月便彻底失败了。

4. 唐前期对西域的经营活动

窦伏明降唐后，敦煌内部最后稳定下来，但西域少数民族贵族对敦煌河西的骚扰仍接连不断。唐王朝便立即着手解决西部边患问题。

唐朝首先打击的是东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派10万大军分道进击，于第二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擒获颉利可汗，令伊吾归唐，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王麴文泰入朝，唐与西域的交通初步打开。

此时威胁河西安全的还有吐谷浑。曾被炀帝打败的伏允可汗趁隋末战乱恢复了部分势力，唐初又为害一方。贞观九年（635年），唐太宗派大将李靖领兵征讨，终使伏允兵败自杀，其子慕容顺率部降唐，彻底免除了河西与敦煌的外部威胁。

唐王朝的下一个目标是经营西域，当时西域控制在西突厥手中，在他们的阻挠下，东西交通已远逊于隋代。贞观十四年，唐太宗派大将侯君集领兵平定了叛唐东击伊吾的高昌，以其地为西州，并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又攻破焉耆，中西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观，

玄奘法师求得佛法回国时，西域诸国沿途护送，与他去时偷渡而过的情况大不相同。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再克龟兹，西域大震，各族首领纷纷摆脱西突厥控制，归附唐朝。唐朝在西域的势力继续向西延伸，遂将安西都护府西迁到龟兹，下设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史称“安西四镇”，奠定了唐朝经营西域的基础。此后唐与西方的交通，特别是从敦煌出发，经且末、于阗越葱岭而西的南道和出玉门关经西州、龟兹、疏勒西行的中道都更加畅通了。

但是，唐朝在西域驻兵不多，要依靠各族酋长来维持统治，在这种情况下，西域的形势出现了反复。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唐朝不得不将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刚刚设置的安西四镇也随之废弃。至显庆二年（657年）唐朝终于攻灭西突厥，在突厥旧地设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并于次年平定了龟兹发生的叛乱，将安西都护府升级为大都护府，迁回龟兹，复置四镇，将整个西域都控制在唐朝手中。

唐朝在西域的胜利对敦煌影响很大，使敦煌变成了西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安西、濛池、昆陵等都护府的重要后勤基地。7世纪60年代以后，丝绸之路进入了它在唐代的全盛时期，控扼两关的敦煌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繁华。

在唐朝逐渐兴盛起来的同时，我国西南部地区的吐蕃王朝也在崛起中。670年以后，吐蕃开始将

势力伸向西域，迫使唐朝又两度废置四镇，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才第三次将安西都护府西迁龟兹，并第四次置四镇。

在唐朝经营西域的活动中，敦煌始终是积极的参与者，贞观年间侯君集伐高昌的唐军中就有沙州（贞观七年西沙州改称沙州，仍领原敦煌地，此后“沙州”更成敦煌别称）刺史刘德敏率领的敦煌民众，在以后唐朝同西突厥余部及吐蕃争夺西域控制权的斗争中，敦煌始终是协助安西都护府统治西域的重要力量，同时安西四镇的戍卒也主要是来自敦煌河西的府兵。高宗上元二三年间（675~676年）唐朝曾将西域南道上的石城镇（今若羌）和播仙镇（今且末）划归沙州直接管辖（见图2），更显示出了敦煌在唐前期经营西域活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5. 唐前期敦煌的社会经济状况

唐朝初有敦煌时，当地经济十分萧条，经过隋末的战乱，到处残破不堪，人户稀少，土地荒芜，帑藏也异常空虚。面对这种状况，唐朝立即在这里推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并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使敦煌的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到贞观中后期便走出了隋末遗留的衰败困境，并进而向前稳步发展。

在封建时代，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是农业。敦煌位于干旱地区，作物生长完全依赖于灌溉条件，敦煌唐人写卷中就有“本地，水是人血脉”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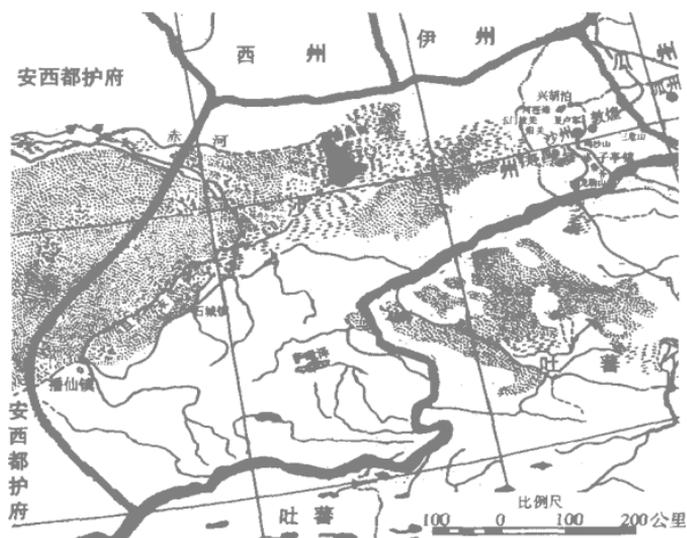


图 2 唐前期沙州简图

足见水对当地农业的重要。敦煌地区的水源主要是源自南山，流入境内的甘泉水（今党河）、苦水、独利河（今疏勒河）等几条河流。唐朝非常重视这些河道的维修，在前代已修建的水利工程基础上，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使敦煌境内的大小渠道增加到 90 余条，再辅以本土上的 20 多处泉泽湖泊，敦煌地区逐渐拥有了庞大完备的绿洲灌溉体系。

为了有效地分配用水和管理用水，唐代敦煌实行了一套严格的配水法规。敦煌文书 P.3560 中保存有《沙州敦煌县地方用水灌田施行细则》，这是

西魏时元荣婿邓彦执掌瓜州时订立的水规，历经北朝、隋代，到唐时更被严格遵照执行。

在照规办事的同时，敦煌还设置了专职官员和专门的管理人员，浇水灌田要由州官、县官、前官、各主要渠道及分水斗门的渠长、斗门长等自上而下的多级官员具体负责，并且奖惩有别，赏罚分明。

水利事业的发达为敦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唐前期敦煌耕地面积扩大，粮食产量增加，同时畜牧业也有了很大进步。麟德时期（664~665年）河陇地区有马数十万匹，推想当时敦煌的牧马业必定也十分兴旺。

唐前期丝路的畅通无阻和当地农牧业的发展都促进了敦煌商品经济的繁荣。来敦煌贸易的商贾中既有从内地来的汉族客商，也有从中亚西域赶来的胡商，敦煌以西 110 里处的兴胡泊就是因专门接待胡商而得名，敦煌城东的沙州 13 乡之一的从化乡也是由于粟特商人陆续定居下来而形成的。除这些民间商业活动外，当时中亚的许多国家与唐朝都有所谓“通贡”、“通使”的官方商贸关系，他们进行贸易的中转站同样是敦煌。行商坐贾们在敦煌的集市上从事着中原的丝绸和瓷器，西域的珍宝，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交易，一时间敦煌兴盛异常，呈现出了太平治世的景象，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

但是，在这种表面繁荣的背后，敦煌的平民百

姓却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唐时河西地区军镇林立，争夺西域的战争接连不断，敦煌始终是唐朝经营西域的物资供应基地，赋税徭役负担十分沉重，兵役之重更令人难以承受。在对西域的征战中，河西敦煌的丁壮是唐兵的重要来源，就连世家豪族也要派子弟从军出征，普通“编氓”就更不用说了。武则天时期敦煌的农户不堪徭役兵役的困扰，纷纷逃亡他乡，唐朝廷不得不派出括逃御史进行抚理，敦煌遗书中保存了很多与此有关的文献，如有名的俗赋《燕子赋》就曲折反映了当时括户的情况。

安史之乱前后，唐蕃双方为争夺西域争战不休，河西敦煌地区动荡不安，敦煌百姓的日子更不好过了。而此时寺院经济却益发膨胀，豪强贵族用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令贫苦农民无家可归，无田可耕，社会经济终又走向衰落，已是盛唐不盛了。

6. 唐前期敦煌文化的大发展

唐前期敦煌文化的内容极其丰富，西汉以来几百年的发展为敦煌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丝绸之路的畅通又为她带来了域外文化的精髓。唐前期的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文化都会，汇聚了东西方各种不同系统的文化，各种思想学说在这里并存共生，竞相发展，呈现出了绚烂多彩的文化景观。

各种文化中，汉文化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官方开办的州学、县学，寺院举办的寺学，和私人办的学塾中，都要教授唐朝规定的儒家经典，传播汉

文化。敦煌藏经洞中出土的大量唐前期抄写的儒家典籍和启蒙读物都证实了儒学在当时的敦煌学术中享有正统地位。

作为汉族传统文化一部分的道教，在唐前期的敦煌也十分盛行。唐朝统治者奉老子李聃为先祖，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倡道教。受此影响，开元、天宝年间敦煌地区也开设了道学，并建立了神泉观等许多著名的道观，观中教授弟子，传写经书，招引了大量信徒。

除了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之外，随着众多商胡的到来和定居，外来宗教也在敦煌逐渐发展了起来。如敦煌城东粟特人聚居的从化乡中就建立起了中亚地区信奉的祆（音 xiān）教（拜火教）神祠；景教也已传至敦煌，敦煌城中建有景教寺院，名为大秦寺，藏经洞中也出土了景教经典；而开元年间抄写的摩尼教经文又透露出了其他西亚和中亚宗教在敦煌流传的信息。

诸多宗教中，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佛教。唐前期历代帝王都注意借用佛教维持统治，女皇武则天更是将佛教用作她坐龙床颁正朔的有力工具，授意僧人编撰《大云经疏》，敕令天下普建大云寺。在这种崇佛浪潮的推动下，敦煌地区的佛教更如丽日中天，盛极一时。佛教信徒已遍布社会的各个阶层，出家为僧的当地居民也很多，各大寺和家族小佛堂——兰若中都是朝夕香烟缭绕，朝拜不绝。此时佛寺的兴建活动十分活跃，仅莫高窟现存题记中就录

有龙兴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寺、灵图寺、开元寺等许多寺名。这些寺院中保存着从长安传来的宫廷写经，僧人们在寺中研习佛学，并向在家信徒宣传佛教知识，化俗讲经活动极其盛行，敦煌文书中保存的大量讲经文、变文即是明证。除宗教活动外，佛寺中还设立有学堂，招收世俗子弟，传播文化知识，由于寺学的教学水平很高，许多名族大姓都送子弟前来学习。此外，佛寺参与的其他社会活动也不少，并且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资助，逐渐拥有了大量田园房产，寺院经济也随之有了相当发展，形成了在社会上颇富实力的新的经济集团。

佛教势力的强盛促进了敦煌的开窟造像活动，到武则天执政时，莫高窟已是拥有一千多所窟龕的宏伟寺院了，而其艺术水平更达到了辉煌的顶峰。

7. 隋与唐前期的莫高窟艺术

莫高窟现存隋窟 70 余洞，唐前期窟 120 余洞，居各时期造窟之冠。

隋代先是继续开凿中心柱窟，其形制与北周窟大致相同，只是多将中心柱改造为须弥山式，呈倒塔形；以后又取消倒塔，将中心柱发展成佛坛；再后更取消佛坛，直接修建正（西）壁开龕或西南北三壁开龕的覆斗顶方形窟，或人字披顶方形窟，使洞窟更接近于中国传统建筑——殿堂，这种窟也叫作“殿堂窟”。

唐代洞窟形制进一步中国化，中心柱窟和人字披顶窟已经很少见了，殿堂窟成为最普遍的窟形。唐窟一般都分前后室，前室平面多为横长方形，据文献记载室外还多修有木构建筑，从远处望去异常宏伟，堪称沙漠戈壁中的神迹。洞窟后室，即主室的平面则呈方形，窟顶为覆斗藻井，窟内宽敞开阔，活动空间很大，可供众多信徒同时巡礼瞻仰，礼拜斋会，因而唐代以后的莫高窟更成了当地群众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

殿堂窟一般都是在正壁开龕塑像。隋代继承并发展了北朝彩塑中的群塑形式，窟内塑像多以佛为主尊，二弟子、二菩萨或四菩萨为胁侍，由三至七身塑像组成一铺，十分壮观。隋代绘塑的技法也更加成熟，非常注意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同时人物细部的处理也更精致繁丽，北朝塑像的阶梯式衣褶已发展成贴体流畅的衣纹，胸臂等处加上了璎珞装饰，有些佛像还进行了装金，俞显富丽雄伟。

隋开第 427 窟集中体现了隋代的彩塑艺术成就。这是隋代开凿的规模最大的洞窟，分作前后两室，后室仍然保留着早期中心方柱的形式，柱前塑一铺一佛二菩萨立像，左右两侧和后面各塑一铺一佛二弟子的说法像，南北壁又各置一铺一佛二菩萨立像。洞窟前室中的塑像则为对称的金刚力士和四大天王，天王脚下踩踏恶鬼。这样，全窟中共安置了 28 身塑像，济济一堂，但并无拥挤之感，重层龕口的巧妙设计改变了观者的视觉，使人进入窟内

仍觉宽敞豁亮，回旋自如。

唐前期彩塑在隋代 30 多年努力探索的基础上取得了更高的成就。这一时期完全采用圆塑的方式塑造人物形像，技法上也有了重大突破，更加注重写实和接近现实生活，在人物性格和内心世界的刻画上愈益细腻生动。

唐代彩塑最主要的形式依然是整铺的群像。艺术家们既注意群像组合在一起的整体效果，又重视单个塑像的独立风采，使它们在谐和一致的同时又能做到个性鲜明。

群塑中最常见的是说法像，一般一铺七身至十余身，以佛为中心，成对的弟子、菩萨、天王、力士为胁侍，并常配有胡跪的供养菩萨像。

盛唐第 45 窟主室正壁敞口平顶龕内的一铺说法像十分精美。群像的正中是结跏趺坐的释迦牟尼佛，螺发高耸，慈目低垂，面相丰圆，嘴角内敛，突出了佛的雍容端庄。坐佛身躯比例适度，通肩袈裟衣纹流畅，绘塑技法已臻完美。

佛的近侍是两大弟子。迦叶老成持重，脸庞方正，眉头蹙起，两颊下陷，嘴唇紧闭，颈骨瘦削，袈裟简朴，举手作印，面部表情庄重肃穆，似乎正在冥思苦想，给人一种沉稳练达、刻意求索的感觉。与迦叶相对的阿难则年青俊逸，他脸型丰圆，弯眉舒展，修目微张，嘴角略翘，衣饰华美适度，两手自然合于腹前，神态恬淡温婉，给人以聪颖谦和，随缘恭顺的印象。这两尊塑像造型有别，情态

各异，很好地突出了两大弟子截然不同的性格，不但是唐代弟子像中的上品，也是莫高窟雕塑艺术中的佳作。

迦叶、阿难外侧是两尊胁侍菩萨。迦叶身旁的一躯面相丰腴，莹洁如玉，只见她秀眉入鬓，细目低垂，隆鼻小巧，朱唇翕合，头部稍稍内倾，神情庄静娴雅。菩萨上身半裸，颈胸彩饰瓔珞，左手自然下垂，右手稍稍抬起，腰肢轻扭，配以微侧的头部，使体态呈“S”形，优柔妩媚。菩萨下身穿锦裙，裙上的织锦图案繁花点点，衬托出菩萨的青春艳丽，呈波浪纹下垂又系结于腰际的种种饰物勾勒出了菩萨修长优美的腿形。整尊塑像丰满圆润，线条流畅，既肥美雍容，又风姿绰约，与其说是佛国的胁侍，毋如说是仙界的美女。

与婉约的菩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身旁孔武健壮的金刚力士。力士浓眉粗重，圆目怒瞪，鼻翼奋张，嘴阔欲吼，神情刚毅、威猛，身上穿的铠甲、腿上裹的行膝，和叉腰攥拳，脚踏恶鬼的体态都很好地体现了他雄健强悍的赳赳武夫气概。而天王力士脚下的小鬼愁眉瞪目，鼓腮咬牙，手撑地面，曲身抬腰，努力想扛起金刚的右脚，其惨烈不支正反衬出了天王的英勇无比威慑四方的力量。

除表现说法相之外，唐代彩塑中还有一种表示涅槃相的群像，以盛唐第 148 窟最为宏伟壮丽。此窟是大历年间（766~779 年）李太宾开凿的功德窟。窟主在洞窟主室后部修建了一座大型佛坛，坛

上塑长达 16 米的释迦涅槃像一身。佛旁环绕侍立着 72 身举哀像，分别为佛的姨母、弟子、天人、各国王子等。塑像之多较为罕见，是唐代规模最大的群像。塑像的后面还绘有大型经变画《涅槃变》。因而，本窟当是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者有机结合的莫高窟艺术中的珍品。但非常可惜的是，清人已对这组群塑进行了改塑、重妆，完全破坏了唐塑的艺术风格。

除群塑外，唐前期莫高窟彩塑的成就还表现在巨型大像的雕造上。武则天上台后，于延载元年（694 年）敕令薛怀义等造夹纆大像，受这股崇佛风气的影响，第二年敦煌地区的灵隐禅师和阴祖居士等共同出资兴造了莫高窟最高大的佛像。这尊像所在的石窟现编号为初唐第 96 窟，为通顶大佛窟，窟内像高 33 米，上盖多层佛楼以遮蔽风日，只可惜这尊像也已经晚唐、宋初及清代一再重修，仅佛头还保存着初唐丰满圆润的旧貌，其他部位已不见唐风了。

唐前期修造的另一尊大像是今编盛唐第 130 窟中的善跏坐弥勒像，此像因位居上述第 96 窟巨像之南，而被习称为“南大像”，第 96 窟之像则称“北大像”。南大像是开元九年（721 年）前后僧人处谚和乡人马思忠等修造的，现在除右手为后加的外，其余部位基本保存了原状，使我们得以真切目睹雄伟壮丽的盛唐风范。南大像全高 26 米，塑造这样的大像要在开窟时预留石坯以作骨架，然后再

敷泥塑绘。塑造此像时雕塑家们为照顾视觉效果，有意加大了佛头的比例，并夸张处理了五官，巧妙地利用光影，使站在下面仰视的观者能够看清佛的眉目、神态，感悟到佛的威严与仁厚。这尊塑像曲眉丰颐，神情庄重，身躯健硕，仰视时比例适度，伟岸雄浑，是盛唐气象的集中体现。大像所在的石窟下大上小，呈方锥形，与佛像形体正相适应，使佛像显得很稳重。

隋与唐前期彩塑与壁画关系密切，壁画常作为塑像的补充，与塑像共同表述某一内容，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要表现十大弟子时，往往塑出知名度最高的迦叶、阿难，其他八位则画在他们附近。这样既做到了主次分明，错落有秩，又省工省时，在不影响效果的前提下，避免了因塑像太多可能造成的壅塞压抑的感觉。

这一时期壁画自身的发展也很快。隋初壁画多承袭北周余绪，内容多为千佛、佛传和本生故事。全国统一后，随着南北佛统、艺术的融合，经变画的比例逐渐加大，出现了《阿弥陀经变》、《弥勒经变》、《药师经变》等宣传净土思想的佛经变相，和《法华经变》、《维摩诘经变》、《涅槃经变》等宣传大乘佛教哲理的经变，其规模虽然还不太大，却已为唐代壁画艺术的大发展打下了基础。

进入唐代以后，莫高窟的壁画也进入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新时代，展现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

从题材内容上看，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壁画可区分为佛像画、经变画、佛教史迹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 5 大类。

佛像画中突出的变化是一些佛、菩萨从说法图和经变画中独立出来，单独成画。随着净土思想的广泛传播，观世音和大势至两大菩萨的地位越来越高，为他们专门绘制的壁画日益精致富丽。同时佛的另外两大胁侍菩萨文殊和普贤也独立出来，被左右对称地画在佛龕帐门的两侧。画中文殊跨青狮，普贤乘白象，前后有天人簇拥，两位菩萨已成中心人物。

唐代壁画中发展最快的是经变画。经变画是依据佛经描绘而成的图画，经过隋代的探索，唐代的经变画已不再是简单地将佛经中的主要人物翻录为图像，而是对佛经进行敷演，形成情节生动，内容丰富的故事画。在充实内容的同时，经变画的形式也在逐步完善，到贞观中期便趋于成熟，形成了一部经一壁画的巨型结构，规模庞大，气势恢宏，结构严谨，色彩艳丽。

唐前期经变画中最为常见的是《阿弥陀经变》，又称《西方净土变》，这是根据《佛说阿弥陀经》敷演而成的，极力渲染了佛国世界的富丽豪华。画中阿弥陀佛趺坐莲台，四周圣众环侍，舞伎献歌献舞，天乐不鼓自鸣，仙鸟上下翻飞，宝池碧波荡漾，池中莲花盛开，池畔楼阁耸峙，一派繁盛祥和的幸福景象。

《弥勒经变》的佛经依据是《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成佛经》，前者讲述弥勒上生兜率天宫为天人说法，后者则宣扬弥勒下生人间普度众生。隋代出现的《弥勒经变》多以《上生经》为依据，构图比较简单。唐代则多用《下生经》，或将两经结合画于一壁，上部表现天宫，下部展现弥勒净土的种种美好景象，如山喷香气，地涌甘泉，雨泽应时，树上生衣，一种七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罗刹扫地，龙王洒水，人寿八万四千岁，女子五百岁出嫁，老人安然入墓等等，与西方净土同样美好诱人。

《东方药师经变》以《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和《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为依据，描绘东方药师净土的圣景，也是殿宇灯树相间，歌舞管弦不休，宣扬只要一心奉佛，就能摆脱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苦难，远离恶浊尘世，亲赴净土享受无尽快乐。

这 3 种净土变和《观无量寿经变》中的净土画面都是极力宣扬佛国净土的美妙快乐，以眩诱招徕信徒。其他几种经变则多用说教来劝导众生。

《法华经变》以（妙法莲华经）为底本。隋时多以经中的《序品》、《譬喻品》、《普门品》为据。唐代又进行了扩充，形成了以佛和《序品》为中心，其余各品环绕四周的构图形式。其中《化城喻品》讲述一行人赴远方取宝，走到半路便因困乏劳累而想退缩。佛遂以神通力变化过一座城池，指点

给众人看，众人一见立即狂奔而去，但见城内屋舍严丽，贮藏丰满，便想长住城中，不再前行。这时佛又用神力化去城池，让众人仍抛宿于荒漠，并教导他们化城仅仅是暂时修养的地方，不能留恋，而应继续精进寻求宝物。众人受此点化，顿时开悟。

《法华经变》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一品是《普门品》，颂扬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慈悲仁厚的神通法力和菩萨心肠，画面生动曲折，贴近现实，倍受观者喜爱。随着观音信仰的盛行，唐前期这一品渐渐独立成幅，发展成了《观音经变》，单独描绘观音救济八难的情景，和观音为适应众生不同机缘而变现的 33 种应身，这种渲染使观音深入到了社会的各界各层，更令人亲近敬爱。

（维摩诘经变）隋朝就已出现，一般画于正龛帐门两侧，文殊与维摩相对而坐，是补壁性质的装饰图案。唐代《维摩诘经变》画幅增大，至贞观年间就已变成了整壁的结构。画中维摩舒适地坐在方帐内，手执麈尾，神态自然舒展，似正在高谈阔论，充分显示了他机智善辩的性格。相对的文殊菩萨则端坐于狮子宝座上，神情庄重，不苟言笑，一派大士风范。身旁随从听法的众人神态各异，体貌迥别，烘托出问疾论难场面的宏大。

《涅槃变》以《大般涅槃经》等为依据，描绘释迦牟尼涅槃前后的种种情景，如释迦临终说法，舍利弗先佛入灭，释迦右胁而卧，佛母下天听法，众弟子举哀礼佛，八王兴兵争舍利，起塔供养等情

节。与涅槃像相比，《涅槃变》表现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修建的第322窟和前面已经提到的大历年间开凿的第148窟中的《涅槃变》都是唐前期的杰作，尤其是第322窟中的《八王争舍利图》形象地再现了西域古战场的肃杀氛围。

以上所述，仅仅是隋与唐前期经变画中较有代表性的几种，其他还有《报恩经变》、《劳度叉斗圣变》等。

盛唐时期开凿的第323窟中的壁画内容比较特殊，窟中南北两壁上集中了8幅佛教史迹画，每一画幅旁又都有榜题点明内容。其中既有释迦牟尼晒衣、阿育王拜塔等域外佛教故事，更有发生在中国，或据说是发生在中国的佛教史迹故事。如张骞出使西域问佛名号、康僧会浮海建康传教、西晋吴淞江石佛浮江、东晋杨都高僧得金像、佛图澄神异变幻、昙延法师随时祈雨等。这些故事备述西汉至隋历代帝王的奉佛事迹，既有真人真事的影迹，也有好事者的杜撰。画家们描绘这些史迹画的意图在于抬高佛教地位，扩大佛教影响。另外，本窟东壁上的戒律画也很有特色，它将戒律的主要内容逐条图解，在石窟艺术中是不多见的。

隋与唐前期的供养人画像也有了很大发展，超越了早期单纯表示供养人虔诚敬佛的阶段，在表现其奉佛的同时还着力渲染了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家族势力，因而这一时期的供养人不仅画于壁面下部，

还常绘于甬道两侧，而且越画形象越大，越画装饰越繁丽。第 130 窟中天宝年间画的晋昌郡太守乐庭瓌全家供养像已高等身量，其北壁绘以乐庭瓌为首的男供养人，穿着官服，挺身束带，呈上层官吏状貌，南壁则是以乐夫人太原王氏为主的女眷，体态丰满，服饰鲜丽，堪称一幅优美动人的仕女图，并不亚于其他传世佳作。

隋与唐前期的装饰图案花样繁多，美不胜收。其中最主要的装饰是对窟顶藻井的彩饰，一般都以覆莲为主，四周镶嵌层层花边，最外层缀饰彩铃和彩带，这样描绘出的华盖藻井庄重华丽，与窟中四围的壁画、塑像，及地上铺墁的莲花砖相配，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佛国圣境。

隋代第 407 窟的三兔莲花飞天华盖式藻井是一个绘饰非常成功的例证。这一彩绘藻井结构严谨，色彩浓丽，造型极具新意。其最外层是花纹细密的边框和流苏，边框内是向右飞旋的八身飞天和飞天们抛撒的天花，再向里是数瓣饱满的覆莲，层层叠叠，错落有致。花心中是三只飞奔的兔子，三兔互相追逐，兔耳自然搭构成封闭的三角形，画面上仅绘出了三只兔耳，但人们单独观赏每只兔子时却都有一兔双耳的感觉，画家们巧妙地利用了人们视觉的变化，使这一构图既简洁明快，又完整优美。三耳形成的三角形与圆形的花朵和方形的边框相映衬，突破了以往同一几何图形层层套叠的形式，令整个图案富于变化，自由活泼。同时飞奔的兔子和

浮游的飞天又造成了旋动之美，与丰厚的花瓣和细密稳定的边框花纹相对，动静结合，疏密得当。这一藻井，特别是其三兔三耳的造型设计构思奇巧，匠心独运，是莫高窟装饰图案中的非凡杰作。

除藻井外，举凡龕楣、莲座、背光、衣裙及壁画之间的连接部也都画有大量装饰图案。适应这种需要，这一时期的图案纹样种类繁多，并且在不断变化翻新。仅植物纹和几何纹就有：莲荷纹、葡萄纹、石榴纹、茶花纹、卷草纹、团花纹、宝相花纹、方胜纹、回纹、菱纹、连珠纹、垂鳞纹、云头纹、垂角纹、游龙对凤纹、化生飞天纹，以及绫锦花纹等近 20 种。

在唐代敦煌壁画中还有一项突出的艺术成就很值得称道，这就是飞天的塑造。飞天形象本是与莫高窟艺术同时产生的，经过十六国北朝的发展，至隋代已非常流行，出现了清秀型和条丰型两种不同脸型，人体比例更加匀称，发髻衣饰更加美观。迨至唐代，飞天的形象既已臻完美，丰润洁丽，俊俏轻盈的飞天随处可见。敦煌的飞天造型独特，既不像西方天使那样背生双翼，也不同于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羽人，其上下飞舞，婉转自如的动态主要靠拖曳身后，迎风飘动的衣带来表示。这两条彩带轻软柔滑，飘飘洒洒，能令飞天自由遨翔于蓝天白云之间，奉花献舞于神佛菩萨之侧，其灵动飘渺，雅逸怡人的风姿，和云气飞花所创造的美好意境让观者爱怜不止，更加欣羨佛国天界的妙乐欢愉。莫高窟

壁画中共有飞天 4000 多身，形态最优美动人的多集中于唐前期，如初唐第 321 窟主室西壁龕顶南（左）侧的两身飞天，体态婀娜，素手纤凝，双臂双足丰柔圆润，飞天身着贴体长裙，身下彩云承胸，绕身的彩带随飞天的悠然下飞自然后曳，流动飘逸，已达飞天创造的最高境界。

隋与唐前期是我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政治、经济、文化都居于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其艺术水平之高也同样令邻国赞赏。隋唐艺术家们在灵活运用中国传统艺术技法的同时，博采其他民族艺术之长，使敦煌石窟艺术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统一全国之前隋朝只拥有半壁江山，因而隋初的莫高窟艺术较多地继承了北朝传统。至统一之后，南北方佛教和佛教艺术交互影响，南朝画风开始进入莫高窟。唐朝建立后，大一统的政治局势进一步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位居丝路要冲的敦煌接纳了东来西往的文化使者，自然广取各地精华，形成了既有本地特色，又与全国的审美时尚相一致的艺术风格，并使莫高窟艺术发展至峰巅。

处于高峰期的莫高窟艺术在内容表现及形象塑造上都与蓬勃向上的盛唐气象相适应。

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社会动荡，灾难重重，因而早期的莫高窟艺术多是宣扬忍辱牺牲，累世修行，几乎是利用现实的苦难威逼群众皈依佛法，以求死后能得到庇护。隋唐时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苦行清修已不再能感动观者，人们追

求向往的是天国的欢乐和现世的幸福。适应前者的需要，莫高窟中出现了大量净土变，开始改用佛国的空幻的美妙来引诱信徒；适应后者的则是宣扬只要一心向佛，甚至只要口称“阿弥陀佛”便能达至彼岸的《药师变》和《阿弥陀佛经变》的反复描绘。成佛的难度越降越低，成佛的速度越变越快，善男信女们在现实生活中不必忍受痛苦便可修证佛果，甚至像维摩诘那样家资巨富，妻妾成群，时常出入花楼酒肆，光顾妓院娼馆的享乐无度的居士也能位列仙班，教化众生。如此信佛确是“但受诸乐，无有众苦”，信徒们自然欣然接受。

除内容上的契合外，在形象塑造上这一时期的莫高窟艺术也深受大唐积极健康的审美情趣影响，彻底摈弃了病态美而渲染健康之美，绘塑的人物皆是丰盈润泽，健硕强壮，就连装病的维摩诘都是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其敏哲睿智、雍容大度的仪态正是盛唐风范的体现。

隋与唐前期十分重视装饰美，用色多浓郁华丽，与早期的古朴沉稳恰成对比。这时的艺术家们偏爱富丽堂皇、典雅庄重而又潇洒活泼的艺术效果，创作出的艺术品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是煌煌大唐焕发出的勃勃生机在艺术领域中的反映。

四、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

在敦煌，大致相当于中唐的是吐蕃占领时期。

“安史之乱”爆发后，早已觊觎唐土的吐蕃趁机大举东进。至大历十一年（776年）已攻陷了除沙州以外的整个走廊地区，沙州敦煌便成为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唯一据点，至建中二年（781年）才因外无救援，内无粮械而提出“勿徙他境”的条件与吐蕃议和。

吐蕃占有敦煌近70年（781~848年），他们在这里强制推行吐蕃化政策，逼迫沙州人民接受吐蕃落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汉族民众饱受外族欺凌的苦难，敦煌社会的正常发展也受到了阻碍。但在这股逆流中，敦煌地区的佛教事业却得到吐蕃统治者的全力支持，僧侣地位提高，寺院经济发达，莫高窟的开凿也久盛不衰。

1. 吐蕃对陇右河西的进攻及沙州城的陷落

吐蕃是7世纪初在西藏地区形成的一个奴隶制国家。吐蕃民族粗犷骠悍，能征善战，吐蕃奴隶主贵族很早就怀有吞并唐朝长安以西大片疆土，甚至消灭唐朝的野心。但是唐朝前期国势强盛，边界上

精兵数十万，良将千余员，军事实力十分雄厚。仅敦煌附近就有武德年间设置的玉门军、神龙元年设置的豆卢军（驻沙州城内）和开元末期设置的墨离军等，玉门、敦煌、安西三地共屯驻着边兵 14500 人，蓄养战马 1400 匹。至景云元年（710 年）唐朝设立了全国第一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统领凉、甘、肃、瓜、沙、伊、西 7 州，使西北地区的军事力量得以统一指挥，令外族无懈可击。面对强盛的大唐，吐蕃贵族只得一面继续维持立国之初与唐朝确立的甥舅关系，一面不时窥机在唐蕃边界制造一些武装冲突。

天宝十四载（755 年），中原地区爆发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安史之乱”，它不仅使“开天盛世”就此结束，唐朝从此走向衰落，同时对中亚史也有巨大影响。为迎击叛军，唐朝四处调兵，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的多支唐军劲旅都被调往中原奔赴国难，西北边备顿显空虚，早已觊觎唐土的吐蕃趁机跃马东进，很快攻陷了陇右的十几个州郡，并于 763 年十月攻进唐朝京师长安，大肆掠夺施暴，十几日后又退回陇右，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对黄河以西唐朝疆土的大举进攻。

陇右的失陷使河西与中原的联系中断，尽管河西汉唐军民与吐蕃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终因势单力薄而无法阻挡吐蕃的百万铁骑，河西诸州渐次落入吐蕃之手。

吐蕃赞普赤松德赞亲自指挥的这次进攻是由东

向西推进，764 年攻克了凉州，此后凉州遂成了吐蕃在河西地区行使统治的最为重要的根据地。两年后的 766 年，吐蕃又占领了甘州和肃州，迫使河西节度使西奔。776 年吐蕃更攻陷了瓜州，再向西就是河西走廊最西端的绿洲城市沙州敦煌了，此时沙州已成了河西尚在抗蕃固守的最后一个据点。

早在永泰二年（766 年）五月甘、肃二州相继陷落后，河西节度使杨休明便已移镇沙州，指挥这里及其邻近地区的抗蕃斗争。杨休明阵亡后，副将周鼎便派人赴安西四镇（一说回鹘）搬请救兵。一年多后仍无结果，吐蕃却已徙帐南山，大将尚绮心儿率雄兵开始强攻沙州城，周鼎遂打算焚烧城郭，引领众人逃往他处。但部下中多有主张抗战到底的将士，兵马使阎朝缢杀了周鼎，自领州事，率众又固守了多年。

迨至 781 年（又有 777、786、787 年诸说）时，沙州已被吐蕃围困了 10 余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无法再撑持下去了，阎朝等便提出了沙州百姓不迁徙他境的条件，登上城墙与吐蕃议和，得到吐蕃统治者的明确承诺后才放弃武装，接受了吐蕃王朝的管辖。后来吐蕃统治下的沙州民众，将阎朝经过谈判出降，吐蕃和平占领沙州这一历史事件简称为“番和”。今天我们在吐蕃时期的敦煌文书中经常可以看到“番和”一词。这个“番和”是敦煌人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苦战 10 余年换来的，它使敦煌民众能够留居故土，沙州地方得以保全免

毁。敦煌人民为桑里所进行的这番艰苦斗争是可歌可泣的。

2. 敦煌人民的反抗与吐蕃的统治措施

吐蕃占领沙州后不久就密谋杀害了阎朝，但是沙州人民的反抗并未因此而停止。据敦煌文书载录，沙州民众曾多次起义反抗吐蕃奴隶主的残暴统治，其中较著名的是驿户汜忠国（此据 S.1438《书仪》引录，有些学者录为“汜国忠”）与张清领导的起义。仅汜忠国领导的那次发生在一昼夜间，只有十来个人参加的规模很小的起义就给了吐蕃统治者以沉重打击，迫使吐蕃在沙州的最高统治者节儿蕃使等自焚于火中，说明驿户们的反抗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得到了人民的同情和暗中支持。

面对沙州人民接连不断的反抗，吐蕃统治集团大为恐慌，他们在直接派兵镇压的同时，还尽收民间铁器，以严加防范。但人民的反抗仍然此伏彼起，迫使吐蕃不得不放弃最初的残暴镇压政策，与百姓多次盟誓，并利用降蕃唐官维持统治。

吐蕃对沙州的有效统治大约始于 788 年。这一年吐蕃在沙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户口清查活动，以后又彻底废除了唐朝的乡里制，强制推行吐蕃本土行用的部落制，将普通民众全部编入部落。现在已知吐蕃在沙州至少编制过两次部落。第一次是在 790 年前后，编制了僧尼、行人、丝棉、上、下、撩笼、中元等部落。第二次是在吐蕃统治中期的

820 年左右，编创了阿骨萨、悉董萨、悉宁宗 3 个汉人军部落，以后还编制过通颊军部落。吐蕃这一次编创军事部落实际是要将沙州地区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臣民纳入自己的军事组织中，以应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期统治的需要。

吐蕃在河西统治的军政中心是凉州和瓜州。在瓜州设有乞利本（意为万户长，相当于唐之节度使），沙州在他的辖区之内。沙州的军政长官名为节儿，属千户长，一手掌管着军防、征税、判案等一州之全权。节儿的下属官员有小千户长、将头等。将头统管部落的下级组织“将”，将的规模约与唐朝的乡相仿，是沙州百姓申报户口，造作手实，交纳赋税，承担杂役的基本单位。

吐蕃在统治沙州敦煌初期曾推行过计口授田制度，并改行新的赋税制，按地亩征收地子（地租），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赋税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在加重百姓经济负担的同时，吐蕃还在沙州实行了森严的民族统治，推行了一系列吐蕃化的管理措施，以尽可能消弥汉唐影响。这种情况在吐蕃统治初期尤其严重，他们于占有敦煌不久即规定当地居民不得继续使用唐朝的纪年历，而要改用吐蕃的五行地支历，用地支和十二生肖纪年。这种纪年法相当粗略，循环周期很短，根本不便使用，敦煌文书 S.3287 中的《甲子五行歌诀》即反映了其部分内容。除废除唐历外，吐蕃奴隶主贵族还惧怕使用

汉语会引起沙州人民民族感情的激发，而强制推行吐蕃的语言文字，今日敦煌文书中还保留有大量藏文文献。在生活习俗上，吐蕃奴隶主强迫沙州人民吐蕃化，逼迫汉人辮发易服，仅准他们在每年正月穿着汉装祀祷恸哭，之后又须立即收藏，恢复吐蕃服饰。在经济生活中，吐蕃也推行他们的交易方式，禁用唐朝的货币，使商品交换又倒退回实物交易的阶段。

吐蕃虽凭借武力和行政命令强制推行了这些措施，但是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相对于高度文明的沙州敦煌来讲毕竟是太落后了，仅靠他们自己根本无法行使统治，因而不得不拉拢当地的世家豪族，利用他们和降蕃唐官稳定政治局面。吐蕃曾将大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委以重任，到后来甚至将沙州地方的部分政权、军权和税收管理权也交给了他们。敦煌文书（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功德记）中所载的阴嘉政、阴嘉义、阴嘉珍一门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任用汉人的同时，吐蕃也调整了其他一些统治策略，保存沿用了某些唐朝旧制甚至北朝时的制度，如呈报手实的格式即续用唐制，北齐的驿户旧制也被重新启用，而源于北朝的寺户制度更是随着佛教的大发展再度盛行。

3. 吐蕃占领时期迅猛发展的敦煌佛教

吐蕃统治者笃信佛教，在他们的提倡和扶植下，敦煌的佛教事业继续向前发展，取得了独尊地

位，同时还躲过了唐会昌灭佛的法难。

佛教的大发展首先表现在敦煌佛教理论水平的提高。吐蕃统治者经常请内地高僧来敦煌讲经，又在沙州地区组建了译场和经坊，延请高僧于此译经，并不断派人赴中原求经，以补充和丰富敦煌经籍的内容。这些举措使得敦煌地区的译经和著述活动十分活跃，高僧迭出。如著名僧人摩诃衍就在番和后将许多汉藏文佛经互译，并奉吐蕃赞普诏命赴逻娑（今拉萨）传授汉地顿悟禅法。另一位高僧昙旷也著有《大乘入道次第开决》、《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记》、《大乘百法明门论开宗义决》、《大乘二十二问本》等书，其中的《大乘二十二问本》系应吐蕃赞普所请而写，在中国佛教史上非常有名。那时赤松德赞对拉萨教学论争中的一些问题十分困惑，遍访当地僧侣仍得不到解答，遂特意致函敦煌大德昙旷，请他为自己解惑。昙旷便于 780~787 年间撰写了这本书，一一回答了有关佛教渐顿之争的疑难问题，对西藏佛教界影响很大。

进入 9 世纪以后，西藏佛教获得了很大发展，敦煌此时也开始吸收西藏佛教的一些内容来提高本地区佛教的理论水平。833 年西藏高僧法成就曾来到河西，在沙州、甘州等地居留了 20 多年，翻译了大量佛经，成为河西高僧之首，对西藏佛教在河西敦煌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与高僧辈出相应，普通僧尼的人数也急剧增多。当时仅 3 万人的沙州就拥有上千僧尼，僧尼占

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他地区，吐蕃统治者遂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进行管理，将僧人相对集中，在编创部落时将僧尼划并入一个僧尼部落，同时建立一套僧官制度，区分不同僧职：在占领敦煌初期先是暂时沿用唐朝旧制，至 810 年以后更用吐蕃新制，出现了三学教授、都教授、都法律、法律、尼法律、都判官、判官等僧官名称。教团内部组织则以都僧统司或都教授司（简称都司）为最高机构。都司下面再设立许多直属分支机构，分别掌管具体宗教活动或日常事务，如 徕司负责由布施所得财物的保管和分配，佛帐所掌管佛物，常住处掌管僧物。各机构由专门僧官具体负责，定期更换。

吐蕃统治时期，敦煌佛教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其活动的宗教色彩减弱，世俗化倾向愈益强烈。在政治上既依附于世俗政权，附和官府意志，又参与政事，辅助官府统治百姓。在经济上这种世俗化倾向则表现为寺院经济的空前繁荣。吐蕃统治者积极给敦煌各寺配备土地和寺户，这些寺户是寺院的依附者，地位相当于唐朝的部曲，他们为佛寺耕种土地并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使寺院财富遽增，进而发放高利贷营利。为执掌寺院的经济活动，当时的佛寺中除“三纲”而外，普遍增置了“寺卿”一职，由俗人担任，参与寺院中寺户、僧籍、财务等寺务的具体负责管理和监察。

随着佛教势力的膨胀，敦煌地区的建寺开窟活动十分活跃，新增建了永康寺、兴善寺、永寿寺、

三界寺、显德寺、净土寺、安国寺、圣光寺等 10 来所寺院。其中圣光寺是攻陷沙州，并任驻守沙州第一位吐蕃长官的吐蕃大相尚绮心儿在沙州城内兴建的。与建寺同时，吐蕃统治时期河西地区的开凿造像活动也很频繁，莫高窟和榆林窟中都新修了许多洞窟。

4.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

莫高窟今存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 40 多个。这一时期的莫高窟石窟艺术与唐前期，特别是盛唐的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在洞窟形制、窟内彩塑和壁画艺术上又有自己的特点。

吐蕃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 3 种，最常见的为继承盛唐遗制的殿堂式；另一种为涅槃窟，平面呈横长方形，盝形顶，正壁下为通壁宽的佛床，佛床上塑卧佛，第 158 窟是吐蕃时期最大的涅槃窟；还有一种为燧道窟，平面也大体呈横长方形，圆券顶，正壁下修佛床，佛床后凿通与人等高的隧道，供善男信女们右旋念经礼佛，这也是一种大型洞窟。吐蕃时期洞窟的修造十分考究，窟顶华丽，四壁方整，盝顶帐形龕以及佛床、壶门等无不严整精巧。

吐蕃时期莫高窟彩塑的内容与唐前期基本相同，为释迦牟尼佛像，三世佛、七世佛像及由佛与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胁侍组合而成的群像。在吐蕃时期众多的彩塑中，第 158 窟的涅槃像成就

最高。这尊涅槃像长达 15 米多，右胁而卧，躯体比例适度，着通肩袈裟，衣纹随身体的起伏自然变化，圆润流畅。释迦头部的塑造尤为成功，面相丰腴，眉慈目善，嘴角微含笑意，神态安详平和，绝无凡人临终前的痛苦悲哀，而是自若如睡，充分展示了涅槃境界的玄妙。佛的祥和与背后壁画中情态各异的举哀弟子们的悲痛欲绝正成鲜明对比，足以代表敦煌（涅槃变）的最高水平。

吐蕃时期莫高窟壁画的种类与唐前期差别不大，可约略分为佛像画、经变画、瑞像画、装饰图案、供养人像 5 大部分。

佛像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随着西藏佛教的传入，出现了许多密教神像，如不空绢索观音、如意轮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钵文殊等，造型刻板，严格规仿佛经，新意创见极少。

吐蕃时期的壁画仍以经变画为主，与唐前期相比，新开窟壁画中最突出的变化是经变数量的增多和屏风画的大量出现。一般每壁之上都画有 2~4 幅经变，甚至更多，壁面下部又配有 12~14 幅屏风画。壁面布局紧凑是为了适应经变题材增多的需要。吐蕃时期除继续描画唐前期已出现的经变，还增画了 7 种新经变，即《天请问经变》、《金刚经变》、《报恩经变》、《金光明经变》、《华严经变》、（楞伽经变）和（思益梵天所问经变）。这 7 种经变的出现与天台宗判教之后中原地区佛教宗派林立，进而影响边地密切相关。说明当时敦煌佛教与内地

佛教界联系广泛，可以很快地反映内地佛教的变化，以适应本地信徒的不同思想状况和信仰需要。

在延续前期题材的壁画中，具体绘画内容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者莫过《维摩诘经变》中维摩诘帐下的各国王子群像已演变成了吐蕃赞普礼佛图。画中赞普形体高大，头戴红毡高冠，身穿左衽长袍，束带佩剑，前后有奴婢武士护从，赞普位居队列之首，其他各族王子均退居次要位置，成为赞普的陪衬。这正是吐蕃占领沙州这一政治事件在敦煌艺术上的反映，也是今日学者们研究藏史的宝贵资料。

吐蕃时期的经变画不仅着重描绘佛、菩萨、弟子们的形神体态，对其他人物的描绘也非常精致细腻。如第 112 窟南壁《观无量寿佛经变》中，反弹琵琶的天宫伎乐的形象就是莫高窟同类造型中最优美的一身。画中天宫伎乐面相丰润，修眉细目，樱口朱唇，神情专注自然，体态婀娜轻盈，服饰鲜丽飘洒，琵琶置于身后，两臂上举反弹，右脚高抬，和拍腾挪，舞乐相济，优美至极。

瑞像图是吐蕃统治晚期新出现的题材。这种瑞像图绘佛教神迹，原本传自异域，却与我国传统的祥瑞讖纬学说有某种精神上的契合，因而不仅外域的瑞像图在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同时还增加了一些中国的灵瑞故事。如第 231 等窟中的番禾县圣容像就是依据广泛流传于河西地区的刘萨诃神异故事绘制的，宣称刘萨诃（法名慧达）曾在番禾县御

山预言该地将会有佛像涌出，像完好与否可兆示当地的祸福吉凶等。吐蕃统治时期莫高窟壁画中类似的瑞像图种类与数量都不少，这与当时佛教感应思想流行有关；相应的，敦煌文书中也保存有很多佛教感应故事。

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装饰图案中最出色的是石榴卷草纹的描绘。这种纹样将石榴树变形为卷草，舒卷自如，可随需要延长，能长达数丈，甚至绕窟一匝，既富于变化，又有很好的整体效果。

供养人像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高僧像的出现，和僧像形体的高大。如第 158 窟门侧就画有近 2 米高的僧侣像 4 身，并书榜题云“大蕃管内三学法师持钵僧宜”等，其他各窟的供养人像中也多有僧侣，并居供养人之首，说明吐蕃统治时期僧人的地位很高，已广泛参与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拥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

吐蕃统治时期，河西走廊西部的政治中心是瓜州，因而这一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成就除体现于沙州莫高窟外，在瓜州境内的榆林窟及其他几处石窟群中也有反映。

敦煌石窟这一概念原本就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敦煌石窟即指莫高窟；广义的敦煌石窟则泛指古敦煌郡境内的所有石窟，除莫高窟外还应包括：

西千佛洞，位于今敦煌城西南 35 公里处的党河岸壁上，因莫高窟又称千佛洞，此石窟群居莫高

窟之西而得名。西千佛洞的开凿时代与莫高窟相近，现尚残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元、清、民国等时期修建或改建的洞窟 22 个，但损毁严重，内中所存彩塑、壁画数量不多。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位于安西县城西南 70 公里处的踏实乡境内，开凿在榆林河峡谷两岸的断崖上。约始凿于北魏，但大规模营造活动则盛行于唐代，特别是吐蕃时期。现尚保存有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清、民国时期的大量绘、塑作品，尤以吐蕃时期兴建的第 25 窟，和西夏时修造的第 2 和第 3 窟的艺术价值最高。

东千佛洞，位于安西县桥子乡南 35 公里处的峡谷河床两岸，是西夏和西夏以后开凿的一个以表现密宗内容为主的石窟寺，现存有塑像和壁画的洞窟 8 个，主要反映了西夏、元、清 3 个历史时期的石窟艺术。

水峡口下洞子石窟，位于安西县城南 50 公里的榆林河下游。现存有壁画的五代、宋、西夏、近代窟共 8 个，但损毁严重。

五个庙石窟，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北 20 公里处的狼湾，约始凿于北朝，现存较完整的 4 窟中还保存有不少五代、宋、西夏、元等时期的壁画。

一个庙石窟，位于今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城北约

20 公里处党河东岸的吊吊水沟北面的断崖上。约始凿于北朝或隋末唐初，现存两窟中尚残存有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壁画、供养人题记，和民国时期的绘画与游人题记。

昌马石窟，位于玉门市玉门镇东南 90 公里处的祁连山麓，现尚存窟龕 11 个，其中 4 窟还存有造像及壁画，为北凉至西夏时期作品。

上述各窟群中，保存有较多吐蕃时期艺术作品的主要是榆林窟第 25 窟。该窟位于榆林河（又名踏实河）东岸崖壁中部，分前后室，前室和甬道都已经五代重修重画。其前室平面呈横长方形，甬道长而宽阔，主室平面则为方形，顶部为覆斗藻井，今已坍塌。主室中部设方形佛床，上面的塑像也已经损毁，今存吐蕃时期的艺术品主要是主室四壁的壁画。其西壁门两侧为《文殊变》、《普贤变》，南壁为《观无量寿佛经变》，北壁为《弥勒下生成佛经变》，东壁为《八大菩萨曼荼罗》。该窟主题是宣扬大乘净土思想。南北两壁的布局安排与莫高窟唐前期同类窟相同，东壁的《八大菩萨曼荼罗》是密宗图像，八大菩萨现存 4 身，为文殊、弥勒、地藏、虚空藏菩萨，主尊为菩萨装结禅定印，这类密教图像的出现与西藏佛教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

第 25 窟壁画中每每为人们称道的传神之作是西壁文殊、普贤变中两个昆仑奴的形象。昆仑奴是菩萨的随从眷属，其职责是司御文殊、普贤的坐

骑。文殊的坐骑为青狮，勇猛好动，灵活敏捷，瞪目张口，奋蹄前行，御狮的昆仑奴不得不叉开双腿，倾身向前，又伸开两臂，头向后倾，用力拉拽缰绳，以减慢雄狮的行速。相对的昆仑奴所面对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普贤的坐骑由象身躯庞大，温顺驰缓，俯首垂眼，缓缓迈进，御象的昆仑奴只得侧身扬鞭，怒目推搡。极为想使白象加快速度。两只坐骑性格相反，司御的昆仑奴的神态也就随之迥异。这种成功刻画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完全可以和莫高窟壁画中的精品媲美。

总起来讲，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题材内容进一步现实化。洞窟形制愈益摹仿汉式宫阙，人物服饰也出现了很多吐蕃装束，并为适应佛教宗派分化的需要而增加了多种经变。同时《举哀图》的成功描绘和《五台山图》随《文殊变》的一画再画也都间接反映了吐蕃贵族奴役下沙州人民的心情，皆是现实化倾向的具体体现。

其二，构图布局程式化。吐蕃时期壁画的布局相当稳定，结构严谨得几近刻板拘束，画面内容也越来越多，一味想表现经变画的热闹场面，反而失去了唐前期活泼欢快的格调，有堆砌壅塞之嫌。但新出现的屏风画却是一种较新的构图形式，屏风画内容多与上部经变画相关，所图绘的故事细节与整铺经变相映成趣。

其三，艺术表现手法更趋细密清雅。吐蕃时期的艺术家继承唐前期的技法并有所发展，人物刻画更加精致细腻，灵活运用线描表现质感，兰叶描的运用已臻于圆熟。色彩上也更加明快清雅，因交通阻隔，吐蕃时期已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利用内地运来的颜料，而是要就地取材，大量采用石绿色，故这一时期的壁画多呈现出清淡、典雅的色调，分外柔丽。

五、归义军统领时期的敦煌

848 年沙州豪族张议潮率军驱逐了吐蕃守将，奉土归唐。唐中央政权遂于大中五年（851 年）遣使河西设立归义军，并以张议潮为首任节度使，敦煌从此进入归义军时期。

归义军统治时期的敦煌历史约略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为唐王朝的一个西部方镇，与中原的蕃镇有某些共同特点。唐亡以后中原的割据势力纷纷自立为王，此时的归义军节度使张承奉也自封白衣天子，建立西汉金山国，成为第二个以敦煌为京畿的封建王国的国主，但几年后就因在与甘州回鹘的战争中失败而将金山国降格改制为敦煌国，又勉强维持了几年。西汉金山国和敦煌国是敦煌近 200 年归义军历史上的一个短暂的中断，两国存在的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 10 年。张承奉去世后接管政权的曹仁贵（议金）取消敦煌国名号，复称归义军，开创了归义军历史上的第二个阶段——曹氏时期，将归义军政权又延续了 140 余年。

1. 敦煌等地的收复与归义军的建立

842 年，吐蕃赞普达磨去世，但他没有子嗣，王后与大相便各立赞普，导致了吐蕃最高统治集团

的分崩离析，吐蕃本部及其他属地随之大乱。吐蕃的内乱给唐朝收复河湟失地提供了机会。大中元年（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与吐蕃军将尚恐热在盐州展开激战，尚恐热大败，兵力损伤很大。第二年唐凤翔节度使崔珣又率军收复了原州、石门等六关和威州、扶州等地，河陇人民由此受到极大鼓舞，归唐的愿望更加迫切了。

在这种形势下，大中二年（848年）沙州豪族张议潮率先举起了义旗。他以“归国”为号令，广泛团结组织包括僧人在内的各方面力量，一举逐走了吐蕃守将，收复了沙、瓜二州，被吐蕃占领了六七十年的沙州敦煌终于重归汉人治下。

张议潮深知“归国”口号在收复瓜沙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所以起义胜利后立即决定修表朝廷，向唐王朝报捷。但此时河西其他州县仍处在吐蕃统治之下，很难通行，张议潮遂派遣 10 队使者，携带同样的表文，分 10 路赶赴长安。被派使者中除军将文吏之外，还有一些沙州高僧，派他们前往除因为僧众曾支持和参与了收复瓜沙的起义外，同时也是由于吐蕃人崇信佛教，在他们统治区域内僧人较易通行。经过千辛万苦，走东北道的一路使者终于在天德军（驻今内蒙古包头附近）防御使李丕的帮助下，于大中四年（850年）左右抵达京师，此时唐皇才知道朝廷未派一兵一卒，瓜沙二州就已经复归了。

派出首批使者的同时，张议潮以沙、瓜为根据

地，积极整饬军队，发展生产，继续向其他州县进军，到大中五年（851年）时已收复了除凉州等个别州县而外的全部河西失地，遂于八月又派出由其兄张议潭（谭）、州人李明振、吴安正等 29 人组成的第二批使者，携带天宝年间的河西陇右十一州（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旧图再入长安告捷，以表明自己要收复唐朝全部西北失地的意图。唐宣宗于是下诏褒扬瓜沙军民的忠勇，拜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十一州观察使，李明振为凉州司马检校国子祭酒、御史中丞，其他功臣也各封赐有差。张议潭则留质长安，换取唐王朝对瓜沙军将的信任。为加强西北边备，十一月唐王朝还在沙州正式建立了归义军，以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统领十一州军政全权。“归义”是“豆卢”的意译，军称归义意指承袭神龙时期在沙州建立的豆卢军。归义军的建立标志着河西地区的政治中心又自瓜州西移沙州敦煌，和敦煌历史上近 200 年的归义军时期的开始。

2. 张议潮在沙州敦煌的建树

唐朝虽然在沙州建立了归义军，但由于此时唐朝国势已经衰微，对边地只能采取羁縻政策，河西实际上处于半独立状态，张议潮等是这里的真正主宰。面对吐蕃半个多世纪统治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张议潮和他的助手们果断地采取了几项重大措施进行整治。

其一，恢复唐制。按唐朝的藩镇体制建设归义军的军政机构，设立与内地藩镇一样的文武官吏，制订相应的文书、行政制度，保障归义军有效行使统治权。在对平民百姓的管理上重建唐朝中原地区实行的州县乡里制度和城坊制度。以敦煌县的建置为例，张议潮领州后即恢复了原 13 乡中的 10 乡，改悬泉乡为赤心乡，复寿昌乡为县，从化乡则随着粟特人聚落的消散而自然消失。这样归义军统治初期的敦煌县便领有 11 乡：敦煌乡、莫高乡、神沙乡、龙勒乡、玉关乡、洪池乡、洪闰乡、效谷乡、赤心乡、慈惠乡、平康乡。这些乡中都设置了知乡官和知乡将务官等，分别负责管理乡中的政务和军务，乡官的职权大大加强，这是对唐朝以里正为主的乡里制的一种发展。

其二，妥善管理少数民族部民。归义军辖境内有许多少数民族百姓，张议潮等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了两种管理办法：凡粟特、龙家等汉化程度较深的少数民族百姓都尽量编入乡里制中，让他们与汉人同居共处，并吸收他们中的上层人士为归义军政权的各级官吏；对于吐蕃化较深的退浑和通颊人，则部分继承吐蕃旧制，仍旧沿用部落制，设部落使和部落副使进行管理。据敦煌文书载录，共保留有约 10 个部落，表明归义军政权在恢复唐制的同时，也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吸收了吐蕃制度中的合理因素藉以巩固新政权，这不能不说是归义军统治多民族地区的明智措施。

其三，确立新的僧俗关系。张议潮废弃了吐蕃时期的僧官制度，恢复了唐朝的都僧统制，与归义军时期的首任都僧统洪誓（音 biàn，洪誓俗姓吴，故又称吴和尚）密切合作。一方面解放被吐蕃贬为寺户的良人，恢复他们原来的良人身份，使之成为乡管百姓以收揽人心，并增加归义军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和洪誓一起调查登录寺院财产，设都僧统司统一管辖，并规定任何人均不得侵夺损毁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人户。这些规定自然赢得了僧侣们的欢迎，再加上当地统治者的热心奉佛，大力扶植佛教事业，僧众们也就甘心为归义军政权所用，归义军政权逐渐取得了凌驾于都僧统教权之上的优势。

其四，重新登记人口和土地，订立新的赋税制度。张议潮掌权后很快就对混乱不堪的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进行了重新调查登记，试图恢复唐前期的手实户籍制度，解决无地或少地农民的耕地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新赋税的名目主要有官布、地子、柴草 3 项，虽比唐前期的租、调略重，却远比吐蕃时期的重敛轻得多。

此外张议潮还组织人力对沙州敦煌的灌溉设施进行了整修，为农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水利保障，这些举措又进一步巩固了归义军政权的财政基础。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推动下，沙州敦煌的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归义军政权也很快壮大起来。经过 10 年苦心经营之后，咸通二年（861 年）三月，张

议潮统率蕃、汉军兵 7000 人向吐蕃奴隶主在河西走廊上的最后一个军事据点——凉州发起了进攻，一举光复凉州，河西故地尽归唐有。到咸通七年（866 年）时，归义军治下的回鹘固俊（《新唐书》作仆固俊）更攻克了西州、北庭、轮台等地，使已断绝百年的东西交通旧道又得畅通。归义军政权随后便设立了知西、北、东、南各道游奕使，对加强西北与中原地区的政治联系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回鹘固俊获胜的同时，拓跋怀光也于廓州生擒了吐蕃战将尚恐热，吐蕃势力从此衰绝，河西地区终于初步形成了统一局面。

这时，留质长安的张议潭以 74 岁高龄逝于长安永嘉坊私第。咸通八年（867 年），69 岁的张议潮遂束身归阙，亲赴长安为质，被唐廷授为右神武统军，晋官司徒，并赐田地，在左街宣阳坊安居，至咸通十三年（872 年）时也以 74 岁高龄客死他乡，葬于长安东南浐水之滨，被朝廷追赠为太保，故敦煌文书中颂赞张议潮时每每有仆射、太保之称。

3. 张氏时期归义军节度使的更替

张议潮入质长安时将河西地区的军政要务全部委托给议潭之子张淮深。张淮深早在大中七年（853 年）时便接替其父担任了沙州刺史、左骁卫大将军等职。领有归义军实权后，他沿用张议潮时期的各项政策措施，使沙州社会又向前稳步发展了

一段时期，并逐渐恢复了唐前期的繁荣。但到他执政后期，归义军政权的外患内忧却渐趋严重，周边的少数民族不断骚扰河西，内部亲眷中的反对势力也更加强大，终于在大顺元年（890年）二月杀害了淮深夫妇和他们的几个儿子。

张淮深之死是敦煌归义军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争论的焦点是杀他者为谁。由于史籍缺载，现有资料中的文句又隐晦难辨，所以学者们各执一端，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作出了多种解释，索勋、张淮鼎、张延兴与张延嗣兄弟（据说为淮深庶子）等都成了被猜测争议的对象。

但无论执哪一种说法，目前对张氏统治时期归义军节度使世系的认识大体上还是一致的，普遍认为继议潮、淮深之后出任归义军第三任节度使的是淮深弟张淮鼎（议潮或议潭子），但他在位仅两年便去世，由议潮婿索勋接替了他的职位，又二年索勋也去世，894年后节度使之位遂归张氏后代张承奉。

关于索勋的死因现在学界的看法已趋向一致，认为索勋当政后独揽大权，逐渐引起了同为议潮姻亲的李氏家族的不满和妒忌，嫁给李明振的张议潮女张氏遂率诸子于894年诛杀了索勋，名义上立侄男张承奉为节度使，实权则分掌于李氏手中：李弘愿任节度副使兼沙州刺史，李弘定任瓜州刺史及墨离军押蕃落等使，李弘谏任甘州刺史等。但不久李氏家族的专权又招致了瓜沙其他大族势力的反对，

于 896 年初群起推翻了李氏统治，张承奉终于掌握了节度实权，并于光化三年（900 年）得到了唐廷的正式承认。

4. 西汉金山国与敦煌国

当张承奉最终获得节度使职权时，中原正纷争不已，907 年时朱全忠已弑哀帝，篡唐建梁，各地割据势力纷纷称王称帝，中国社会重又进入大分裂时期。处于这种动乱纷争的时代，偏居西隅的张承奉自然也不甘寂寞，遂效法李唐符谶编造白雀之瑞，自称白衣天子，建立了西汉金山国。“西汉”意指其国为西部汉人之国，“金山”则是指敦煌西南的金鞍山，即今甘、青、新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古代敦煌人将它和州城东南的三危山同视为护卫敦煌的神山。关于金山国的创建年代，学界尚有争议，大体上可说是建于 10 世纪初期。以敦煌为中心的西汉金山国的建立是河西 200 年归义军时代的一个间断。在传世史书中，关于西汉金山国的记载仅新旧《五代史·吐蕃传》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²⁰ 个字。敦煌文书面世后，人们才对它的某些史事，特别是与强敌回鹘争战的历史有了一些了解。

金山国所在的敦煌及其周围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聚居区，吐蕃占领这一地区之后更有意识地迁入了一些民族，如退浑、通颊、龙家、沙陀等即分别从东西两侧大批迁入，使这里的民族成份更

加复杂。至 9 世纪中叶时，随着原位于蒙古高原的回鹘部众的四散奔逃，在张氏政权东西两侧的甘州和西州一带已逐渐形成了两支非常强悍的回鹘势力，成为归义军政权最大的政敌。

西州与沙州辖境毗连，为伊州的归属张氏与西州回鹘曾多次争战。甘州回鹘更是在原归义军领地内建立的王国，与张氏政权的冲突自然接连不断。张氏政权前期统领有方，势力强大，在与回鹘的争斗中多次获胜。如大中十年（856 年）六月在纳职城西与回鹘的激战中，张议潮领导的归义军就俘获了大批驼马，得胜而还，后来张淮深当政时也曾大败回鹘，俘虏了 1000 多人，敦煌文书《张淮深变文》就对他的这段功绩大加称赞。

至张承奉接任归义军节度使后，张氏的力量已大不如前，甘州回鹘对敦煌的侵扰更加频繁，至迟在 904 年秋天，就与张氏政权发生过激战，在张承奉建立西汉金山国的当年，双方又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战争，迨至 911 年时回鹘更大举进攻金山国。此时金山国已是国力衰微，人民厌战，终于败给了回鹘，当七月回鹘兵临城下时，自宰相以下的沙州僧俗百姓 1 万人便上书回鹘可汗与之议和，表示愿与回鹘结成子父之国。此后不久张承奉被迫取消了“圣文神武白帝”、“天子”的帝号，改称“圣文神王”、“敦煌国天王”。西汉金山国也改称敦煌国，由天子之国降为诸侯之国，变成了甘州回鹘的属邦，其原有地盘之一的肃州也被割去，新的封疆只

有瓜沙二州，即古敦煌郡的范围，“敦煌国”之名就是以地名邦的结果。“天王”则是回鹘“天可汗”下面部落首领的名号。

敦煌国是西汉金山国的改弦更张，是在金山国的基础上降格改制而成的，它称甘州回鹘可汗为“父”，己国国主为“子”，在屈辱受制的情况下苟延残喘了数年，大约到 914 年五至十月之间随着张承奉的去世，敦煌国也就自然消亡了。

金山国与敦煌国前后存在的时间不过 10 来年，上承张氏，下启曹家，以后执掌敦煌的曹氏又将其政权名称回改为归义军。

5. 曹氏归义军政权在敦煌的统治

张承奉去世后州将曹仁贵被众人推举出来接掌政权。曹仁贵接受张承奉自称天子，尽失人心的教训，废弃敦煌国国号，奉中原王朝正朔，恢复了归义军的旧称，敦煌历史从此进入了归义军政权的第二个时期——曹氏时期。从时间上说曹氏时期正相当于中原的五代和宋初。

曹仁贵，字议金，最初以名显于世，约自 920 年前后改用字题署之书，他是张氏的姻亲，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开创者。上任后为扭转张承奉留下的混乱局面，曹仁贵制定实施了几大措施。以后曹氏归义军政权的内政和外交基本都遵行了他的策略，从而使曹氏归义军在中原政权走马灯般的交替中引人注目地支撑了一个多世纪。

首先，曹氏注意利用中原王朝在西北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声威树立自己的正统地位。曹氏与中原王朝之间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对中原王朝的奉献朝贡从未间断，历任节度使也均于自封前后向中原朝廷请授旌节，以得到王廷认可为要，十分重视名正言顺，敦煌曲子词中“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正唱出了曹氏立国的基本思想。

其二，妥善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当曹仁贵重建归义军时，甘州回鹘已占据了瓜沙之外的河西各州，就连瓜沙二州也是他们的附庸，这样曹仁贵不得不暂时承袭张承奉留给他的与甘州回鹘可汗的子父关系，继续委屈求全。但同时他也积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先主动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缓与回鹘的关系，又分别嫁女给于阗国王李圣天、吐谷浑王族后代瓜州刺史慕容归盈等，以利用他们的势力牵制回鹘，并使周边各族相互制约，在夹缝中保存发展自己。

在曹仁贵（议金）的苦心经营下，10年后的归义军政权已积蓄了相当实力，终于在924年底或925年初乘甘州回鹘内乱之机发动了攻打这个最大政敌的战争。此战曹议金亲自领兵围攻酒泉、张掖，战败回鹘，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打通了经甘、肃二州通往中原的河西旧道，加强了归义军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促进了中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同时，战争的胜利也彻底改变了归义军与回鹘之间的关系，在重新结成的“父子”之盟中，归义军已

取得了主动权，节度使升格为父，甘州回鹘可汗降为子。到 928 年时，仁喻继承了可汗位，被后唐册封为顺化可汗，曹议金便与之兄弟相称，两地关系已称平等友善，并一直维持到曹议金去世。以后虽有恶化，但至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继位后，又极力仿效议金的作法，再次与回鹘结成了人为的血缘关系，在他执政的后半期，两地的友好关系终于又恢复到了曹议金时代的水平。

曹元忠之后的几任节度使也多遵行和亲策略，如第五任、第六任节度使曹延恭、曹延禄就曾分别娶吐谷浑慕容氏为妻，曹延禄又与于阗金玉国皇帝女结亲等。通过联姻及其他外交手段，曹氏归义军与周边民族之间基本都保持住了平等共存关系，与于阗等国更是始终友善，在 1006 年于阗王国灭亡之前，两地的使节往来从未中断过。

其三，加强地方建设，置镇设使。曹氏归义军的辖地前后变化很大，始终由他们统领的仅是瓜、沙二州。曹氏在州下设镇，设县令在镇中分管政务，上领于州，下统乡、里、坊。镇中同时置镇遏使总理军务，直接受制于节度使，其下则有烽、铺、捉道等一套军事机构和人马。此外镇中还设有监使，与县令、镇使分掌监、政、军三权，也是节度使的下属。

其四，注意文治，大兴佛事，以文化取胜于周边民族，以佛教为政权的精神支柱。在这一点上，曹氏与张氏归义军政权的作法完全一致，正是这种

文化政策上的连贯性，使得以佛教为主体的沙州文化在西北地区取得了独尊地位，深受少数民族政权的推崇。

此时敦煌佛教的发展突出表现在僧尼人数的增多和僧众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而这些又是敦煌独特的历史演进状况造成的。

安史之乱时唐王朝曾以军兴用度不足，在全国范围内几次出售度牒，使很多人成了不出家，但却可以逃避税役的伪僧人，这股风气也波及到了河西沙州地区。但唐王朝稍稍安定下来后便对中原地区的伪僧人进行了沙汰，将僧尼人数控制在总人口的百分之一左右。此时河西沙州却已沦为吐蕃领地，吐蕃对他们非但未与沙汰，反而将他们编入了僧尼籍，其身份进一步合法化，以致归义军建立后沙州敦煌地区的僧尼非常多，有时竟能达到当地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地区，甚至超过了武宗灭佛时僧尼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但如此众多的僧尼却得到了归义军政权的认可。

早在吐蕃时代，敦煌的僧尼就在被编入僧籍的同时又编入户籍，与世俗百姓一样，向吐蕃政权交纳基于人身的突税。至归义军时代，他们更不象内地僧尼那样是一个“待耕而食，待织而衣”的寄生阶层，大多数敦煌僧尼并没有脱离生产，有些僧人甚至没有脱离家庭，不住寺而与家人同居共处，甚或拥有妻室子女。他们都同普通百姓一样向归义军政府缴纳基于所请土地和按户征收的赋税，既没有

成为政府的财政负担，也没有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曾引起世俗社会的反感。所以归义军政权对本地佛教一直持扶植、保护、利用的态度，致使这一时期的敦煌佛教获得了长足发展，而归义军政权也由于博得了僧尼的支持更趋巩固。

6. 曹氏节度使的更替及归义军政权的消亡

清泰二年（935年）曹议金去世，其子元德继任节度使，四年后元德故世，弟元深代掌归义，后五年元深卒，弟元忠继位。曹元忠是三兄弟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至北宋开宝七年（974年）六月去世时已当政30多年，此间正是曹氏归义军政权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归义军始终保持着与中原王朝的臣属关系，不断遣使朝贡，并得到了后周、北宋等中原王朝的承认。

接替曹元忠执掌归义军政权的是其侄曹延恭，延恭于两年后去世，元忠子延禄又承曹氏兄终弟继的原则开始执政，并以弟延晟、延瑞分任瓜州刺史、衙内都虞侯。

曹氏的顺利传位延续到咸平五年（1002年）。是年曹宗寿逼叔父延禄、延瑞自杀，自领归义。八月，宋廷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任宗寿为节度使，曹氏归义军遂继续维持与北宋王朝的统属关系，同时也于宋景德三年（1006年）入贡辽国，开始了与辽国的交往。

1014 年左右曹宗寿卒，其子贤顺就任节度使，仍然臣服于宋，于 1019 年被宋廷封为敦煌郡王。1020 年、1023 年曹氏归义军政权又两次遣使入贡，自 1023 年以后便在中原的传世史籍中消失了。在服属宋朝的同时，曹贤顺也加强了同辽国的联系，多次遣使辽朝，甚至还亲自入辽朝拜，受到了辽的宠遇。

曹氏在中原史籍中消失以后，瓜沙敦煌地区的史事也随之湮没不彰。唯知 11 世纪曹贤顺执政时，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就已经崛起，成为威胁曹氏存亡的最大政敌。西夏逐步蚕食走廊，于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 年）占据甘州，两年后瓜州王以千骑降夏，瓜州政权受到很大损伤。至宋景祐三年（1036 年）前后西夏王李元昊更攻陷瓜、沙、肃 3 州，全部河西归夏，延续近 200 年（848～1036 年）的归义军历史终告结束。

7. 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艺术

今存留在莫高窟的归义军张氏时期的洞窟约 60 个，曹氏时期的洞窟约 55 个。

归义军时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 3 种。最典型的是中心佛坛式，有较宽较长的甬道，主室平面略呈方形，中央偏后设佛坛，佛坛四周有通道，佛坛前有登道，后有背屏，背屏直通窟顶，系模仿当时寺院殿堂的形式而建。窟顶则为覆斗顶，饰藻井。中心佛坛窟的规模一般都比较 大，张氏时期河西释门

都僧统洪誓所建的第 16 窟是最早的一例，曹氏时期的第 55、61、98、256 等窟也属此种形制。第二种是方形深龕式，与吐蕃时期的方龕窟相同，数量较多，但多为小型窟。第三种是中心龕柱式，形状与莫高窟早期中心塔柱窟相似，主室平面呈长方形，前部为覆斗顶，后部为平顶，洞窟中央设方柱，方柱正面开方形盝顶深龕，龕内三壁画屏风，下有马蹄形佛床，实际是把通常在洞窟正壁的深龕移到了中心方柱的正面，这种形制的洞窟数量不多。

除洞窟形制外，在归义军时期的石窟建筑艺术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实物遗存值得特别介绍，这就是窟檐建筑。窟檐本是一种小型的木构建筑，建在前室外面对洞窟既起保护作用，又起装饰作用，历代多有兴建。莫高窟今存最古的一座木构窟檐正兴建于张氏时期，为第 196 窟窟檐，已经过了 1000 多年的风雨剥蚀，至今仍存有 4 根檐柱及部分梁枋构件。现存曹氏时期的 4 座窟檐更是相当完整，为建于开宝三年（970 年）的第 427 窟窟檐，建于开宝九年的第 444 窟窟檐，建于宋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的第 431 窟窟檐，和与上述年代大体相当的第 437 窟窟檐。这 4 座窟檐的规模尺度各有差别，但结构、形式却基本相似，都是三开间，正中一间开门，左右两间开直楞窗，各檐柱均为八边形，直接立于地袱之上，袱下有悬挑出崖壁的栈道梁，梁间铺陈木板，成为洞窟之间的交通栈道，栈道外侧建

有栏杆。这些窟檐外观古朴，其斗拱与八边形檐柱的规制与同期中原古建筑的风格有一定差异，盖因敦煌地处边陲，保存着较古老的建筑风格和技术之故。窟檐内外原来都有彩画，现在外侧已风蚀殆尽，内侧的彩画还相当完好，从中不难想见当年雕梁画栋，檐宇相接的壮观景象。归义军时期的这 5 座窟檐保存相对完好，年代较为确切，是莫高窟石窟建筑艺术中的珍贵遗产。

归义军时期敦煌彩塑非常突出的一点是高僧像的出现。塑于咸通年间的高僧洪誓禅定像是其中的代表作。洪誓身着通肩田相袈裟，面如生人，头额饱满，目光幽远，嘴角内敛，神情含蓄而庄重，既表现出了他三学谨醇的修养，又显示了僧统、国师的威严。其塑造手法逼真传神，是莫高窟圆塑艺术中的杰作，也是中国高僧纪念像中的珍品。此像高 0.94 米，原置第 17 窟中后部，面南背北，像后北壁绘有菩提双树，树上挂经包、水瓶，树下侍立执杖近侍女和执扇比丘尼各一。

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仍以经变画为主。其中《劳度叉斗圣变》是此期规模最宏大，刻画得最成功的经变画之一。该经变以《贤愚经》卷十《须达起精舍品》为依据，图绘外道劳度叉与佛弟子舍利弗斗法的故事：劳度叉化作大树，枝繁叶茂，舍利弗化现旋风，吹树拔根；劳度叉化作七宝池，舍利弗化为六牙白象吸十池水；劳度叉化作大山，舍利弗化为金刚杵捣碎山岳；劳度叉化作毒龙，舍利弗化为金翅鸟啖

鞆

33

130

61

台山图》则比较特殊，绘于窟中西壁。这幅图是莫高窟现存最大的整幅壁画，达 45 平方米。图中层峦起伏，五台并峙，五台之间遍布大小佛寺佛塔六七十处，下部则画镇州（现河北正定）城、太原城和五台县城，并概略表现了其间千里江山的自然风光和 10 世纪时的社会民情，但见图中山水高远，林木扶疏，殿宇耸峙，道路纵横，活动于其间的人物动作各异，情态不一，真实生动，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可以说这幅（五台山图）既是佛教圣迹的写生图，也是一幅内容翔实的立体地图，和规模宏阔的历史画卷，是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壁画中的上品。

这一时期供养人像已升为壁画的主要内容之一，开始占据甬道和主室的重要壁面，一般甬道两侧绘男供养人像，多作高官显宦装束，绘于室内的女供养人像则华服严身，呈上层社会贵妇人装扮。这些供养人像一般都身躯高大，并已从一窟一人一家发展至广绘祖宗三代、姻亲眷属，从主要表示虔诚供养演变为序列家谱，显耀门庭，使佛窟又兼有了家庙与明堂的性质。

绘于第 156 窟南北两壁下部，并延展到东壁下部的张议潮夫妇出行图，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中最杰出的两幅作品。画中人物过百，形象生动，场面宏大，内容丰富。如（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即描绘了鼓吹、营伎、旌节、仪仗、过桥、奴婢、子弟兵、狩猎、驮载等多个场面，是一幅非常成功的反

映现实生活的历史人物画。这幅画构图严谨，设计巧妙，全图以张议潮为中心前后展开，画面中部形体高大的中心人物即是张议潮，他头戴幞头，身穿赭袍，乘骑白马，执持马鞭，面前有一座小桥，张议潮正欲扬鞭过此桥。这一特定场景巧妙地突出了张议潮的高贵身份，点明了全画的特定主题。

绘于第 100 窟的曹议金夫妇出行图，是规仿张议潮夫妇出行图的佳作，气势磅礴、色彩瑰丽，间接反映出了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

除炫耀家世外，曹氏还将供养人画像用作收揽人心，维持统治的辅助手段。如第 98 窟中的画像就是最为典型的例证，窟中甬道南壁画曹议金父子，北壁画姻亲张氏家族；主室东壁门南画于阗国王、王后及侍从，北侧画回鹘公主及曹氏眷属；南、西、北三壁屏风下则绘列曹氏节度使衙门的大小官吏，人数之众居莫高窟各窟之冠，范围之广几乎包括了归义军政权处理内政外交所关涉的各类人物。这一窟对结合文献研究五代宋初的敦煌历史和西北民族关系史很有助益，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总起来讲，归义军时期莫高窟艺术的突出特点是更加写实和世俗化，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从雕塑中高僧像的出现，经变画中《劳度叉斗圣变》的反复描绘，和供养人画像的空前发展中都可以看出来。以供养人画像的迅猛发展为例，张议潮推翻吐蕃，统领归义军后，敦煌地区世家豪族

的势力更加膨胀，张氏、索氏、李氏、宋氏、曹氏等大族互结姻亲，盘根错节，完全垄断了本地的政权与教权，以致非但他们自己出资修建的洞窟中绘有他们的画像，就是僧侣等其他人开凿的佛窟中也得常为他们图形。如第 85 窟中的张议潮像，第 196 窟中的索勋像等即属于这种情况，而这正推动了此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

从艺术角度讲，归义军时期格外重视绘塑技巧和艺术水准的提高。为了搜罗开窟建寺的专门人才，曹氏曾仿照中原作法在归义军政权中设立画院，集中了大量石匠、塑匠、画师、知书手等。由于这些匠师的统一规划和集体创作，曹氏前期的莫高窟艺术蓬勃发展，具有统一而又鲜明独特的风格，特别是其中的山水画更是一枝独秀，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莫高窟艺术中，山水原本是作为故事画的背景而出现的，处于陪衬性的次要地位，至曹氏时期《五台山图》的出现才取得了独立地位。《五台山图》将现实与想象相结合，用鸟瞰式透视法将重峦叠嶂、流水林木与舟车人物汇集于一壁，远观有雄浑的气势，近看有精到的刻画，充分展示了传统中国山水画的技法。

但是总的看来，归义军时期的莫高窟艺术已较隋与唐前期逊色。构图上因经变画内容的一味增多而显壅塞、庞杂，榜题中大量采用变文也使壁画的图解味更浓，限制了创造性的发挥，技法上程式化的倾向也更加明显，呆板雷同，缺乏明快活泼的个性特征。

六 西夏至民国时期的敦煌

这一时期历时 900 多年，却因不再受中原政权重视而为敦煌的衰落期。

沙州回鹘、西夏、蒙元对敦煌社会的发展没有太大建树，却尚未破坏这里固有的文化传统。明时敦煌沦为少数民族的游牧区，经济文化倒退千年。清朝大规模移民屯垦，以农耕为主的敦煌经济逐渐复苏，但在文化上却无法恢复敦煌昔日的繁荣。

自明朝中期至民国初期，敦煌石窟艺术屡遭人为破坏，敦煌文书流散异域，从 1909 年起方引起少数中国学者的关注，及至 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石窟才得到科学的保护与管理。

1. 党项陷城之后的敦煌与西夏的统治

西夏是兴起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政权，早在其立国前的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李元昊统率的党项骑兵即攻陷了瓜、沙、肃三州。后两年，即 1038 年西夏正式立国。

西夏攻陷瓜、沙两州后的三四十年间，一直忙于本土的政权建设、军事建设，和东向与宋、辽争战，难于西顾。因而在这段时期内沙州的地方势力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其中最为活跃的为沙

州回鹘。

早在 9 世纪中叶，随着漠北回鹘汗国的崩溃和部众的大举西迁，一部分回鹘人就已流散到敦煌地区，成为归义军治下的臣民，只是仍然保持着自己原有的部落组织。约一个世纪之后，在甘州回鹘的支持下，这支沙州回鹘势力有了很大发展。至 11 世纪西夏据有河西后，凉、甘、肃、瓜等州丢失故土的回鹘人大量涌入沙州，更加强了沙州回鹘的实力。他们一面想方设法多次朝贡宋廷，修好辽国；一面单独或联合于阗、西州回鹘等抗夏势力进击西夏，并于约 1042~1068 年间占据了敦煌地区。

西夏在瓜、沙二州的统治大约到 11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才逐渐加强并趋于巩固。

西夏建国后，曾在其领地内设置了十二监军司，其中西平监军司的驻所就设在瓜州，瓜、沙二州在军事上皆属西平监军司统辖。西夏的地方行政组织仍分州、县两级制，敦煌依旧称沙州，政治制度并没发生多大变化，只是已不再是西北的政治中心，河西的统治中心已东移瓜州。

西夏统治者比较重视农业生产和水利建设，从榆林窟壁画中的犁耕图、锻铁图、踏碓图、酿酒图等形象资料来看，西夏时敦煌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发展，特别是其农耕技术和所使用的农具都与北宋中原地区十分接近。西夏占据瓜沙后，对这一地区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十分仰慕，遂积极吸收这里汉族传统文化的养份，并接受吐蕃、

回鹘等兄弟民族文化的影响，礼遇优待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回鹘僧人，很快创立了别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但是，党项民族十分好战，终夏之世，对外战争几乎从未中断过，敦煌等地的兵役徭役非常繁重，西辽、蒙古骑兵等又不断侵扰敦煌，再加上 12 世纪以后旱灾、蝗灾相继，瓜沙经济迅速衰落，社会动荡，百姓流亡他乡，因而西夏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始终不甚安定。

2. 蒙元统治时期的敦煌

进入 13 世纪以后，蒙古即经常纵兵河西，围困沙州。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 年）三月，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终于攻破沙州城，从此开始了蒙元对敦煌长达 145 年的统治。

蒙元统治时期，沙州敦煌先是作为封地由成吉思汗的长孙拔都（即八都大王）掌管。那时蒙古已占有了广大西域地区，拔都遂据敦煌积极开辟玉门关通道，沿途设置驿站，终于使丝绸之路复通。迨至 1271 年元朝建立后，忽必烈很快将沙州纳入自己的直接统辖区。到至元十四年（1277 年）统一全国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忽必烈在全国推行行中书省制度，敦煌随之复立为沙州，由甘肃等处行中书省下设的肃州路管辖。3 年后，因沙州距离肃州太远，沙州境内贫民乞粮须于肃州请示，往返不便，又将沙州升级为路，在沙州城内置总管府，统

管瓜沙二州，这样二州的政治中心又西移敦煌。

元初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时期，直接统辖的西部边境已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和田，敦煌遂失去了往日卫护疆土、经营西域的战略要地的地位。这一时期东南地区的海上丝路日益兴盛，从中亚到蒙古的北方草原之路也在频繁使用，敦煌已不再拥有中西交通中转站的优势，因而敦煌昔日的光辉也就无从再现了，元朝仅将它作为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进行小规模经营，其着眼点仅限于屯田戍守。

早在元世祖统治初期，元廷即令沙州开垦出一些已经荒废的水田来招抚移民，1276年又贬谪一批罪犯赴瓜沙屯田，1280年更派汉军前来，为敦煌增加了大量劳动力。经过这样多年屯垦之后，13世纪末、14世纪初时敦煌的农业经济已有了很大发展，所产粮食除供给军需外还有剩余，可以救济饥民。在大力屯田的同时，元朝也比较注意加强敦煌地区的防卫力量，曾两次令士兵和百姓修缮城府，并于1301年和1303年向瓜沙增派了戍卒和蒙古兵丁万余人。通过此番经营，13世纪中后期，敦煌又呈现出了稳定繁荣的景象，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即曾称赞沙州社会安定。

但也正是在13世纪末的1291年，元朝强行将瓜州人民迁往肃州，第二年又将绝大部分沙州居民东迁甘、肃两州交界处定居，以致元成宗（1294～1307年在位）前期的瓜沙二州几乎完全变成了军

队的屯田区，到 1303 年正式派万余蒙古军队屯戍瓜沙恢复生产后，形势才略有好转，莫高窟和榆林窟的较大规模的开窟造像活动也才逐渐展开。

3. 沙州回鹘、西夏及元代的敦煌石窟艺术

沙州回鹘、西夏和元朝统治者都十分佞佛，在他们统治下的敦煌等地的开窟建寺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存留至今的实物遗迹也不少，仅今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和东千佛洞中存有这一时期画塑资料的洞窟即超过百数。

但是，这一时期的大量洞窟，特别是西夏窟，多是由前代窟龕改建或补修而成，在石窟建筑方面缺乏独创的特色。而窟内彩塑损毁得也十分严重，少数幸存者又多经过清代重妆改塑，面目全非。故而此期的敦煌石窟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壁画方面。

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大体可分为 4 类：尊像画、经变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

尊像画是此期最主要的题材，取得的成就也最大。尊像画可分为显教尊像和密教尊像（又有汉密与藏密之别）两种，内容则多是图绘释迦多宝并坐像、文殊像、普贤像、观音像、十六罗汉像等，尤以观音像的描绘最为成功。

显教观音像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水月观音。榆林窟第 2 窟的水月观音头戴宝冠，身穿长裙，倚坐珞珈山，背后奇石挺立，修竹滴翠，座下绿波荡漾，

红莲盛开，空中彩云朵朵，新月弯弯，朦胧的月色与观音身后轻纱般的光环交相辉映，澄澈幽静，神秘祥和。

汉密的观音像有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等多种，这一时期的莫高窟和榆林窟中各出现了一幅美妙绝伦的杰作。莫高窟第 3 窟北壁的千手千眼观音绘于元代至正年间（1341~1370 年），图中观音千臂千手摆列如轮，每手中有一慈眼，以示应众生不同需请，法力无边，智慧无穷。观音两侧散列功德天、吉祥天、婆薮仙、火头金刚等随从眷属，身形矮小，神情虔敬，很好地突出了观音的高大神圣。这幅画设色清淡，简朴典雅，分外玄妙怡人。其绘画技法也极为精熟，灵活运用了铁线描、折芦描、游丝描、丁头鼠尾描等线描笔法，准确描绘出了人物衣饰不同部位的特色纹理，使画面情态逼真悦目，流畅细腻，意韵无穷，已达线描造形的最高境界。

榆林窟第 3 窟东壁的五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绘于西夏占领瓜州时期，规模宏伟，内容繁复，历史价值极高。图中观音端立于水中生出的莲花上，顶上悬宝盖，空中雨宝花，足下踏莲池。观音现五十一面，分作十层呈宝塔形重叠，每头现三目，最上一头则呈佛颜。这幅尊像画最大的特色在于对观音千手，特别是其众多持物手的描绘，画中除绘有分别执持盾牌、绢索、宝螺、宝铎等各种法器法物的常见持物手外，还绘有超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大悲心陀罗尼经》等佛经规定的近 50 种持物手，并呈左右对称式分布，与同类其他尊像大不相同。其中最有趣的是一些反映社会生活场景的持物手，如：

牛耕手，画二牛抬杆，农夫扬鞭驱牛耕地；锻铁手，画立式鼓风炉，一人鼓风，二人持锤锻铁；酿酒手，画锅台，上置方甑蒸酒，一妇人烧火，另一妇人站甑前观察，手中持杯，似在品酒，旁有盛酒木桶；商旅手，画二人挑担，担中盛货物，似正欲赴市出售；百戏手，画一台，上分三枝，每枝又有一台，三人在台上挥袖起舞；踏碓手，画二人舂米，一人扶栏踏碓，旁有簸箕等物。

这些画面反映了西夏时工农商艺各行业的活动场面，真实生动，不仅增加了尊像画的情趣，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形象资料。这幅尊像图敷色简单，以冷色为基调，仅用白、青、绿、黑等很少几种颜色，持物手中的一些小幅画甚至不上色，多用白描，以线造形，简朴洗练，古雅疏朗。

除显教尊像和汉密尊像外，随着西夏和元时西藏喇嘛教，特别是萨迦派密宗的流行全国，这一时期的敦煌壁画中还出现了大量藏密图像。习称“秘密寺”的莫高窟第 465 窟绘有以大日如来为中心的五方佛、各种明王愤怒像，以及欢喜天、欢喜金刚像等，属萨迦派密教艺术。而榆林窟第 4 窟中的军荼利金刚等则多属传自西藏的迦玛伽派的密教艺术。这些金刚明王像多作威猛忿怒状，刚烈狰狞，

令人畏怖，再加上浓重美艳的色彩，艺术效果非常强烈，与以往含蓄儒雅的敦煌石窟艺术风格迥异。

经变画在这一时期的石窟壁画中已失去了以往的优势。随着密教的广泛传播，大乘经经变画从总体上讲已趋衰落，莫高窟仅保存了《西方阿弥陀净土变》、《药师变》等二、三种，画面呆板单调，缺乏生气。榆林窟中保留的经变品种略多，主要有《观无量寿佛经变》、《天请问经变》、《文殊变》、《普贤变》、《弥勒变》、《维摩变》、《降魔变》、《法华变》等 10 来种，但与以前经变画的创作风格也已有较大差别，人物减少，构图简单，画家的着眼点已变为描绘空濛幽远的意境，原来经变画中的那些烘托气氛的人物多被奇丽的山水和严整的宫殿楼阁所取代。

这一时期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在某些经变画中出现了小幅《唐僧取经图》，现在已经查明的至少有 6 幅，分别绘于榆林第 2、3、29 窟和东千佛洞第 2 窟。其中榆林窟第 3 窟《普贤变》中的小幅《唐僧取经图》构思奇巧，精妙风趣。画家将玄奘师徒安置在普贤右侧的礁石上，以信徒眷属的身份现身于经变。画中唐僧穿着袈裟麻鞋，垂眼俯首，躬身合掌，遥礼普贤，恭顺平和的神态和头后熠熠的项光都表明他已是修成正果的得道高僧。唐僧身后的悟空形象更具情趣，他曲身揖手，缩颈仰头，额短嘴长，身姿动态和头上茸毛无不现出猴相，已完全具备了猴行者的外貌特征。悟空身旁的白马在

画面上很突出，它昂首瞠目，奋蹄挺身，鞍鞯之上端置莲座，座上佛经闪闪发光，点明唐僧师徒已取得真经，荣归东土。这幅《取经图》画面很小，在整幅《普贤变》中仅居次要地位，但画师们对它的刻画却一丝不苟，精细入微，使我国现存最早的这幅《唐僧取经图》形神毕现，妙趣横生，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

晚期的敦煌石窟中供养人像不多，但却具有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这时的供养人像多穿著回鹘、党项、蒙古等民族服装，身旁又多书有榜题，对服饰史、民俗史和西北地方史研究皆有裨益，特别是大量西夏文题记内容丰富、翔实准确，是史料份外缺乏的西夏史研究的重要资料。

装饰图案是晚期敦煌壁画艺术中的重要内容，富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和民族特色。沙州回鹘时期盛行蟠龙纹样，并普遍使用唐草式卷云纹为花边装饰。窟顶则流行朱地牡丹团花图案，佛光中又多采用编织纹样，款式新颖别致，格调简洁清新，与高昌回鹘石窟中的装饰风格关系密切。

西夏及元时装饰图案更加丰富多彩，尤以龙凤图案和曼荼罗最为成功。龙凤是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传统纹饰，在西夏及元时的藻井、衣饰和旌旗上经常可以看到二龙戏珠、五龙飞腾、单凤展翅、双凤盘旋等游龙翔凤图案，莫高窟第 130 窟顶部就是用龙凤绘饰而成的典型的西夏金龙华盖式藻井。曼荼罗的基本构图为圆坛与方坛层层套叠，逐步深

入，内绘人物等。曼荼罗的大量出现与此时密教盛行，强调修习有关。敦煌石窟中既将曼荼罗用为洞窟的装饰，又常绘之于四壁，如榆林第3窟窟顶中心就是一幅密教五方佛曼荼罗，十分精丽严整。

纵观沙州回鹘、西夏和元代的敦煌石窟艺术，不难发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榆林窟异军突起。西夏攻陷敦煌后，随着曹氏归义军的消亡，莫高窟日趋衰落，此时榆林窟却因所在地瓜州政治地位的提高得到了长足发展，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弥补了莫高窟西夏艺术的不足。其二，密教艺术勃兴。西夏及元代的佛教都注重显密双修、汉藏结合，特别是元朝更以密教为尊，曾任喇嘛教高僧为国师，从而使密教及密教艺术盛行全国，在敦煌石窟中也结出了丰硕果实，打破了敦煌艺术末期的沉寂局面。其三，民族风格浓郁。这时正是众多少数民族分掌瓜沙时期，各族艺术家们在继承汉唐传统的同时又博采各族艺术之长，并加以融汇贯通，灵活施用，使此期的敦煌艺术既具有中原风格，又展露出了回鹘、党项、西藏等民族艺术特色。其四，绘画技法多样圆熟。这一时期的线描与敷色方法都变化多端，画家们常随意选用多种技法绘制同一作品。莫高窟第3窟中元代甘州画师史小玉创作的壁画就集中了数种线描技法，使画幅精美绝伦，给观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也为晚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带来了最后一抹耀眼光辉。

元代以后敦煌地区的石窟营造活动即告中辍。清代和民国时期虽曾进行过增补重修，但多内容混杂、技艺低劣，非但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反而破坏了佛窟原有的艺术效果。

至元代为止，作为敦煌石窟群主体的莫高窟的艺术创作活动已延续了 1000 年，其间开窟造像不已，精品杰作无数。经过 1600 多年的风雨剥蚀与人为破坏，至今尚存留有重要洞窟 492 个（曾有学者指正当为 491 个，因敦煌文物研究所 1964 年编定的 492 个窟号中的第 485、486 两号实指同一窟，窟号编重，此说是。但 1979 年该所在莫高窟南区南段加固维修活动中，曾进行窟前发掘，在发现了第 130 窟窟前遗址的同时还发现了第 493 窟，故我们这里持 492 窟说），彩塑 2000 多身，壁画 45000 平方米，不仅是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也是横贯欧亚的古丝绸之路之路上规模最宏伟，历史最悠久，内容最丰富，艺术价值最高的文化宝库，1962 年被国务院确定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 年 12 月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一批世界文化遗产清单（同批列入该清单的中国文化遗存共有 6 项：泰山、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秦兵马俑坑、周口店北京猿人洞）。

4. 明朝时的敦煌居民

明朝建国以后，于洪武五年（1372 年）派征西将军宋国公冯胜西攻兰州、永昌、瓜州及沙州等

地，很快打垮了河西元军，敦煌也转为明有。但明军东还后，元朝的残余势力很快重占敦煌一带。为防止他们继续东进，冯胜派人在肃州以西 70 里处的文殊山与黑山之间的峡谷地带修筑了嘉峪关，屯兵固守。至 1391 年，占据敦煌的蒙古王子阿鲁哥失里开始向明朝进贡，1404 年困即来、买住再次率众归明，明成祖遂下令在敦煌设置沙州卫，任命这两位蒙古族酋长为指挥使，沙洲敦煌成了明朝的羁縻边卫。

买住死后，困即来独掌沙州，当时占据罕东卫（位于瓜、沙之间）的其他少数民族及瓦剌曾多次寇逼敦煌，沙州常年不得安宁。1435 年困即来只得率部众几百人东逃至嘉峪关下，被明朝安置于关外苦峪城（今安西县东南）。1444 年困即来卒，二子争斗不休，明甘肃镇将任礼等乘机于 1446 年进兵沙州，将当地 200 多户居民全部迁入嘉峪关，安置在甘州境内，这样沙州卫仅存在了 40 多年便被废弃了。

当困即来等所率领的蒙古部众逐步离开敦煌的时候，原来在罕东卫游牧的蒙古部众开始进占此地。只克任头领时，这支蒙古后裔人数已多。但此时吐鲁番也已强大起来，侵占了哈密，其辖区与只克接境。为了与吐鲁番抗衡，只克向明廷请求自立一卫。成化十九年（1483 年）明王朝在沙州卫故城设立了罕东左卫，任命只克为都指挥使统领敦煌地区。这样勉强维持到 1516 年，在瓦剌人和吐鲁

番人的夹攻下，罕东左卫的居民已无法安居，只克子乞台只得率部分部众迁入嘉峪关，定居于肃州，其余留居敦煌的部众则服属于吐鲁番，至 1528 年也因无法忍受吐鲁番的重税苛政而逃奔肃州，沙州敦煌遂完全脱离了明王朝的羁縻，为吐鲁番所尽有。

吐鲁番统治敦煌的 190 多年可以说是敦煌历史上最暗淡的时期。这段时期内，敦煌地区既无行政建置，也无人经营管理，水利失修，良田抛荒，经济衰败。吐鲁番人的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四出侵占掠夺，曾多次骚扰河西州郡，迫使明王朝继 1524 年关闭嘉峪关后，又于 1529 年放弃了新兴的丝路城市——哈密，关外之地与明朝彻底断绝了联系。

总之，明朝有国的 14~17 世纪是敦煌历史上的全面衰落时期。在这两百多年间，一向祖居敦煌的汉唐子孙全部内徙，占据此地的始终是以游牧为生的各少数民族，西汉以来既已形成的农耕为主，畜牧为辅的生产方式被彻底摧垮，绵延千年的汉唐文化传统因失去传承而消声匿迹，享誉全国的文化古都因不再拥有汉族人民的维护而破败不堪，佛门圣地莫高窟也因信奉伊斯兰教的吐鲁番人的到来而遭受人为破坏，损毁严重。

5. 清朝治下的敦煌

清朝建立后，尚控制着敦煌地区的吐鲁番国曾

于 1646 年派使者向清廷进贡，但当时清廷正忙于稳定内部，无暇西顾。1715 年唐熙开始发兵大举西征，着力经营西北，于 1718 年在今安西、玉门一带设立了赤斤、靖逆两卫，敦煌也随之重建。雍正元年（1723 年）清朝在敦煌设立沙州所，两年后又升沙州所为卫，隶属于安西同知，并在党河东岸沙州故城东另筑新城，以代替受党河水侵蚀，东墙已经坍塌的原沙州卫城。这座新城就是后来沿用至民国时期的敦煌县城。

在升沙州所为沙州卫的同时，清朝还采纳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建议，从甘、宁、青等西北 56 州县陆续迁徙 2400 多户移民至敦煌屯田，敦煌的社会经济开始复苏，逐渐恢复了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人口也迅速增多，至乾隆年间已增至 8 万人，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清王朝遂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将沙州卫改为敦煌县，隶属于安肃道，两年后又将敦煌定为府治。

在移民到来，生产恢复的同时，敦煌也开始了汉文化的重建活动。但这次文化重建活动的主人都是外来移民，他们将各自从西北 56 州县带来的地方文化在敦煌进行了杂糅组合，形成了一种新的敦煌文化，这种新文化并不是古代敦煌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不足以追风前代，也落后于同期内地。在这股文化重建浪潮中，敦煌佛教开始复兴，信奉佛教的移民于嘉庆和道光年间（1796~1850 年）对莫高窟进行了大规模整修，但因这时的敦煌社会与文

化已少有光彩，故这次的“修功德”实际是对前代莫高窟艺术的破坏。

同治年间（1862~1874 年）敦煌地区再起波澜，陕、甘、新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曾使敦煌一度变成了回民与清军交战的战场。战乱中敦煌人口减少，经济衰退，一派混乱。白彦虎领导的回民起义军在被清军追至鸣沙山时，还曾尽毁莫高窟走廊，使上下诸窟无法联通。不过，通道的断毁也使部分上层佛窟因祸得福，躲过了后来清末民初时的另一场劫难。

6. 藏经洞的发现

清朝时，敦煌经济文化落后，又远在甘肃通新疆的交通要道之南，早已失去了丝路重镇和边防要塞的地位，根本不受清廷重视。但到清朝末年时敦煌却再度引起了时人的极大关注，这与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大有关系。

清朝末年，一个名叫王圆箎的湖北麻城人从肃州巡防军退役后出家当了道士。他的文化水平不高，道教知识也很有限，于化缘途中来到佛门圣地莫高窟后，认此地为栖鹤伏龙之所，在窟区北段清理打扫出几洞佛窟，办起了“三清道观”。那时敦煌民间佛道不分，常常混同信奉，王圆箎又能说会道，远比当地不精汉语的红教喇嘛更能接近俗人。因而他到敦煌不久便聚集起了一大批信徒，香火很盛。王道士便开始用化缘得来的钱在莫高窟“广修

功德”：雇人抄写道经，将某些佛像改朔为道教灵官，打通洞窟之间的隔墙，修建通道，清理底层洞窟内的积沙，等等。这些“功德”正引发了敦煌，乃至中国与世界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孟夏的一天，一个在今编第16窟干活的雇工杨某，工间休息时用芨芨草引火点燃了一支旱烟，然后随手将燃剩的草茎插进了16窟甬道北壁的裂缝中，却发现这根长长的芨芨草怎么也插不到头，再用手敲敲墙壁，里面似乎是空的，便急忙将这个意外发现报告了王道士。当晚夜深人静时，王道士遂带着杨某打通墙壁，找到并开启了密室的封口，这个密室就是后来震惊中外的今编第17窟藏经洞。

第17窟原本是第16窟的一个耳室，最初约为第16窟窟主，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佛教教团都教授，和张氏归义军时期的都僧统洪晔坐禅修行的地方。洪晔去世后便被改为他的影堂（纪念堂），并做了一番布置：在洞窟后部居中设立床座，座上端置洪晔塑像，像后北壁绘画枝叶相交的菩提双树及侍立树侧的比丘尼、近侍女，窟室西壁镶嵌唐大中五年（851年）洪晔告身碑等。

大约在11世纪时，出于某种政治或宗教原因，莫高窟的僧人将洪晔塑像移到了其他窟内，将第17窟改造成成了一个图书文物贮藏室，在窟内堆积码放了数万件佛经、道经、社会文书、绢画、纸画、香炉、法铎等经籍文物，然后封严洞口，在封

闭处抹上了一层泥，并请人将第 16 窟全窟，特别是甬道北壁重绘了一层壁画，从而把封堵 17 窟的痕迹巧妙地遮掩了起来。

至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时，窟中文物安然保存了近 900 年，已成无价珍宝。但愚昧无知的王道士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却浑然不知它的真正价值，终于给宝藏带来了厄运。

7. 藏经洞文物的流散

面对文化宝藏，一心想化缘修“功德”的王道士立即想到了这些古董可以换钱。他很快从中选出了一些精美的绢画和完整的写经奉献给了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和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等衙门要人。但这些饱读诗书的“文人雅士”却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些经籍文书的学术价值，而是和王道士一样将它们视为古董，一再转赠他人。从而使敦煌文物作为一种书法艺术品在中国西北地区流传开来，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自然也不胫而走。

光绪二十九年（1903 年）十一月，县令汪宗瀚将他得到的几件藏经洞出土的唐碑拓片和绢画写经等送给了清末著名金石学家，当时正任甘肃学台的叶昌炽。叶昌炽判明是唐物，建议甘肃省藩台衙门将藏经洞所出古物运往省城兰州保存。昏愤的地方官以筹集不到七辆大车和五六千两运费为由置之不理，仅于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三月由汪宗瀚派人经卷和画像做了一次简单调查，便责令王道

士原地照旧封存。同时调查的清单也放在了王道士手中，为他日后监守自盗提供了方便条件。著名学者叶昌炽也因学台巡行的范围在肃州以东，没有亲自到莫高窟查看宝藏，未能认识到藏经洞文物的全部价值，而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努力，终与这些文物失之交臂，给他自己和后人都留下了莫大遗憾。

另一个最先得到藏经洞文物的满清官吏廷栋将他手中的几件经卷送给了当时正任职于嘉峪关税务司的一个比利时人。此人后来于归国途中路过新疆，又将经卷转赠给满人长庚将军和道台潘某。莫高窟发现文物的消息随之流传到了新疆地区，再加上王道士偷出来让人估价求售的经籍在社会上的流散，很快就引起了当时正在新疆中亚考察盗宝的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的注意。他们立即争先恐后地赶往敦煌骗劫宝物，致使这一宝藏的 3/4 都流出了国门。

第一个来敦煌大量盗劫藏经洞文物的外国探险者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M. A. Stein）。他于 1907 年 3 月到达敦煌，从一个乌鲁木齐商人口中得到了藏经洞发现文物的消息，迅即赶往莫高窟，却逢王道士外出化缘。于是斯坦因一边等待一边盗掘了敦煌西北的长城烽燧遗址，获得了大批汉简，并发现了他认为自认为是玉门关的小方盘城。5 月 21 日斯坦因再次来到莫高窟，在与王道士周旋过程中，受敦煌壁画《唐僧取经图》的启发，遂哄骗王道士，以唐僧玄奘的崇拜追随者自饰，用少量银钱

和一个严守秘密的承诺换得了 24 箱写本和 5 箱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以后这些文物按照资助他探险的英国博物馆和印度政府之间的协议，分别入藏于英国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设于伦敦），和印度新德里中亚古物博物馆。

接踵而至的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 Pelliot）。他在新疆得知藏经洞出土文物的消息，并看到了部分写本，当即改变行动计划，于 1908 年 2 月 25 日赶至莫高窟。在与王道士交涉过程中，伯希和对所有洞窟进行编号、测量、拍照和抄录题记，记录下了 20 世纪初期的莫高窟状况。一个星期之后，伯希和的交涉获得了成功，于 3 月 3 日进入藏经洞，用 3 周时间，以每天 1000 卷的速度，将尚存洞中的全部文书翻检一遍，选出了数千菁华。伯希和精通汉语和多种中亚语言，具有丰富的中国古文化知识，又是惟一获准在藏经洞中逐一挑选文书的西方盗宝者，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选出的精品几乎囊括了尚余洞中的全部珍本、孤本，学术价值远远高于斯坦因劫品。以后这些经籍入藏于法国国立图书馆，为敦煌文书中质量最高的大宗馆藏。

1909 年 5 月，伯希和在他劫得的敦煌文物已运抵巴黎之后又来到北京，将少量藏经洞文物出示中国学者。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董康等著名学者至此方知敦煌出土了大量文物，并有相当一部分已落入外人之手，皆大为震惊！他们立即上书清朝学部，督促清廷电令敦煌地方清点藏经洞文献，

不得卖与外人，并责令新疆巡抚何彦升将剩余古物押运京师。按理说这次本该把劫余的藏经洞文物全部收归国有，可狡猾的王道士似有先见之明，在官府清点之前私自藏掖了大量经卷。而负责清理押运的清朝官吏又未尽职守，未将洞中遗物收捡干净，并在押送途中遗失了不少。抵京后更将经卷先运至自家宅院，伙同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偷选私窃，并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以充 8000 之数，然后才交给学部，入藏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王道士私藏的经卷后来分作几部分流散四方。一部分于 1912 年和 1914 年分两批卖给了来敦煌盗宝的日本大谷探险队队员桔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合计数百卷。这些经卷先集中收藏于大谷光瑞的别墅二乐庄，以后辗转流散到旅顺、汉城、京都等地，今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旅顺博物馆、韩国汉城国立中央图书馆、日本龙谷大学图书馆、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处，也有一些下落不明。

王道士私藏的另一部分经卷约 600 卷，于 1914 年 3 月送给了第二次来敦煌的斯坦因，后也入藏于英国博物馆。斯坦因成了劫走藏经洞文物最多的人。

还有一部分约 80 余件文书和 32 张残片，1944 年 8 月 30 日被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于莫高窟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今藏敦煌研究院（其前身为敦煌艺术研究所），这也是敦煌研究院拥

有敦煌文书之始。

藏经洞中剩余的碎片被 1914~1915 年间来敦煌的俄国佛教艺术史专家鄂登堡劫得，今收藏于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有 1 万多号。除文书外，鄂登堡此行还劫走了三四百件绢画、纸画、彩塑等艺术品，今藏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即冬宫）博物馆。另外，鄂登堡还在莫高窟绘制了大量平面图，拍摄了两三千张照片，并临摹了若干壁画。可见他们来得虽晚，收获却并不少。

何、李二家偷盗的文书，后来大部分转卖到了日本，藏于京都藤井氏有邻馆。也有一部分辗转流传，今分藏于台北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

藏经洞文物本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但一经发现便惨遭劫难，今分藏于英、法、中、俄、日、韩、印等十来个国家的数十个机构及个人手中，有些甚至不知去向，这实在是敦煌史和中华文明史上极为不幸的一页。诚如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所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8. 民国时期的敦煌

满清王朝垮台时，敦煌县仍属安西直隶州管辖。至 1913 年国民党政府将安西直隶州改为安西县，敦煌便改由甘肃省直接统领。民国初期，国民党政府忙于“安内”，无暇顾及边远地区，因而这一时期的敦煌饱经患难，在藏经洞文物继续流散的

同时，莫高窟千佛洞也惨遭浩劫。

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一伙在国内战争中败北的沙俄白军偷越国境，于 1920 年 11 月逃到我国甘肃。面对这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国民党当局竟以莫高窟为收容所，让这数百名白俄败军在佛洞中生活了半年多。白俄士兵在窟中生火做饭，熏黑了许多壁画，他们又在塑像和壁面上恣意涂刻，损毁了大量艺术品。时至今日，清除白俄残迹仍是敦煌研究院石窟保护工作中的一项具体内容。

与毫无佛教与文化修养的白俄不同，1923 年底到敦煌的美国文化强盗兰登·华尔纳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史专家和考古学家，但他的行径却同样卑劣。华尔纳一到达敦煌，就立即被精美的莫高窟艺术所震撼，遂用几十两银子贿赂王道士，以浸透化学药剂的胶布剥取了 20 多方壁画，并攫得了两尊彩塑，其中一尊就是盛唐第 328 窟中的半跪式供养菩萨像，为莫高窟彩塑中的上品，今藏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华尔纳此行给莫高窟带来的损失十分惨重，除劫走的艺术品外，华尔纳在剥取壁画过程中还用钢片铲刀破坏了好几幅壁画，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恶果。因而，当他于 1925 年再次来敦煌，想大规模剥取壁画时，立即遭到了中国学者和当地人民的强烈谴责，终究没能得逞。

随着敦煌文书的面世与各国文化强盗的嚣张劫掠，三四十年代时敦煌已逐渐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在许多仁人志士的呼吁下，国民党政府不得不

对已被西方窃贼破坏得满目疮痍的莫高窟采取最简单的保护措施：责令敦煌县派保安班守护莫高窟。这样，1940年一个由10多人组成的保安队住进了莫高窟，从而结束了千佛洞主要由僧侣守护的历史。

与此同时，莫高窟也迎来了一批批学者、艺术家，如40年代初著名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张大千等都曾到莫高窟和榆林窟临摹壁画，并著文介绍敦煌艺术，其中张大千一行影响较大。他们曾清理了300多个洞窟，按从南到北的顺序编了号，并用大量时间对窟中许多有价值的壁画进行了临摹，以后这些临品曾在成都、重庆、上海展出，并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等书。

张大千逗留莫高窟期间，国民党元老、著名学者于右任也曾到过敦煌，同来的还有后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处成员高一涵及学者卫聚贤等人。此行使于右任对敦煌艺术的价值和面临的危机有了深刻认识，返回重庆后他立即在政界、学术界奔走呼吁，希望当局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他撰写的《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一文送交国民党政府并公开发表后，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2年，著名考古学者向达先生远赴河西入敦煌，对敦煌境内的石窟群、古长城，及玉门关、阳关等关隘遗址进行科学考察。当地丰富的古迹和荒芜破败的景象深深触动了这位爱国学者，向先生遂于莫高窟撰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

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回内地，于这年年底以方回为笔名发表于重庆《大公报》上，文中呼吁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专门学术机构进行科学保护和研究。

1943 年，中央研究院、教育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联合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其中历史考古组的主要成员为向达、夏鼐、阎文儒等知名学者，他们对敦煌境内的一些古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和考察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这些学者亲临敦煌，一边研究一边呼吁，以他们的研究成就和满腔热忱说服世人，共同促成了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

9. 敦煌艺术研究所

在政界、学术界于右任、向达、贺昌群等学者的积极努力下，国民党政府终于决定成立研究所，并于 1942 年秋开始了筹划事宜，延请常书鸿先生具体负责。1943 年 3 月 24 日，常书鸿率领他在兰州聘请到的一行人最终到达敦煌，教育部也于此时正式宣布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由甘宁青监察使高一涵任主任，常书鸿为副主任，并将莫高窟收归国有，以便“寓保护于研究”。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1944 年 2 月 1 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专门研究敦煌的学术机构，其所址就设在莫高窟的中

寺——皇庆寺。首任所长常书鸿举家迁居敦煌，并从重庆等地征聘来了 20 余位画家、学者，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了大量临摹、测绘、摄影、内容调查、题记抄录和修缮加固等研究与保护工作，并于 1944 年 8 月在中寺后园土地庙残塑中发现清理出了几十件王道士私藏的敦煌文书及 30 多张文书残片。

一年多以后，1945 年 8 月抗日战争胜利，在庆祝和复员声中，教育部却下令撤消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里的专业人员纷纷离去。至 1946 年 5 月，经常书鸿、向达、傅斯年等专家学者的再次奔走呼吁，研究所才得以恢复，并改隶于中央研究院，常书鸿重任所长，又从重庆、成都、兰州等地招聘来一批画家重返敦煌。当时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下设两个组：其一为考古组，实际上主要进行壁画临摹、洞窟调查、题记抄录等工作；其二为总务组，具体负责行政管理和保护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先后在研究所工作过的专业人员和事务人员达 30 人之多，他们是敦煌石窟研究和保护事业的开创者，堪为后人敬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仍在研究所坚持工作的尚有 14 人，其中专业人员 7 人，但此时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艰苦。

真正高度重视敦煌这份文化瑰宝的是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 9 月西北野战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发出的进军令中，有一条“解放敦煌，保护千佛洞”明文，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祖国文化遗产

的尊重。1949年9月28日敦煌解放，29日清晨红旗飘扬在莫高窟上方，敦煌人民与敦煌文化从此获得了新生。

七、敦煌学的诞生与蓬勃发展

敦煌文书再现后，世界各国，特别是我国学者立即开始研究。早在 1909 年，我国著名学者罗振玉就撰成了世界上首篇有关敦煌学的文章——《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1930 年陈寅恪先生又于《敦煌劫余录序》中首次提出了“敦煌学”一词。至 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方面：敦煌文书和敦煌艺术研究开始携同并进，步步深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近 10 多年来，敦煌已成了人们关心的热点，敦煌学也蔚然而成一门国际显学。1983 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后，我国的敦煌学研究突飞猛进，逐渐又走到了世界前列，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同样成就斐然。

1. 敦煌文书的宝贵价值

敦煌文书的再现是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与安阳殷墟甲骨、居延汉晋简策、明清大库档案相较，敦煌文书具有形式多样、数量庞大、跨越时间长、使用语言多、内容丰富、史料翔实等几大特点，具有极高的文物珍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从形式上看，敦煌文书中既有大量手抄本，也有少量刻本。手抄本中又有多种装帧形式，如卷子装、册页装、梵夹装、经折装、蝴蝶装等，对中国书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刻本虽不足百件，却为有关印刷术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特别是现藏英国伦敦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刻《金刚经》，首尾完整，有纪年题记，卷首的《佛说法图》线条细腻，形象生动，刀法纯熟，充分展示了我国雕版印刷的精湛技艺，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确切纪年的木刻本书籍。

关于敦煌文书的数量，由于目前世界上各收藏机构和收藏者的公布与研究情况参差不齐，学者们虽作过多种统计，仍无法确知准确数目，仅可根据已公布的大宗馆藏和有关收藏情况的报道，推测估算为5万件左右。

从抄写或印制的时间看，敦煌文书的写刻年代，上至六朝，下迄宋初，历时达700年之久。目前已知标有纪年的最早的敦煌写经，为日本中村不折氏收藏的《譬喻经》，其卷末题记标示该经抄于甘露元年三月十七日，甘露乃前秦苻坚年号，甘露元年正当4世纪中叶的359年。现已确知年代最晚的敦煌文书抄于1002年，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曹宗寿造帙疏》。

敦煌文书的抄写文字多种多样，其中数量最多的为汉文卷子，其次为藏文。同时，用梵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佉卢文、突厥文等

古民族文字抄写的卷子也不少。在第 17 窟以外的其他洞窟中还曾发现过西夏文、蒙文写卷。因而可以说敦煌文书是一座丰富的古代民族文字图书宝库。

从内容上看，敦煌文书的价值更是无法估量。这些经籍约略可分为宗教文书和社会文书（或称世俗文书）两大类。宗教文书中包括有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类经籍。其中佛教文书数量最巨，不仅居各宗教经籍之冠，更占敦煌文书整体的 90% 左右，对大藏经的校勘，特别是佛教典籍的辑佚工作，和佛教史与佛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几种宗教文书的再现对学术界的影响也很大，（老子想尔注》、《老子化胡经》等都是久佚的重要道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等，更为空白点很多的这两种宗教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社会文书的数量虽远不及宗教文书，但其研究价值却更高。敦煌出土的社会文书的内容涵盖至广，关涉到了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学、艺术、科技等众多领域，有益于从各个方面反映我国中古时期的社会状况和文化风貌，可以弥补现存史料不足给研究者带来的缺憾，据此开展的研究工作已纠正了以往史书中一些不确切的记述，解决了许多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并改写了中华文明史的某些篇章。可以说，不深入研究敦煌文书，就无法全面准确深刻地了解中华文明史。

仅以敦煌历史研究为例，以往史书中关于敦煌的记载非常简略。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尽占河西，切断了河西敦煌与中原长安的联系，致使中原史官对河西史事鲜有知闻，史书中的片言只语也多据传闻转录，不够准确详尽，因而陷蕃以后的敦煌史事更加晦暗难明。但敦煌文书再现后，研究者们却惊喜地发现藏经洞中保存了大量中唐至北宋初期的社会文书，为这一时段的敦煌地区史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可信的资料。

如关于敦煌沦陷的时间，（元和郡县志）卷 40 载为建中二年（781 年），敦煌出土的《寿昌县地境》、《沙州都督府图经》（S.2593、P.2005、P.2695）等又印证了此说。而（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P.3774）、《丑年八月女妇令狐大娘牒》（S.5812）等，却提供了或为贞元初年的材料，促使学者们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探讨。关于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传世史籍均记为大中五年（851 年），学界也一直沿用此说。但敦煌文书《沙州图经》、（辛未年七月西汉金山国文书）（P.3633）、《张氏修功德记》（S.3329）等皆称为大中二年（848 年），这些当地人书当时事的记述自然要比传闻转载准确得多，足以纠正中原史书的讹误。如再仔细研读上述文书，不难发现大中五年乃是张议潮派出的报捷使者越千山万水，历敌军阻遏后到达长安的时间，传世史书中记载的正是奏章到朝的日期。

除确定年代外，在补书史事方面敦煌文书的价值更高。西汉金山国是曾经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王国，但传世史书中关于它的记述仅有寥寥 20 个字，根本无法反映该国史实。敦煌所出《张永进上金山天子白雀歌》（P.2864 背）、《龙泉神剑歌》、《辛未年七月沙州百姓万人上回鹘天可汗书》（P.3633）、《曹议金上回鹘众宰相状》（P.2992 背）等却具体记述了这段历史。

再如，吐蕃占有敦煌 60 多年，归义军统领沙州 180 余载，相对于中原王朝来说，这期间的河西敦煌均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那么其社会经济状况究竟如何？各传世史书皆未能详述，留下了 200 多年的空白。今日幸赖敦煌文书才得以勾勒出其轮廓。政治方面，S.1438 《书仪》中关于汜忠国起义情况的几行记述，表明吐蕃强占瓜沙初期政局不稳，汉民起义不断。《张淮深墓志铭》（P.2913 背）（沙州驻长安进奏院上本使状）（S.1156）等众多的官府牒文、邈真赞，又展示了瓜沙政权内部的矛盾与掌权者的更迭。经济方面，《子年汜履倩等户手实》（S.3287 背）、《戌年敦煌诸寺丁壮车牛役簿》（S.542）、《大顺二年正月沙州翟明明等户口受田簿》（P.3384）、《壬申年三月沙州敦煌乡官布籍》（P.3236）等手实、户籍、差科簿表明吐蕃和归义军时期的沙州敦煌曾承袭中原旧制，实行了一套计口授田、据田收税、计身承役的田亩赋税差役制度。军事与民族关系方面，《申河西诸州蕃、

浑、嗚末等事状》（S.5697）、《张议潮变文》（P.2962）、《张淮深变文》（P.3451）等牒状与文学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 200 多年间敦煌及其附近地区的主要战事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文化与科技方面，儒家经籍的大量抄本，当地人的著述与敦煌人自己编定的历日均揭示出在与中原隔绝的情况下，敦煌人民仍然在凭借当地深厚的文化积淀，顽强地延续和发展着汉文化。至于社会生活与民众习俗方面，敦煌文书为我们提供的研究资料更加丰富，难以计数的契约、诉状、祭文、愿文、信札书牒与社司转帖等多侧面多角度地记述了敦煌普通民众的生活状貌，为后世描绘出了一幅跨越数百年的生动的历史画卷。

除史事遗文外，敦煌文书中还保存了一批有关敦煌及其邻近地区的方志，对敦煌史地研究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现知这类比较著名的方志主要有《沙州都督府图经》（S.2593、P.2005、P.2695）、《敦煌录》（S.5448）、《沙州地志》（S.367、P.2691）、《寿昌县地境》（敦煌某氏藏）等数种。其中《沙州都督府图经》又名《沙州图经》，成书于唐开元、天宝年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经。它详尽记述了敦煌地区的行政机构和区划建置，对山川泉泽、风土民俗也多有载录，现存虽非完帙，仍足资补证史事，了解一地之变迁。

以上我们仅就敦煌历史研究略举几例，实际上敦煌文书的内容非常丰富，于我国学术文化研究的

各个领域都有关涉。

2. 什么是敦煌学

“敦煌学”一名最早出现于 1930 年，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中称：“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1940 年向达先生在修订《唐代俗讲考》时沿用此名，随后学者们便普遍用“敦煌学”来指称这一以敦煌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

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加强了敦煌学理论研究，对“敦煌学”这一概念是否成立，及其研究对象、范围、内容、特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有学者认为随着 1944 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的大规模展开，至 40 年代中期敦煌学即已形成了一门相对独立的严整学科。但也有学者认为敦煌资料涉及方面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敦煌学”不是一门有系统成体系的学科，概括地称之为“敦煌研究”当比“敦煌学”的提法更确切更具科学性。目前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仍在争论之中，有关敦煌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尚难给予严密、统一的界定，但“敦煌学”这一名称却早已为学术界所习用。

敦煌学的研究资料主要是敦煌地区遗存的古代文物文献资料。文物资料的主体是古敦煌郡（约相当于今敦煌、安西两市县）境内的数座石窟群，特别是莫高窟中的壁画、彩塑、建筑等，同时也包括

敦煌地区存留的古墓葬、长城关隘遗址、塔寺等。文献资料主要是藏经洞中保存的数万件古籍文书，兼及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等其他文字资料。

敦煌学系以地名学，敦煌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居于枢纽位置，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敦煌学必然与吐鲁番学、丝绸之路学等相关学科关系密切，同时也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域史研究、中亚史研究，乃至世界史研究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与这些学科互为促进，协同发展。

敦煌文物文献所提供的是一批广博庞杂的古代史料，因而要想从事敦煌学研究，除需要对这些材料本身有深刻的认识外，还应在某一或某几方面学有专长，并以这些其他学科的专门知识为依据和基础，取用相应的敦煌资料进行科学诠释以解决问题，开拓思路，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发展。80余年来，各国的敦煌学者无不是以此种方式进行敦煌学研究的。

3. 中国敦煌学的诞生与发展

敦煌学诞生的直接契机是敦煌文书的再现，换言之，敦煌研究是从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开始的。

1902年，我国著名金石学家、甘肃学台叶昌炽通过敦煌县令汪宗瀚得到了几件藏经洞文物，遂于《语石》和《缘督庐日记》中对有关情况作了记录，这是我国学者关于敦煌文书的最早记述。不过，具有学术研究意义的著述活动还是肇始于

1909 年。

伯希和盗劫敦煌文书后，1909 年又来北京搜求古籍，于 8 月间给罗振玉、蒋伯斧、王仁俊等人看了一部分他随身携带的敦煌文书和文书照片，这些中国学者至此方知敦煌文书的存在，他们一面呼吁清廷收集藏经洞劫余文书，一面立即开始就所见文书进行研究。罗振玉首先撰成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刊登在《东方杂志》六卷十期，这便是中国和世界上有关敦煌学研究的首篇文章。同年九月，王仁俊刊布了《敦煌石室真迹录》六集，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专集，也是敦煌文书搜集、整理、刊布工作之始。此后类似的目录和资料不断涌现，其中李翊灼编《敦煌石室经卷中未入藏经论著述目录》开我国研究敦煌佛经和分专题系统编目工作之先河。存古学会《石室秘宝》则首次利用敦煌文书原件照片影印出版，终令读者得睹敦煌文书真迹，同时书中影印的四幅莫高窟壁画照片，又使该书成为中国刊布石窟艺术照片之始。

1909 年以后的 10 余年中，我国研究敦煌的学者很少，研究方法主要是对写本文献进行考证，写作简单的序跋提要，且多集中于四部书，尤其是经、子二部上。这是因为当时学者们了解敦煌文书的途径十分有限，仅能看到伯希和劫走的部分敦煌文书和少量斯坦因劫走的敦煌文书的照片。

20 年代以后，我国的敦煌研究进入了更加广

阔的领域。刘复（半农）于法国巴黎抄录了伯希和劫经中的大量社会文书，于 1925 年出版了《敦煌掇琐》三册，分类辑录敦煌文书 104 件，使研究者们大开眼界。此后从 1934 年起，向达、王重民、于道泉、姜亮夫、王庆菽等学者相继赴巴黎、伦敦转录和拍摄敦煌文书。这些大规模的欧陆访书活动为我国研究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同时由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和许国霖《敦煌石室写经题记与敦煌杂录》的问世，藏于北京的敦煌文书也得到了利用。敦煌研究的领域被大大拓宽了，有关唐史、归义军史、文字学、音韵学、俗文学，及古代科技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刊出了大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日后敦煌研究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提到的是 1930 年（《敦煌劫余录》）的出版。从 1924 年起，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等开始就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书 8000 余卷细加勘检，用数年时间编成了《敦煌劫余录》，这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关于敦煌文书的大型目录书，也是世界上刊布的首部敦煌文献馆藏目录，至今仍是研读北图藏卷的指导书。不过，学者们于本书中首次提出的“敦煌学”这一概念在此时还仅仅是指整理研究敦煌文书而言。

事实上关于敦煌艺术的研究早在 30 年代就已开始了。贺昌群 1931 年发表的《敦煌佛教艺术之系统》一文是我国学者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

重要文章。至 40 年代初期，我国的考古学家、画家纷纷来到敦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向达、阎文儒、谢稚柳、何正潢等人不仅踏查了大部分洞窟，抄录过碑文、题记，还对石窟开凿年代和洞窟壁画内容进行了考证，何正潢先生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之调查》是我国最早的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

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有组织有系统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大规模展开，不但使敦煌石窟艺术研究迅速发展，也使整个敦煌学的研究方法有所转变，学者们纷纷走出书斋将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文字记录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五六十年代，英国伦敦收藏的敦煌文书已制成缩微胶卷，开始为我国学者所用。学者们遂将零散的、个别的研究转为全面的、系统的综合研究，并对专题研究进行集中讨论，使敦煌学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出版了大批高质量的专著专集，其中有许多论著时至今日仍是研究敦煌学的最基本的必备指导书和工具书，如向达等的《敦煌变文集》、王重民等《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1966~1976 年，大陆的敦煌学研究是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作成果主要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 1972 年发表的《新发现的北魏

刺绣》、《莫高窟发现的唐代丝织物及其他》和 1974 年发表的《敦煌晋墓》等几种。从总体上看，此时的敦煌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基本陷于停滞状态。这时我国港台地区取得了相当成绩。台湾从 60 年代开始就已重视敦煌学专门人才的培养，因而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队伍较早形成了老、中、青三级梯队。70 年代中期台北敦煌学会成立，并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份敦煌学专业刊物——《敦煌学》。此时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深受国际敦煌学界关注。其中著名者，如潘重规《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变文集新书》，饶宗颐《敦煌曲》、《敦煌白画》，陈祚龙《敦煌资料考屑》，邱镇京《敦煌变文述论》，罗宗涛《敦煌讲经变文研究》等，水平都较高。

1976 年以后，大陆的敦煌学研究迅速复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纵观敦煌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敦煌学每一高潮的到来都与新资料的刊布密切相关。进入 70 年代中期以后，敦煌资料的搜集整理刊布更加系统化，我国学者已可以看到英藏、法藏和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文书的全套缩微胶卷，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藏品中的精华也已整理出版了两本目录，敦煌文书的大部都已呈现在研究者面前。石窟艺术资料方面，《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等资料书相继出版，《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大型艺术图录大量问世，学者们既可以亲访敦煌石窟，也可以借助这

些资料图籍全面系统地了解敦煌艺术，极大地便利了研究工作。学者们由此就许多专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了大量专著，并创办了《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等专门刊载敦煌学文章的专刊。

在研究人员方面，敦煌学研究者的队伍迅速壮大，许多高校纷纷开设敦煌学课程，举办敦煌学讲习班和研讨班，培养了众多年轻学者。同时，随着敦煌学影响的扩大，其他领域的中青年学者也纷纷加盟敦煌学研究阵营，不仅拓展了敦煌学分支领域，也带来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而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更符合庞杂繁复的敦煌学研究的特点。

新时期中，学者们在个人努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了横向联合，除建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外，还成立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群众学术团体，共同开展了许多大型合作项目，出版了大量高水平论著，终使敦煌学研究的重心重归故里，改变了外国人“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说法。

此期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发展也很快。在出版了大量很有影响的论文、专著的同时，还编印了《敦煌宝藏》、《敦煌丛刊初集》、《敦煌古籍叙录新编》等大型资料书，方便了各国学者的研究工作。

总之，目前中国的敦煌学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的崭新时期，国际间的合作也在不断加强。相信随着近年《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俄藏敦煌文献》等全新的大型文献集在我国的陆续出

版，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必将步入一个更加辉煌的时代。

4. 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

除中国外，日本、法国、俄罗斯、英国、韩国、美国、印度、德国、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匈牙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的学者也在进行不同程度的敦煌学研究，其中尤以几大敦煌文书收藏国的研究最为活跃。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起始于 1909 年，同样与伯希和敦煌盗宝后 1909 年的北京之行大有关系。当时正在北京的日本书商田中庆太郎拜见了伯希和并观赏了他行篋中的敦煌写本，以《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为题，在北京日侨杂志《燕尘》第 11 期（1909 年 11 月 1 日出版）上介绍了伯希和的收获，并迅速将这一消息传回日本。11 月 12 日大阪、东京两地的（朝日新闻）同时进行了报道，成为日本敦煌学研究的“第一篇历史文献”。此文使日本学术界大为震惊，内藤湖南等立即致信罗振玉，获得了一批写本照片和中国学者的介绍文章，并于 11 月底将这批资料 and 他们的简单研究成果介绍给日本学术界。稍后，大谷探险队在中国西北所获文书陆续运到京都，进一步促进了日本，特别是其京都地区“敦煌热”的升温。20 年代后，日本学者开始到北京、巴黎、伦敦、柏林等地调查搜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敦煌资料，整理刊布了几部资料集，在很

大程度上弥补了日本藏卷少的不足。随后学者们陆续出版了一些高水平研究成果，如矢吹庆辉《三阶教之研究》、《鸣沙余韵》及《解说》，仁井田升《唐令拾遗》及《唐宋法律文书研究》，小岛祐马（沙州诸子二十六种），神田喜一郎（敦煌秘籍留真）及《新编》，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曾一度处于低谷。至 50 年代中期，由于大谷文书的再现和英藏敦煌文书胶卷等的获得，及王重民等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的问世，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迅速复兴。1953 年龙谷大学成立了以石滨纯太郎为首的“西域文化研究会”，它汇集了一大批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新找到的大谷文书和各类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研究，于 1958~1962 年间出版了六册《西域文化研究》，这一成果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1957 年东洋文库也组织了“敦煌文献研究委员会”，以新获得的斯坦因所劫文书胶卷为主，并网罗其他各种收集品，着手编纂《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陆续完成了公文书、寺院文书、道教文书和文学文献 4 大分册，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范围已相当广泛，在社会经济史、法制史、佛教及通俗文学文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西村元祐《中国经济史研究》、山本达郎《唐代均田制研究》、仁井田升《中国法制史研究》、藤枝晃《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塚本善隆《敦煌佛

教史概况》、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等都处于同类研究的前列。

进入 70 年代后，日本的敦煌学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在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探讨我国隋唐时期社会经济史方面取得的成果尤其受各国敦煌学家重视。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堀敏一《均田制研究》、日野开三郎《唐代租庸调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日本的敦煌学研究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通过各有专攻、集体合作的方式，集中一大批在各自研究领域很有造诣的学者，共同编撰出版极有份量的多卷本大部头著作，如《西域文化研究》、《西域出土汉文文献分类目录初稿》，及 80 年代后出版的《讲座敦煌》、《大谷文书集成》、《敦煌吐鲁番社会经济史文书》丛刊等，这些大型著述在世界敦煌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为各国研究者广泛引用。

法国的敦煌学研究是与其获得敦煌文物同步开始的，并在各个时期都出现了数位世界知名的有为学者。如：沙畹、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拉露、石泰安、麦克唐纳夫人、哈密顿、吴其昱（法籍华裔）等，他们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如《吐蕃僧诤记》、《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汉藏走廊古部族》、《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考释》、《五代回鹘史料》等。1973 年国立科研中心和高等实验学院成立“四三八联合研究

组”（敦煌文献研究组）以后，法国学者著述更多，已编印了几本论集，其研究范围涉及宗教、文学、语言、历史、社会经济等众多领域，在古藏文、回鹘文、粟特文、于阗文等民族文字写卷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尤令世人瞩目。因而可以说，法国的敦煌学研究在欧美国家中是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

俄国的敦煌学研究开始较晚。鄂登堡劫走敦煌文书后，仅与另一位探险队队员杜金发表过几篇文章介绍敦煌之行。至 1930 年才由修茨基发表了敦煌写本《文选》的俄译本，这是苏联公布的首篇敦煌文书。30 年代以后，弗鲁格开始整理登录敦煌文献，但遗憾的是在他于 1942 年去世以后，此项工作又告中辍。苏联有计划地开展敦煌学研究始于 1957 年敦煌研究组的创立，在该组创建过程中我国学者郑振铎、梁思永等曾给予帮助。目前俄罗斯的敦煌学研究者主要是孟列夫和丘古耶夫斯基，其研究领域分别为敦煌文学和敦煌社会经济，研究成果主要是 1963 年、1967 年出版的两卷《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和 1983 年出版的《敦煌汉文文书》等。

英国是敦煌文书文物的主要收藏国之一，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图记》、《亚洲腹地旅行记》等报告集收录了一些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此后，英国的敦煌学研究成就主要体现在文书编目和资料刊布方面。如翟理斯编《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魏礼编《斯坦因敦煌所

得画目录》，贝利著《于闐语文书集》和《于闐语佛教文献集》等都是从事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工具书。但是，近年来英国的敦煌学研究已趋衰落，没有专门的研究组织和重要研究成果问世。

其他国家的敦煌学研究较为分散，除韩国于1987年成立了敦煌学会以外，多为学者个人研究，但他们的努力同样令人注目，必将促进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繁荣与发展。

自1909年首篇敦煌研究文章问世至今，敦煌学已走过八十余年历程。经过各国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她早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承认，并越来越为普通群众所接受。今日的敦煌学正处于生机无限的上升时期，随着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她必将会为中华文明史增添更多的绚丽篇章。

结 束 语

研习敦煌的历史虽然也像研习其他地区史那样要借助史籍与方志，但是我国传世史书中对敦煌的记载却远较其他地区简略，有时甚至出现了大段的空白。这并不是因为敦煌不够发达、不够重要，而是由于敦煌偏处西陲，曾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或沦为异族领地，或自建了独立半独立王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状况，中原无以闻其详，史官无以书其状。故而传世史书能提供给我们的材料也就很有限了，我们必须更多依靠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文书来补其不足。敦煌文书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又是当地人书当时事的真实记录，未经后人改篡，足资证史，也最可凭信，是不可或缺的难得史料。

但是，敦煌文书并不是系统的历史档案，其内容的分布很不均衡。这与文书的来源和当初封闭藏经洞的原因密切相关。关于这两点学界历来争论不休，一说主张洞之封闭系沙州人为避战乱，将实用文书封存留用；一说则主张系当地人出于敬惜字纸的传统习俗，将不适用的故纸废弃封消。无论支持哪一种说法，我们都可以看到：藏经洞中的文物并非有系统有条理的档案文卷，而是仓促或随意堆积

而成的集合体。这样，这些文献所供给后世的史料必然不够全面均衡，换言之，我们在介绍敦煌历史时自然要受史料局限而详略不一。

所幸的是，敦煌文书数量至巨，涵括至广，目前已被研究剖析的主要是一些汉文卷子，大量用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文献尚未得到充分利用，有些卷册甚至还未编目公布，敦煌文书潜在的研究价值非常大。相信随着研究工作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对敦煌历史和敦煌学本身都会有更新、更深刻的认识。

参 考 书 目

段文杰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刘进宝著《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荣新江著《话说敦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1月。

宁可、郝春文著《敦煌的历史和文化》，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

丝绸之路考察队编著《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

齐陈骏等著《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

段文杰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之《敦煌彩塑》、《敦煌壁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9月。

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文物出版社、（日）平凡社，1982~1987年。

《敦煌研究》总第1~40期。

《敦煌学辑刊》总第1~20期。

长泽和俊《敦煌：历史和文化》，载《阳关》

1990 年 5~6 期，1991 年 1~6 期。

杜瑜《敦煌沿革述略》，载《中国地方史志》1982 年 3 期。

荣新江《敦煌的兴衰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载《文史知识》1988 年 8 期。

李正宇《敦煌名胜古迹导论》，载《阳关》总第 71 期。

吴初骧、余尧《汉代的敦煌郡》，载《西北师院学报》1982 年 2 期。

榎一雄《汉魏时期的敦煌》，载《西北史地》1985 年 1 期。

齐陈骏《略论张轨和前凉张氏政权》，载《兰州大学学报》1987 年 3 期。

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载《中国史研究》1986 年 1 期。

藤枝晃《吐蕃支配时期之敦煌》，载《大陆杂志》26 卷 7 期。

山口瑞凤《吐蕃在敦煌统治形态的变迁》，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 年 1 期。

姜伯勤《唐敦煌“书仪”写本中所见的沙州玉关驿户起义》，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 1 辑。

邓文宽《归义军张氏家族的封爵与郡望》，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论文集》，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 年 6 月。

荣新江《沙州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称号研究》，同上。

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尼的特点》，同上。

荣新江《晚唐归义军李氏家族执政史探微》，载《文献》1989年3期。

王重民《金山国坠事零拾》，载《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4月。

李正宇《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载《西北史地》1987年2期。

森安孝夫《回鹘与敦煌》，载《西北史地》1984年1期。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期。

《中华文明史话》丛书书目

- | | |
|---------|--------|
| 文明起源史话 | 黄河史话 |
| 长江史话 | 运河史话 |
| 长城史话 | 石器史话 |
| 陶瓷史话 | 青铜器史话 |
| 古玉史话 | 玻璃器史话 |
| 书法史话 | 绘画史话 |
| 学校史话 | 书院史话 |
| 状元史话 | 监察史话 |
| 科举史话 | 训诂学史话 |
| 戏曲史话 | 诗歌史话 |
| 小说史话 | 散文史话 |
| 体育史话 | 杂技史话 |
| 服饰史话 | 兵家史话 |
| 兵器史话 | 军制史话 |
| 屯田史话 | 官制史话 |
| 商业史话 | 货币史话 |
| 改革史话 | 经济思想史话 |
| 城市史话 | 孔庙史话 |
| 故宫史话 | 古塔史话 |
| 石窟寺史话 | 园林史话 |
| 圆明园史话 | 敦煌史话 |
| 中国基督教史话 | 道教史话 |
| 佛教史话 | 汉字史话 |
| 医学史话 | 宰相史话 |
| 丧葬史话 | 疆域沿革史话 |
| 家具史话 | 宫殿建筑史话 |
| 民居建筑史话 | 七大古都史话 |

-
- | | |
|-------------|----------|
| 西藏宫殿寺庙史话 | 交通工具史话 |
| 火器史话 | 矿冶史话 |
| 饮茶史话 | 饮酒史话 |
| 水利史话 | 漕运史话 |
| 农业科技史话 | 棉麻纺织史话 |
| 蚕桑丝绸史话 | 驿道驿站史话 |
| 海疆开发史话 | 航海史话 |
| 旅行史话 | 计量史话 |
| 造纸史话 | 印刷史话 |
| 地图史话 | 礼俗史话 |
| 儒家史话 | 法家史话 |
| 哲学史话 | 玄学史话 |
| 史学史话 | 考古学史话 |
| 地理学史话 | 物理学史话 |
| 天文学史话 | 陵寝史话 |
| 帛书史话 | 简牍史话 |
| 石刻史话 | 收藏史话 |
| 文房四宝史话 | 地名史话 |
| 方志史话 | 寺观史话 |
| 音韵史话 | 满汉文化交流史话 |
| 蒙藏文化交流史话 | 中日文化交流史话 |
| 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 | 汉藏文化交流史话 |
| 丝绸之路史话 | 海上丝路史话 |

本丛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五”重点研究课题

本丛书列入“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

中华文明史话